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思想家毛泽东已经辞世 17 个年头。在他辞世之后的这 17 年中，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敬爱的领袖、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思想家，而是深刻铭记着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教诲。在他诞辰 100 周年之际，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深沉怀念和倾心尊敬便是证明。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于伟大和杰出人物的最好的怀念就是接过他们开创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出波澜壮阔的新场面，而不是沉湎于对过去的业绩的追忆，不是把他们当成神圣的偶像。诚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过去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开创的业绩是伟大的、可歌可泣的，但是我们今天和明天要开创的业绩应该更伟大、更可歌可泣。毛泽东是一位辩证法大师，在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时候，以这样的勃勃雄心和大志去对待他的业绩和思想，也许更能告慰他的英灵。

朱兰芝、张辉同志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来临之际，主编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作为对他的献礼，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纪念。该丛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后研究，并且注意联系中国过去和今天的实际，探讨了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我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对进一步开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祝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将在我们今天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编成，两位主编邀我作序，趁此机会发表了以上意见

是为序。

宋法棠

1993 年 6 月 6 日

第一章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 渊源和科学理论体系

早在 1851 年，恩格斯就预见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为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全新的作战方法和军事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战略家。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批判地吸收了历史上军事思想的优秀成果，把中国长期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概念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充分证明了的伟大科学真理，是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基本含义的准确表述，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概念的提出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经过初步考证和研究，我们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概念，由 40 年代初期酝酿提出至现在，整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1）从 40 年代初到 1957 年以前，在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逐步形成，但只是我军一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在一定场合下使用，提法和表述也不统一。

1941 年到 1943 年，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将毛泽东各方面的思想加以概括，逐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随着这个概念的提出，在军队系统也开始相应地提出了诸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路线”、“毛泽东军事理论”等近似概念。如 1945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在军事报告中就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等概念。陈毅在建军报告和口头发言中也使用了“毛泽东军事学派”、“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概念。同年 12 月 1 日，刘伯承在《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中也提出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概念。1946 年 1 月 24 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完整概念。建国后，我军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军的新时期，在强调重视学习和借鉴当时苏联军队先进经验的同时，还应该注意探讨如何与我军的传统经验和优秀军事思想相结合。因此，在当时新成立的军事院校和高级领导机关中开始提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1951 年 1 月 15 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在《关于当前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说：“我们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亦即斯大林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目的在使它能运用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去。”在这里，刘伯承不但明确地提出了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目的，同时也提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确切概念。但在当时，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规范，经常将“毛泽东军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62 页。

事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等提法混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连续取得了战争初期的几个重大战役的胜利。战争实践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也更加引起了我军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珍惜和重视。1952年12月，彭德怀在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报告中提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的军事学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解决军事问题的。毛泽东的军事学说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在中国的应用。苏联的军事科学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他把“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时使用。可见，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已经提出，但对这一概念的提法和使用，还没有完全统一。

(2) 从1957年到1977年，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和要求我军建军、作战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的提法在全军得到了统一。

1954年我军正规化训练开始之后，虽然在强调学习当时苏联军队先进经验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我军革命战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在实践中对学习外军经验和继承我军传统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因此，195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强调并明确号召全军：要认真总结和学习我军的宝贵经验，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我军的建军和作战。这次会议，把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决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出：“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在新条件下，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建军和作战的丰富经验，才大大促进了我军各方面工作的跃进。”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贯彻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在全军得到了统一。195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即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但是，1959年10月1日，林彪发表了题为《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在全国全军产生了极深刻的但带有“左”倾色彩的影响，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歪曲了它的科学含义。

(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从思想上理论上不断清除“左”的影响和拨乱反正。在军事学术空前繁荣的条件下，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逐渐趋于准确、科学和完善。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在批判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时，明确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评价，恢复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含义。据此，我军领导人和军事学术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定义加以科学论证，从而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在提法上更加趋于准确和科学。

(二)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含义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概念，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1)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认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但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的。无产阶级政党怎样组织军队，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进行革命战争，依靠谁进行战争，又怎样按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发展规律将革命战争引向胜利，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复杂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解决许多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中是不可能找到直接的现成答案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出发，不断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战争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如何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完整科学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展。

（2）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全党全军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战争及其人民军队的创建是在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同领导下进行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正如朱德所指出：“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此外，还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贺龙、陈毅、罗荣桓、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加之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中不仅能非常注意听取各战略区指挥员的意见，而且也善于把各战略区作战、建军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认真总结。这样，一方面使各战略区指挥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使各战略区的经验教训得到及时总结，从而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导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所说，毛泽东思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当然，所谓“集体智慧”，又绝非是把若干个领导人物的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用简单的数学方法把它拼凑在一起就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是指经过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思想、意见、建议和集体领导智慧，通过毛泽东本人的智慧和艰苦的劳动创造，经过科学的提炼、加工和理论升华的结果。可以这样说，在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反复实践和反复认识的过程中，全党全军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不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和丰富的“营养”，而毛泽东则是产生这个思想的理论加工者和集大成者。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同时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知识、智慧和贡献，而且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被全党全军公认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实践的科学理论，并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正因为如此，如同用马克思的名字

命名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一样，中国共产党也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

（3）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是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重要时期，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总结实践经验，进行了卓有建树的理论创造活动。他的所有军事著述都是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战争的客观需要，在总结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在井冈山斗争和稍后的一个时期，为在理论上解决中国革命的规律和道路问题，为纠正党内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从思想和组织上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总结了我党我军在这一时期的具体实践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重要军事著作。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为了结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毛泽东为从理论上阐述中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战争指导问题，在总结抗日战争十个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4）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了完整的概括。其基本点是：（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3）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4）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5）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6）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特点决定的。旧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要解决的一个最突出、最中心的问题。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注重战争，研究军事。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伴随着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就成为毛泽东思想最深刻、最基本、最典范的证明和运用，自然也是其整个内容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来看，军事实践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最成功的部分，并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因而在毛泽东著作中他的军事著作就很自然地占有大量篇幅和重要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并对毛泽东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论述作了高度评价，称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

的贡献”是极其恰当的证明。因此，不从整体上研究毛泽东思想，固然不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不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不能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基础

军事理论产生于军事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和毛泽东自身的战争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条件。

（一）中国革命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地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实践。这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深厚的实践基础。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史上，所经历的时间最长，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战争经验，从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不同时期的战争都有不同的特点。从作战形式来说，我们既打过世界上最成功的游击战，也打过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规战。从作战对象来说，我们既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也打败了日、美帝国主义的军队。通过这些战争的实践，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这些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较之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战争更特殊和复杂，迫切需要探索战争规律的探索。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又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因此，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尖锐复杂；敌我态势变化无穷；其战争形式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又如抗日战争“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中国革命战争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有一种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科学军事理论作指导。毛泽东也正是适应革命战争实践的需要，以极大的注意力去研究军事问题，探索战争规律，创立了新的军事理论。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更能够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在其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几度被“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入歧途而遭受严重的挫折。这一点，毛泽东讲的很清楚，他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页。

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通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比较，从而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就更加深刻和全面。

总而言之，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不可分离，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抽象，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也就不会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正如毛泽东 1962 年 1 月 30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二）毛泽东亲身的战争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但也应该看到的是，毛泽东个人亲身的战争实践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早年在辛亥革命的新军中当过半年兵，从事过工人运动，后又较长时间地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主张建立农民武装。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城市转入农村，以农村为发展革命的基地，主要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是实现这个转变的主要代表，在党的“八七”会议后，便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开始投身于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之中。秋收起义他率领起义部队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在遭受挫折之后，决定向井冈山进军。从这以后，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长达 25 年之久，加上建国以后他直接领导我们党军事工作的时间，则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亲自指导了全中国所有的革命战争，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四渡赤水，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直罗镇战役；解放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的几次重大战役，等等。毛泽东是迄今为止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军事实践时间最长，战争经验最丰富的一位无产阶级军事家。长期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实践，有利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渊源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时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军事思想虽然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学说，而是人类优秀的军事理论遗产的继承和

发展。它不仅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而且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和外国的军事理论。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科学的军事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奠基的。他们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为适应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需要，他们运用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深刻分析和总结了他们所处时代发生的大小数十次战争和重要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战争不是永恒的自然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战争起着双重的作用，—方面起着残杀破坏的作用，—方面也起着促进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革命作用，即“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无产阶级革命虽不排除和平斗争手段，但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和消灭战争的目的。（2）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军队，认为“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揭示了军队的本质。（3）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暴力革命的开始形式。武装起义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起义—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决心，坚决采取进攻方式，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力求不断获取新的胜利。（4）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兵力，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5）经济是暴力的本原，暴力的胜利是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都是由经济所决定的。（6）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而不应当局限于用正规军—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全民武装，到处组织游击队，采取游击战，进行人民战争，才是小民族战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列宁、斯大林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总结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主要有：（1）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明确指出私有制引起战争，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强调要从战争的政治目的上来考察战争，根据战争的性质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来决定对战争的态度；战争的性质是由政治目的决定的；只有彻底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才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2）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阐述了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指出革命就是战争；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者的国内战争；在阶级斗争已尖锐到国内战争的程度时，不仅应当参加这个国内战争，而且要在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3）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规则”，—进一步作了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强调必须在革命形势出现时才能发动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起义的领导者；起义必须在决定的关头和地点，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进攻。（4）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队建设理论。指出常备军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中，必须打碎旧军队，建立起自己的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第360页。

同上书，第1卷，第342页。

新军队；军队必须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在军队建立党的组织，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培养自己的军事专家；执行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明的纪律，实行统一集中的指挥和革一首长制。（5）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的理论。认为要发动和进行革命战争，必须依靠群众的觉悟和英勇战斗的精神去战胜敌人。（6）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这就是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联合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战胜强大的敌人；在决定时机和地点拥有压倒敌人的优势；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的退却；必须建立和巩固强有力的后方；军队的统一指挥，国家的一切力量和资源的严格集中管理，是保障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等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理论和战争指导艺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也随之传入中国，并逐步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所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是中国较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他逐步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到了1920年的夏天，他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1927年我军建立起来之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和理论创造中，不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吸取营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就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来源。这也就是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

（二）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但毛泽东毕竟是生长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的伟大人物，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对他不能没有影响。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就曾经说过：“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事实也正是如此，1936年9、10月间，毛泽东曾两次写信给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给买《孙子兵法》等军事书籍。因此，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奴隶社会以来，经历了无数次不同规模的战争，并有很多军事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代农民革命战争和历史上著名战争战例的经验进行批判继承；二是对《孙子兵法》等古兵法中的军事原则进行批判继承；三是对中国其它古文化，如《三国演义》、《水符传》等中体现的战争艺术进行批判继承。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在治军思想方面，毛泽东批判吸收了中国古代治军思想的这样一些观点：（1）关于建军的思想原则。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讲演，在讲演中，他指出：唐僧取经的时候，遇到了那么多困难仍然坚定不移，始终没有开小差，我们军队必须在政治上学习他的坚定性。同年他在一次讲话中又说：历史上有个禹王办河工，三过其门而不入，这说明他办事是全心全意，大公无私的。我们共产党和红军比禹王还高明，高明之处就在于七八过其门而不入。我们应

该发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在讲到军队必须加强纪律时，他又举例说，宋朝民族英雄岳飞，他有严明的纪律，提出“冻死不撤房，饿死不强民”的口号，正像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老百姓都很喜欢这支军队。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更要勇于为人民的利益付出牺牲。毛泽东还用中国历代农民革命军队由于胜利时骄傲，或腐化堕落，或争权夺利导致战争不能取得彻底胜利而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全党全军。他于1944年11月建议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全军的整风文件，以吸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在政治上必须坚定不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自觉的纪律，胜不骄、败不馁的建军思想原则与中国古代的治军思想是有很大大关系的。（2）在用兵和战争指导思想上，毛泽东批判吸取中国古代的作战思想更为突出。第一，吸收“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毛泽东对孙子的这一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实际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能轻视这句话。”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如何才能达到知己知彼呢？孙子提出“用间”的思想。毛泽东也吸收了孙子的这一思想，明确指出“用间”在现代战争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和朱德在合著的《游击战讲话》一书中强调，这些间谍手段，虽是孙子时代提出，但在目前民族革命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基本上仍是可用的。第二，吸收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来源于《孙子兵法》。毛泽东通过对历代有关战争战例的研究，加深了对这一思想的理解。使之成为我军与强大敌人作战时实施战略防御的基本指导思想。他曾以《水浒传》上的林冲先退让一步，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将其打翻为例，和以春秋时齐鲁之战，鲁军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战齐军的战例，说明了战略退却的积极意义。继而指出，中国战史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这些战例共同的特点和基本规律就是：弱军在强敌进军面前，往往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利用敌之弱点，创造战机，适时进行反攻，最后将敌打败。毛泽东正是批判地吸收了这一基本思想。第三，吸收了“示形”与“动敌”的思想。所谓“示形”与“动敌”，就是用欺骗的方法诱骗和调动敌人；同时不为敌所调动，从而使作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思想毛泽东在其军事著作中多次运用。他要求我军各级指挥员必须善于以各种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敌造成错觉和不意，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歼灭敌人。第四，吸收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思想。这一思想出自《老子》，《孙子》中也有“予之，敌必取之”，即予敌以利，必为我所诱的思想。毛泽东在吸收这一思想时认为，在战争中，必须正确处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丧失土地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丧失土地而换取大量歼灭敌人，这便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暂时放弃若干地方和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传统军事思想在现代最好的运用。第五，吸收了“先礼而后兵”的思想。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政治上的主动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在政治上取得主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动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前提，这便是“先礼而后兵”的思想。1945年，毛泽东说：我曾经对国民党的联络人员说过，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即“不为天下先”，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进攻，我们暂时向后转。先让你一下，然后待机反击。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下往也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除此以外，毛泽东还吸取了中国古代集中兵力、灵活机动等思想。这就说明，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一些国外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也是这样看的。法国的鲍威尔将军就说过：“事实上，尽管毛泽东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素养，但他毕竟是一个继承了古典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他受孙子的影响更大些。”

（三）批判吸取了外国军事思想的优秀成果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思想的同时，也批判吸取了外国军事思想的一些优秀成果。这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吸取了国外革命战争的一些理论，二是吸取了国外资产阶级的一些军事思想成果。对于后者，毛泽东说过，我看了不少外国战争的书、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这说明外国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就曾引用过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军事家拿破仑，俄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库图佐夫等人指挥的战役，来阐明军事理论问题。还引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最高指挥官蒙·巴顿“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的观点，来说明应正确地看待武器的作用。

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毛泽东是十分重视的。至迟在1938年春，毛泽东就已经读《战争论》，而且在他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做过记载。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记载：“一九三八年春，毛泽东……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月二十四日，《战争论》读到第一百一十一页。”在《论持久战》这一著名的军事论著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战争论》中的论述，批判地吸收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的目的”和战争“概然性”的思想观点。

当然，毛泽东对外国军事理论的吸取，并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批判地继承，并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军事理论的一部分。例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吸收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思想。关于战争目的这一思想，在克劳塞维茨这里是从战争抽象概念中得出来的。他认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这是“抽象战争的目的”。实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对于这两者的关系，克劳塞维茨认为：“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军队的后果。”他承认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是相互联系的。他说：“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它们是相互

《西行漫记》第114页。

《战争论》第61页。

《战争论》第63、40页。

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不过消灭敌人军队具有积极的目的，“是战争的长子”；保存自己军队则是具有消极的目的。毛泽东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上述思想。他说：“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认为战争中的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都离不开战争的这一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因此，“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的思想，虽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差别之一，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目的，即“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的思想，完全是从纯战争概念中推演出来的，从而认为这一战争目的只能适用于“绝对战争”，而“不能普遍地适用于现实战争。”毛泽东则从对战争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入手，把战争这一目的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加以认识。差别之二，克劳塞维茨虽然对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他并没有把“保存自己”作为战争目的来看待，而认为“保存自己军队”则具有消极的目的。毛泽东明确地把战争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两个方面，并强调“保存自己”的积极作用。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保存自己”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特点所决定的。可见，毛泽东是用批判的理性眼光来看待外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

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所谓理论体系，是指一种理论有机联系的结构形式，是理论形成或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应是对该理论本身最本质、最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并按其属性和内在联系所作的科学划分，是对其所揭示的规律体系的集中反映，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顺序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并已被证明了是真理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问题的基本原理、原则所构成的，互有联系的完整科学理论体系。

（一）我党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认识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则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构成的认识，我党最早见诸文件的，是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提出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即：第一，我们的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以后，朱德根据《决议》的精神，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明确地概括为：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同时他还提出了“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论断。建国以后，在中央军委领导人的讲话和军队的文件、教材中，较为普遍的提法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2页。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三个组成部分。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总结了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指出：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主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根据上述，我们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五方面的内容。

（1）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战争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思想，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整个理论基础部分。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课中就提出“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它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对战争起源、战争本质、战争目的、战争性质，对待战争的态度、消灭战争的途径和现代战争根源等问题的根本看法，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论。其基本观点是：战争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用以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阶段的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历史上的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共产党人要拥护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无产阶级是战争的消灭论者，研究和进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一切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但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在现代，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战争不是神物，而是有规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采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着眼其特点和发展；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必须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善于关照全局，掌握关节；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2）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理论

人民军队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强调把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作为中国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认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

有人民的一切。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长期的建军实践中，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建军、治军的理论和原则，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马克思主义是我军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军走向胜利的核心力量。为了从根本上保证我军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把我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此，军队必须坚持党委制，把支部建在连上。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人民军队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的任务，既是一个战斗队，但又是一个工作队和生产队。要能担负起人民军队的任务，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努力提高军政素质，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

人民战争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其主要观点是：（1）革命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够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因为革命战争的正义性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能够在战争中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和支援战争。因此，人民群众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和力量的源泉。革命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赢得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实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毛泽东历来强调必须有一支人民军队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但还应把人民群众中能够参加作战的青壮年武装起来，直接参加或配合人民军队作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建立以主力红军和地方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逐步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游击队与民兵相结合的体制。毛泽东对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一是由于有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二是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没有群众武装的配合，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3）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通过认真总结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历史教训，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条件，强调中国革命战争必须首先在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是革命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打击敌人，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人力物力主要来源的战略基地。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实行波浪式推进策略，不断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把人民群众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才能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4）坚持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但又不能放弃或忽视非武装斗争，以及各种斗争形式的紧密配合，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5）创立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认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尽管敌人也熟知我们的这些作战方法，并曾专门研

究和企图寻找出对付我们的办法，但仍不能挽救其失败。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正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军才战胜了强敌。

（4）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一场范围极其广泛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用以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是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并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系。其基本内容是：（1）正确地贯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这个目的是战争的本质，也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2）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进攻的速决战。（3）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战役战斗的歼灭战，是达成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毛泽东历来强调，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4）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紧密配合。从战争的全过程看，运动战是大量歼灭敌人，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是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重要作战形式；游击战是从战略、战役上和战斗上配合正规战不可缺少的作战形式。三种作战形式在战争中各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应该善于相互配合，不断变化。（5）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迫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强调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战役战斗上的主动，最终改变战略上的被动为主动，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因此，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其最根本的特点。

（5）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思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思想。认为有国必有防，国防必须现代化。他正确处理国防现代化与国际战略的关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提出了自力更生，走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道路；论述了国防现代化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认为国防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协调发展，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重视发展尖端技术，尽力搞好国防现代化；论述了国防现代化与军队建设的关系。认为军队建设是国防现代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军队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但要注意处理好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对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以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五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战争观和方法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人民军队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战略战术，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取得

人民战争胜利的重要作战原则；国防现代化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建国后的发展，是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五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二章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并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正确划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首先必须确定一个符合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发展过程的划分标准。这就是：第一，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及革命特点，不能忽视它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阶段的必然联系。第二，毛泽东军事思想既然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就必须以毛泽东这个主要代表正式参与或领导中国共产党军事活动时开始，而不应在这之前。否则，没有毛泽东亲身参加的军事实践与创立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即难以成立。第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是指它的整个体系而言，而不是把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在某一时期提出或创立的个别、单项或非主要的军事原则、观点，视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并据此作出“形成”或“成熟”的判断与结论。第四，毛泽东军事思想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在建军、作战中正确的指导方针。它必须是在建军、作战的实践中被反复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规律和指导规律的科学。据此原则和标准，我们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即理论探索与准备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重大发展时期；不断丰富和完善时期。

一、理论探索与准备时期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到 1927 年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由于对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没有认真地去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亦未注重对军事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对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可以说完全处于一个仿照苏联革命经验的理论探索时期。

（一）对武装革命道路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屡遭挫折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于 1924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 年 6 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协助下，为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立了第一所军官学校。1924 年下半年到 1925 年底，中国共产党又推动和帮助国民党进行了两次东征，平息了广州商团叛乱，讨伐了陈炯明等反动军阀，统一和创建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又积极倡议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由广东革命根据地出发，讨伐盘踞在湘、鄂、浙、赣、苏等省的军阀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在上海成功地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但是，正在北伐军发展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于 4 月 12 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汪精卫又公开叛变革命，同蒋介石一起镇压共产党人，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在这中国革命历史发生转折的紧急关头，毛泽东于 7 月 4 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明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指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

的基础”。8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集中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一部分原国民革命军，在南昌成功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并按照党中央既定方针，准备南下广东，支援当地农民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与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而后举行新的北伐。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决定派最积极、最坚强和富有斗争经验的骨干去各地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9月9日，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功之后，起义部队在向长沙进军中大部遭到损失。毛泽东依据实际情况，毅然改变了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率领起义部队转向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12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所领导的广州起义又遭失败。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完全照搬苏联经验，企图走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它却在探索中为后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武装革命道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二）对建军理论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革命武装的思想是明确的。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早就提出过中国革命必须采取俄式暴力革命的方式。周恩来曾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时向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称：中国革命，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他认为，军队是工具，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可以利用这工具去反抗压迫，推翻压迫者的势力。李大钊更为鲜明地强调：“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在建军实践上，在共产国际的具体帮助与指导下，主要是运用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时期创立革命武装的基本经验，即一是组织城市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后建立工人武装；二是在国民革向军中发展党的组织，通过党的工作去争取掌握革命武装。在当时，虽然建立城市工人武装的尝试几乎都遭到了失败，但却在建立工农武装方面有了创造性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领导并举办了广州、武汉等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建立工农武装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毛泽东还通过对农村的实际调查，公开号召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发展党的组织的基础上，直接掌握了叶挺独立团、国民政府警卫团等武装和深刻影响了一大批部队倾向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白色起义等斗争实践。特别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过程中，依照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校和军队中普遍建立党的组织，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积极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一是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对军校学生和部队的政治教育。明确提出：“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二是在作战中要求军官必须亲赴前线，激励士气，才能保证作战胜利。三是强调革命军人必须自觉遵守纪律。这种纪律“并不是强迫的，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3页。

转引自《解放军报》（1979年10月28日）

《周恩来年谱》第73页、第78页。

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国民革命军在两次东征作战和北伐战争中之所以能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正是由于这种革命政治工作制度所起的作用。一方面由于获得了工农群众的拥护，一方面由于官兵的觉悟而作战勇敢。这些经验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三）对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探索

建党初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和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和北伐的战争中，都极重视联合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与援助革命战争。1924年秋，在平息商团的反革命军事暴乱时，周恩来就发表演说，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南北军阀和一切反革命派。1925年，盘踞在东江流域的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生叛乱。周恩来在率军东征中亲自动员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革命战争，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革命军与旧军队之区别。指出：革命军“如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阐明了人民群众与革命军的密切联系。并教育军队为自身的解放而战，认为“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1926年夏，周恩来又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分先后主持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和第1、2、3、4、6军中的共产党员会议，进行北伐战争的组织准备和动员工作。宣传北伐的重要意义及党的方针和政策。并经党的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在广东和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强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接应北伐军，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当时，仅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就有40万人，工人11万人。在北伐军于长沙地区作战中，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救护和扰乱敌人后方等工作，甚至直接组织农民自卫军参加战斗。其群众发动的广泛性是中国以往战争史上少有的。尽管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干扰，抑制了人民战争的广泛性和彻底性，但中国共产党在初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仍然取得了宝贵的人民战争经验。

在战略战术上，北伐军在工农革命运动的支援下，采取长驱直进和首先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这种方针完全适应军阀割据和其主要兵力集中于大城市的特点，因而迅速消灭和击溃了华中、华东封建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英勇杀敌，建立了重大功勋。该团在武汉外围连克敌坚固防守的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据点，击溃敌之主力，直捣武汉。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因此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毛泽东认为：“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周恩来年谱》第73页、第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周恩来年谱》第73页、第77页。

《周恩来年谱》第73页、第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时期

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即指毛泽东于 1927 年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和 1929 年初与朱德率领红 4 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开创革命根据地，到 1931 年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作战的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经过同党内错误路线的曲折斗争和军事上不断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在军事思想上已初步创立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正确的武装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经过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批判，从惨痛的教训中进一步懂得了掌握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道路。但是，认识了军事的重要性，并不一定就有正确的军事路线的产生。1927 年党的“八·七”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主张。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在全国主要是南方诸省举行了大小 100 余次的武装起义，并在多数起义的地方创建了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1927 年底，党中央就相继提出要江西省委“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局面”；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依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局面”；要求朱德“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局面”，等等。但当时所提出的这种“割据局面”的思想，在根本上还是“城市中心论”的反映。因而对在怎样才能使幼小的红军得以生存、发展和战胜强大敌人，即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问题上，还没有真正解决。直至党的“六大”，也还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虽然有所认识，但关于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他当时“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经过 1927 年秋至 1930 年相继发生的党内两次“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由于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把本来处于革命低潮的形势估计为“不断高涨”，而提出“建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进而“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因而在多次遭到重大失败的错误之后，1930 年 1 月，毛泽东经过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才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即是以乡村为中心。这一理论的提出，“被认为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二）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初步形成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 页。

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 35 页。

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 35 页。

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 35 页。

《周恩来选集》（上）第 179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1 卷，第 83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 745 页。

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后，在问罗霄山脉转移途中，根据当时起义部队的实际情况，为了健全组织，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于9月27日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召开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除将起义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的一个团外，主要是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和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等。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同年12月底，部队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又为工农革命军明确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1928年初，根据工农革命军陆续提出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又制定成“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经逐步修改，补充，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月，在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的会师后，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为红4军。在艰苦斗争的作战环境中，红4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这些争论，主要根源于红军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虽经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但仍未使这些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但在红4军的建军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他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支部建在连上”。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起草的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批评。指出，红军采取的集权制，党委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红4军工作的情况，再次发出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11月26日，毛泽东恢复了对红4军前委的主要领导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创建红军以来的基本经验，亲自调查研究，并起草了中共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同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官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反对不愿做艰苦工作的流寇主义思想，并尖锐地批判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等错误观点。着重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样的军队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4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来做。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但是对苏联红军建军经验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

（三）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及战略战术原则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9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37页。

毛泽东经过领导红 4 军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创造根据地，以及战胜敌人军事进攻的实践活动，逐步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并提出了适应当时环境下的人民战争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这些理论主要反映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在人民战争理论方面，毛泽东根据“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提出没有很好的工农群众，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都不能造成长期的和发展的割据局面。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的全民参战思想。他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从根本上阐明了人民战争的一条重要原理。他还要求红军必须树立根据地思想，依靠人民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他指出，“人民”这个条件，是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实施战略反攻、打破敌之“围剿”最重要的条件。“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发出号召说，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我们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这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强调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加强国防准备，深入动员人民。没有人民的动员，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并从国际战略的高度指出，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这些思想，都反映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体系已大体形成。

随着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逐步形成与发展，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与人民战争理论相适应的战略战术亦应运而生。经过井冈山初创时期多次粉碎江西敌人的“进剿”作战，1928 年 5 月，毛泽东与朱德一起从作战实践中总结并提出了与当时游击战争相适应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其实质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广泛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充分利用广大农村的有利条件，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去夺取作战的胜利，以达“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它是我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奠基石。毛泽东曾对十六字诀等游击战术原则作出高度评价。指出：“我们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在红军力量不断加强和发展的情况下，1930 年夏，全国红军实现了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同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 10 万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坚持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3 页，第 13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3 页，第 13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7 页、第 155 页、第 25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5 页、第 25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5 页、第 25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4 页

方针，与朱德共同率领红军依托根据地，凭借人民和地形等有利条件，将敌诱入根据地腹地，经我部队和群众的阻击、袭扰后，在敌兵力分散，补给困难，部队疲劳，士气沮丧时，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手段，歼敌近万人，活捉敌第 18 师师长张辉瓒。不但粉碎了敌之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还在乘胜转入进攻作战中，收复和扩大了根据地。1931 年 4 月，蒋介石又调集 20 万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坚持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反对“分兵退敌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等错误主张，依靠根据地内红军好，群众好，地势好等有利条件，与朱德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决定实行在运动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乘敌之隙，先打弱敌等方法，于半个月內横扫 700 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 3 万余人，痛快淋漓地将敌第二次“围剿”打破。同年 7 至 9 月，毛泽东继续坚持同一作战方针，在敌 30 万兵力压迫下，与朱德再次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原则，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并多次率领红军主力乘夜通过各敌军间的空隙地带，接连三战皆捷，而后在敌退却时又追歼敌军一部，共歼敌 3 万余人，遂将敌之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打破。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和“诱敌深入”方针的成功应用，以及战略防御中的积极防御、战略退却、战略反攻等理论和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原则的产生，使红军的作战原则超越了十六字诀的朴素性质，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毛泽东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时期

毛泽东军事思想成熟于抗日战争初期。即主要是指毛泽东继 1936 年底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之后，到 1938 年 11 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经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学习和对古今中外一些重要军事论著的认真研究后，联系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实际，对如何研究与指导战争以及建军、作战等基本理论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从而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体系进入了成熟的新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曲折的斗争之后，已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

正确的军事路线，是在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和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才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立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 1930 年以前的两次“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之后，又于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经过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着重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原则，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在长征途中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才使党和红军正确的军事路线逐步地建立了起来。这一基本看法，完全可以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下列论述和结论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和依据。（1）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1 卷，第 10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4 页。

文中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了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2）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武器，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强调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而反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汇合在一起，全党更加团结地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其特点都是战争中的错误。也都是在战争中得到克服并转到正确路线方面来。这些教训和成功，使“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3）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1927年8月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而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又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次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问题。1933年党中央迁至红色区域后，情形虽有根本改变，但在战争问题上又犯了原则性错误，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才把战争问题放在了第一位。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并且会运用它去解决政治问题和战争问题。（4）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自1927年以来在党内曾经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了严重损失。认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党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均被逐渐地克服了。“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的高度的巩固和统一。”（5）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以上这些结论表明，反映我党我军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大体都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前后达到成熟的。那末，反映服从于这条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也自然是在这个时候才达到成熟的。

（二）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表的一系列重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0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7页。

要军事理论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成熟

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在抗日战争初期前后由1936年底至1938年10月的近两年时间内，毛泽东之所以能集中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么多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和哲学著作，既是当时主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进入成熟时期的重要标志。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分析：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进行系统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红军于1936年结束了长征之后，取得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全党全军必须重视理论建设，迅速克服党和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理论水平低下的现状。因此，在经过毛泽东和全党全军在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懂得了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研究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为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理论化，既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第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在战争指导上，面临着许多重大而又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针对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着的不同认识和主张，认为必须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来澄清和纠正“亡国论”与“速胜论”等错误思想，以统一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和做法。第三，中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国共两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党我军在军事上处于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客观形势要求我军必须及时提出正确的理论和思想作指导，以胜利地完成这次军事战略转变。总之，在客观上为毛泽东系统地进行军事理论创造，提出了迫切要求，也准备了充足条件，并推动和加速了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创造。

毛泽东经过勤奋学习和艰苦创作，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一批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这些著作都从不同侧面对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理论问题，科学地进行了系统回答和阐述。其中1936年底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战的基本经验，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对有关无产阶级的战争观与方法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和战役战术，都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述。其核心是论述了在强敌进攻面前，如何实施积极的战略防御问题。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正确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基本依据。1937年7、8月间先后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大量的军事上的辩证法问题，正确解决了如何坚持以实践的观点和对立统一规律的方法，来认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问题。1938年5月，又相继发表了关于指导抗日战争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前一篇主要是进一步从理论上解决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地位问题。并对六个具体战略问题逐一从理论上作了回答。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战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发展。后一篇则主要是从政治上、军事上解决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阐明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主张，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为争取战

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进一步全面地发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战略防御理论。同年10月，发表的《论新阶段》，主要是根据抗日战争头十五个月的实践经验，强调在抗日民族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必须坚持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团结抗战，发展全国的和国际的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彻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和壮大军事力量，以争取持久抗战的胜利。接着于11月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思想上明确解决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抗日战争中独立自主地领导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以及必须重视研究军事战略转变的指导问题。这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的发表，说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已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和全面成熟的新时期。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经过不断实践，不断认识，在理论上已趋完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从实践中来，并在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中不断深化。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根据对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得已初步形成。但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一是有些内容还不可能从当时的实践中被全部认识；二是在战争极端频繁、艰苦的岁月中也来不及从理论上认真加以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理论形态上还是不完善的。只有在红军长征结束后，经过毛泽东对我党我军长期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为了指导抗日战争的实践需要，在创造出了新的理论，并通过1936年底至1938年间一系列重要军事理论著作的发表，才使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理论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1）关于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继承了列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根本观点，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科学论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对于战争的根源、性质、目的以及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和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等问题，都作了精辟论述。从而为我党我军在战争观问题上，解决了如何从理论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个根本问题。（2）关于研究与指导战争的方法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都强调，必须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必须从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中找出行动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在研究各个不同战争的指导规律时，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等等。这就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研究和指导战争，如何正确处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3）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所具有的四个特点后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并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具体国情的不同，所以必须走与他们相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并根据这一原理又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特点指出：敌据城市我据乡

村，但乡村最后能够战胜城市的科学论断。从而使全党全军从理论上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式方法与步骤，以及为什么必须树立持久胜敌的思想（4）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理论。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在肯定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等建军原则的基础上，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明确地提出和强调必须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共产党员不争个人兵权，但必须争党和人民的兵权；军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以及革新军制，努力实现军队现代化等。从而使人民军队的建军理论更趋完善。（5）关于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中，明确地提出，必须广泛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方针。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以下观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根据地人民，实行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突出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从而把人民战争思想又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6）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在相继发表的几篇主要军事著作中，提出和创造了一整套的战略战术理论。即：第一，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明确指出，积极防御就是攻势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必须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第二，游击战争的战略理论。他指出，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特点所规定的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和广大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决定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游击战必须向正规战发展才能最后战胜敌人；第三，持久战的战略理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无论是对于国内革命战争，还是对于民族革命战争，都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和政治上敌退步我进步等根本特点决定的。不论是阶级的或民族的革命战争，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经过一个逐步发展壮大自己，消耗削弱敌人的持久的战争发展过程；第四，军事战略转变的理论。必须依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争形势的发展，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转变，以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和采用适当的作战形式，才能战胜敌人；第五，战役战术的基本理论。为了贯彻积极防御和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在战役战斗中制定了服从和服务于战略方针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原则，如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相结合等。上述这些理论说明，尽管全党全军当时在认识上还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提法，和提出表现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形式，但实际上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已客观地存在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完善，是我军军事思想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它使全党全军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在如何认识、研究和指导战争等基本问题上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空前提高。对夺取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证表明，三个方面之间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各自从不同侧面证明和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初期已基本成熟。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发展时期

全国解放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空前紧张、激烈和大规模的战争实践中经受反复检验并进一步得到重大发展的最重要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根据敌我双方政治形势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适时把握战机，

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这次战争和近百次重大的战役。复杂而有利的战争形势和战争舞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其指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民解放军经过了战略防御，特别是经过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等阶段，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解放了全国大陆。在伟大的战争实践中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它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十大军事原则”和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等重要著作、文电和作战方针中。

（一）极大地丰富了战略防御的理论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战略进攻与战略决战的理论

关于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理论，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均有深刻论述，而对于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理论则尚未论及。真正从实践和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在解放战争的中后期逐步实现的。（1）制定了在战略防御中采取先在内线歼敌而后再转至外线作战的方针。毛泽东强调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并号召全党全军必须树立持久胜敌和依靠自力更生胜敌的思想。（2）提出了正确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方向、样式、部署和实施步骤。毛泽东根据战争的第一年已歼敌 120 万人，迫使国民党军停止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我军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倒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与外线作战相适应的创立根据地、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政策。（3）适时地进行战略转变。作战形式由基本上是运动战逐步向以攻占中大城市的阵地战为主的转变。明确提出，在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的同时，“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以攻打城市为主的阵地战理论有了重大发展。（4）创造性地提出了战略决战的理论。战略决战的时机和方向，战略力量的部署和运用，战略全局的关照，各战略区战役行动间之协调，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以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等理论，都在战争实践中相继产生。并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性战役的伟大胜利。（5）发展了战略追击中实施远距离包围、迂回等追歼逃敌的作战原则。即在敌快速溃败退却时，为不使敌逃到海外或国外，我军应不理敌“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敌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方能掌握主动。总之，对各逃敌均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二）提出了以打歼灭敌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对我军传统作战原则的系统总结和科学概括，并融进了新鲜经验。它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主要作战方法。它围绕着歼灭战这个核心思想，对作战方针、歼击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以及补充休整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主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8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3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33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40 页。

要强调：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以阵地攻击战夺取据点和城市。在攻城时，必须视敌守备强弱程度，分别情况夺取之；采用各个击破方法，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取小中城市 and 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每战均应力求有准备，有胜利的把握，如无好打之敌，则应忍耐待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地连续作战的作风；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补给来源主要在前线；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间隙休整部队，但休整时间一般不宜过长。“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使我军歼灭战思想更加理论化、系统化。

（三）完善了以新式整军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军队思想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毛泽东人民军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发展。（1）明确提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要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战。强调我党我军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从而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理论更加具体化。（2）强调进一步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特点，提出了在全军开展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运动。这一运动的适时、正确开展，大大地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人民而战的觉悟性，增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和群众性练兵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扬了军队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从而极大地增长了全军的战斗力。（3）重视加强各野战兵团建设的进一步正规化。强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必须贯彻“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方针。坚决克服军队中还严重地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各兵种的建设和海空军的组建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使我军建设开始向现代化和正规化迈进。

（四）发展了以打大运动战、大歼灭战、大追击战为主要样式的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根据战争的政治目的，明确提出“为着反对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开展最广泛的人民战争。在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和战役规模空前的条件下，无论在宣传、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战线的组织与斗争方式的运用，以及直接支援战争的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发展。这一时期人民战争的最大特点，是与战争空前规模的正规性相适应，充分体现了大运动战、大歼灭战、大追击战的现代人民战争的样式。当解放战争刚一爆发时毛泽东就指出，最重要的是充分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4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5页、第330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5页、第33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发动群众，使我党我军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时，他又指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争取胜利的关键，除善捕战机，坚决勇敢，多打胜仗外，就是“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做到这两点，我们就胜利了。淮海战役时他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和中共华东局、中原局准备动员上百万民工参战。强调“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必须对于广大军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对敌军开展有效的政治攻势等。认为只要注意和完成了这些条件，就可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当三大战役即将结束时，他又在准备战略追击的部署中提出：必须动员解放区人民加强工农业生产，修复主要铁路与公路，做好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积极支援前线，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

（五）创立了以军事打击为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战争指导理论

毛泽东历来把瓦解敌军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和三大原则之一。但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这一思想却有了重大发展，并逐步形成与军事打击相配合互为辩证运用的一种战争指导艺术。1945年10月，我军在平汉战役中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领该军及河北民军共万余人起义后，毛泽东即根据这一经验指示全军，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必须“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战略决战阶段中的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后，毛泽东根据争取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的成功经验，又先后在淮海、平津两战役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密切地结合起来，并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反复向冯治安、黄维、刘汝明、杜聿明、侯镜如、傅作义等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甚至针对不同情况提出对某些敌军应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并强调“嗣后每攻一城都可采用公开劝降的办法，即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平津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根据政治争取敌军高级将领率军起义的基本经验和国民党军尚存的一百余万兵力的实际情况，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解决这一部分敌人可采用三种方式的方针，即用战斗解决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和有意保存一个相当时间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在后来的战争指导实践中都得到了成功运用，并在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中获得了重大效果。此外，毛泽东还根据这一思想针对全国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开展正面战场的军事打击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蒋政治运动相结合的“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

上述这些理论的提出和成功运用，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现和结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发展成为一个内容更趋完善、理论更为科学的完整体系。

五、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时期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88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5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58页、第63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58页、第635页。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建国后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敌斗争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中，多方面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建国后发展的繁盛时期。长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推动和促进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创造性地发展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战争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积极地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建国后不久便毅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出兵决策，履行了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国际主义战争。（1）树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辩证统一的观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把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履行和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一理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早已产生，但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和发展。1950年10月，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正当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和唇亡齿寒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认为，决定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损失，美国侵略者则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而“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这里所说的积极政策，就是只有出兵抗美援朝，才能真正做到保家卫国。因此，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从而，把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2）树立共产党人敢于把自己摆在斗争第一线的观点。中国人民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从当时的整个国际战略形势考虑，不仅直接挽救了危难中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这块东方阵地。而且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三军兵力，减轻了帝国主义在欧洲对苏联的压力，消除了美苏之间的正面冲突。被国际评论说，中国人民“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这一正义行动，无疑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一种国际主义的援助，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此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还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先后领导中国人民大力援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法或抗美救国战争，并直到取得彻底胜利。

（二）发展了更加广泛深刻的人民战争理论

建国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广泛、深刻的特点，即具有全民性、民族性、国际性的内含。（1）动员、组织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共同战斗，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从物质上、人力上、精神上大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同时，还在全国开展了一个仇视、鄙视和藐视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宣传运动，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努力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还多次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5页、第34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5页、第34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7页。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637页。

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尊重朝鲜人民、军队、政府和劳动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强调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和人民志愿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与朝鲜人民政治上亲密无间，军事上密切协同，生活上同甘共苦，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时说：“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就用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之敌。（2）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持反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动员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进一步开展反对战争，保卫持久和平的运动，得到了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使美帝国主义日益陷入孤立，从而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毛泽东后来在讲到这一问题时说：“在国内，我们是依靠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巩固与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和支持。”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还针对美帝国主义扩大对印度支那半岛的侵略战争，庄严地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指出，在正义战争的前提下，在各国人民的大力援助下，“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但是对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发展，而且对于号召处于小国地位的印支人民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敢于和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亦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3）实行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战略。50年代末期，当帝国主义势力包围着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从保卫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号召与提出在全国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社会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把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实行全民皆兵的防御战略。并在国防建设中坚持贯彻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全民国防方针。这些都是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它在当时对于制止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犯曾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遏制作用，并为后来完善我国的兵役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在保卫和建设国防的实践中人民军队思想得到了重大发展

建国后我军的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围绕着国防现代化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因而，使毛泽东的人民军队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创新性的突破。（1）实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建军方针。在艰苦的、国际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特定条件下，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残酷斗争的环境中，我军进一步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但在与敌人比政治优势方面取得了新的经验。而且在军事建设上，如组织部队轮番作战，加强各军兵种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新的理论。不但使我军各个军兵种在战争实践中迅速得到了发展，而且还使大量部队和大批干部经受了战争锻炼，使抗美援朝战争成了一个大学校。毛泽东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时曾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1页。

《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

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2）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理论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特点提出，为了防御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必须建立巩固的国防，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随后即相继组建和成立了各个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以及各类军事院校；建立国防工业体系，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部队全面转入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努力提高现代战争的协同作战能力；反对照抄照搬外军经验，坚持“以我为主”的建军方针；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科学等。从而，把我军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3）军事组织、指挥体制的理论有了重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的组织指挥体制。这种体制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属性及党和国家根本性质的一致性，正确地解决了党和国家对人民军队和武装力量的领导和指挥问题。并根据这一原则又正确地划分和确定了各战略区、各军兵种平时与战时的领导关系与指挥原则。

（四）发展了不同作战条件下的攻防作战原则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活的灵魂。其基本点就是；必须根据不同的作战地域，不同的作战时间和不同的作战对象，采用不同的作战原则和方法。这一思想在建国后保卫国防安全极其复杂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使我军的战略战术理论有了重大突破。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人，针对敌人强大，拥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异国作战，战场狭小；我军参战军兵种多，协同作战困难等新情况，在持久胜敌方针指导下，科学地预见战争发展形势，正确地进行战略战役决策，并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始终把握了战争主动权。在战争指导下，重视及时总结作战经验，提出了在运动战中“对美英军目前应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作战原则；把阵地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肯定了相持条件下作战的经验，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攻防作战等“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使阵地战的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夜间作战行动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夜战规模由战术范围发展成战役甚至战略规模，夜间作战理论空前发展。总之，集中到一点，就是取得了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基本经验和理论。（2）在保卫海边防的武装斗争中制定了灵活多变的作战原则。对于蒋帮空投和海上偷袭的特务干扰，采取发动当地军民，组织联防，先围而后歼的战术；对于粉碎蒋帮可能对我东南沿海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则采用“诱敌深入”方针，利用人民、地形等有利条件，将其各个加以歼灭；对于周边敌国的小规模武装侵犯，则采取集中兵力，坚决反击，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在贯彻这些方针和原则中，必须充分发挥我军陆海空三军和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整体威力。如此等等，都是“十大军事原则”传统战法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五）坚持和发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武装斗争策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3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2页。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国民党坚持持久抗日战争，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一条基本的军事斗争原则。建国后，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国际战略斗争的实践中，又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我军正确处理国防战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其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侵略别人；但是，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又绝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的侵犯。因此，就必须制定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反映我国政治本质的军事斗争原则。这就是政治性原则，防御性原则，制约性原则，亦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这一原则反映在斗争实践中，例如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斗争与政治谈判相结合。当敌人以军事进攻企图压服我方时，我则坚决予以反击，并一定打胜。但反击的规模、时间又是有一定限度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这就是斗争的原则立场是坚定的，而斗争的具体策略则是灵活的。又如，我军在历次保卫边境的自卫还击作战中，始终坚持不打第一枪，但在敌方不听劝告，再三挑衅或武装侵犯的情况下，我军为了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则坚决进行还击或反击，但反击的目标则又是有限度和有节制的，并先后取得了中印边境、中苏边境和中越边境等自卫还击作战的伟大胜利。再如，我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是为了防御和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因而多次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思想，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核战略中的具体反映。总之，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经过建国后四十多年的斗争实践，已发展成为我国在处理国际战略关系和国防斗争中的基本准则。

毛泽东军事思想经过上述几个发展阶段，在革命战争和军事实践中由形成、发展到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步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并成为我军建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的理论武器。但是，一切理论、思想、方针和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今后的建军作战实践中仍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与历史地位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理论总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土壤之中。中国革命战争的独创性，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不同于其它军事理论的鲜明特征，并且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的特征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具体化。正如周恩来在讲到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时所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具体地说，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同于其它军事理论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进的科学性

从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以前，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含有部分的真理性的颗粒，在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在总体上，它们都还不具备先进的科学性，其原因主要是由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一方面是由这些军事思想所反映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这些军事思想往往是以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所决定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具有先进的科学性的军事思想体系。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最本质的不同之一。例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基础，不仅被誉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且还被称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它虽然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孙子在处理战略战术问题上的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是朴素的带有自发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体系，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孙子兵法》中的英雄史观更为明显，在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孙子提出了愚兵思想，主张“愚士兵之耳目，使之无知”，达到“若驱群羊”之目的。再例如，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尽管其中含有真理性的颗粒，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说：《战争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但是，由于克劳塞维茨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思维方法上从纯逻辑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最终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相反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我们只能把政治

《周恩来选集》（上）第336页。

《战争论》第1卷，第17页。

看作是全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很明显，他并没有完全科学地揭示出战争的真正本质，掩盖了战争政治目的的阶级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

不难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以前的其它军事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以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而后者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或唯心论为指导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决定其军事思想的科学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先进科学性还在于它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战争这一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发展规律，具有更加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因此，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取得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往往便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已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陈毅在党的“七大”时起草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假如历来军事家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或侵略者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而无产阶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最能揭示和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种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决定了尽管我们的敌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了解它、熟悉它，并企图通过对它的认真研究以寻找对付它的办法，但却不能运用它，更不能战胜它。

（二）广泛的人民性

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创立以前的一切其它军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这一特征。孙子的军事思想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它主要反映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它主要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尽管这些军事思想也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他们还只是仅仅把人民群众看作可以借用的工具，以实现统治阶级的目的。因此，他们的军事思想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反人民性的军事思想，这是由他们的军事思想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广泛的人民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与一切非无产阶级军事思想不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广泛动员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是广大人民群众谋求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它认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只有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因此，它把人民战争理论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除此以外，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来看，无论是人民军队理论，还是人民战争理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民群众这一基础之上的。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毛泽东军事思想，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的。

（三）显著的实践性

美国人戴维逊在分析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的特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不记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

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①实践性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之一，这一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在院校里推究出来的空洞理论，而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起来的。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也就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因此，从其产生来说，它离不开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第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为实践服务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而且也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服务的，这与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纯学究式的理论根本不同，它来自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指导思想。第三，毛泽东军事思想随着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发展的科学理论，其发展的动力不是其它，而是实践，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这几个大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这几个发展阶段。第四，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其重视战争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过：“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这就是说，战争实践是掌握战争基本规律的重要方法。因此，他强调在研究和指导战争时，必须把战争实践摆在第一位。上述可以说明，实践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一切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空洞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实践性的特征，从客观条件上说，是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有着特殊发展的规律性，要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深入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经验、去发现真理。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必然具有实践性的特征。从主观条件上说，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主要杰出贡献的毛泽东是以伟大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集于一身而出现在战争舞台上，他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情况进行认真研究，坚持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书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军事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使他能从长期亲自参加和指导战争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同时也有条件在战争实践中反复检验和发展自己的论。

（四）极大的创造性

中国革命战争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极大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最显著地表现在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些新问题。例如，武装斗争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关于建军的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理论和原则。还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从开始那一天起，就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这一特定的战争客观条件之下，从这一客观条件出发，毛泽东以最大精力从事于如何以弱小的军队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的研究，创造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性地提出了如何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一整套理论。刘伯承在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时就曾这样说过：“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其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外国一些军事评论家也曾这样指出：“自古以来，‘优胜劣败’是兵家不变的常理，”“毛泽东却恰恰在以劣对优或以弱对强时，把‘优胜劣败’的规律彻底推翻了。这就是毛泽东兵法的特色。”由此可见，毛泽东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必然带有创造性的特征。

（五）独特的民族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指它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毛泽东历来十分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他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又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性。

从其思想内容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军事传统文化，并使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例如，对春秋末期孙武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毛泽东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化的科学解释，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这就把孙武的朴素认识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加以解释，从而使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善于运用中华民族的语言表达形式阐述军事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深刻道理在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中得到体现，从而易于应用和群众化。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表现形式上的民族性，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形象的比喻，使深奥的原理通俗化。毛泽东为了教育红军安心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曾把根据地比作人的“屁股”。他说：人假如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站着，老走着，定然不能持久。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这形象地比喻深入浅出，使人们容易达到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二是借用历史故事，使复杂的理论简明化。毛泽东曾利用群众比较熟悉的《水浒》中，洪教头气势汹汹要打林冲，结果被退让一步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踢翻的故事，来阐述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往往采取有计划战略退却的原则。三是善于归纳概括，使实践经验条理化。毛泽东还利用我国人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47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2 页。

民以口诀、条规记叙问题的传统习惯，把从战争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加以提炼、概括，用十分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如工农武装割据、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等，都具有独特民族语言风格，使人较容易记忆，便于广大军民掌握和应用，成为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

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宏伟、最错综复杂的一场人民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这场战争的实践中所创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标志着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理论在中国的确立，它不仅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财富，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的指导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军事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地位作用，主要取决于它本身的科学性和对革命战争实践所起的巨大指导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于水火，曾多次进行了英勇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其间，包括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多次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战争，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军事斗争，乃至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领导的北伐战争。但是，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之前，我国始终没有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人民武装革命，并把这场斗争引向胜利的新型的军事理论。当时，有的人曾推崇过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有的人信奉过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也有的人照搬过苏联的军事理论，然而，最终都没有能引导这些斗争走向胜利。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并且产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如何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

回顾自 1927 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以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军先后进行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一次抗美援朝战争，数次为保卫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的自卫反击战，都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以劣势装备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靠的不是别的，主要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先进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来看，在任何情况下，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便能胜利：如果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革命战争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我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违背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照搬苏联和外国战争的经验，从而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重的失败。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军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和我军在多次失败和胜利的比较之后，在长朗革命战争实践之后，特别是在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之后，所作出的必然的历史抉择。

邓小平指出：“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

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就明确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在战争年代引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这是因为：第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建军规律和原则，仍然符合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新情况。与战争年代相比；当今我军的情况随着国情的变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建立了有一定基础的国防，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军肩负的任务已由进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这些新的变化必然对我军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看，毛泽东为我军所规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等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军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建军规律和原则，不仅适用于战争年代我军的建设，而且也适用于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新情况。第二，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战争胜负的基本规律，仍然是适用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同过去我军所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比，虽然武器装备和战争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战争所具有的一般的规律却没有变。例如，海湾战争是迄今为止最现代化的一场高技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先进的技术装备显示了巨大的优势，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规律。这一基本规律不是别的，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就是说，技术装备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客观因素，要最终把战争胜利的可能转变为现实，必须依靠人的力量。这一战争胜负的基本规律，不会因技术装备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仍然能够，也完全能够指导我军打赢未来的高技术战争。

总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是我军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迅猛发展，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1）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理论。列宁、斯大林通过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开创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首先发动城市起义，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以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革命道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走什么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遇到也没有解

《邓小平文选》第2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决的问题。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条件所具不同特点的分析，提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

(2) 开创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军队的先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武装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思想。列宁、斯大林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第一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军队，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理论。但是，在工人阶级数量较少，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国，怎样建立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系统地解决了怎样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

(3)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理论用来考察战争，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列宁、斯大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仅领导苏联人民成功地进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人民战争的实践，而且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战争理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人民战争作为根本指导路线，广泛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实行了全面彻底的人民战争，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理论。

(4) 提出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实践还比较少，因而不可能形成系统的战略战术理论。列宁、斯大林在认真总结十月革命和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战略战术理论。但是，中国革命战争与苏联的战争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这就决定中国革命战争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苏联的战略战术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提出一整套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战略战术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战略战术理论更加全面和完善。(5) 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思想。朱德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极为重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但他们都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研究战争问题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军事辩证法”这一带有明显实践特性的范畴，并科学地提出了军事辩证法的若干范畴，使无产阶级战争观和方法论理论更

加系统化。总之，毛泽东军事思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而在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三）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其理论价值举世公认。正如西方军事评论家所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1）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影响。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人民战争思想，游击战思想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影响极大。本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成了许多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革命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孟加拉《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为了夺取人民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大量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这些都是从事革命斗争的人必读的作品。”马里《发展报》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中国走上战胜帝国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是第三世界大多数人民要走的道路。”《巴基斯坦时报》在评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时这样写道：“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是一位开路先锋，他的人民战争学说，对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亚洲，越南人民曾结合自己的斗争实际，运用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采取破袭战、伏击战、竹尖战、地雷战等多种游击战战法，先后战胜了拥有优势装备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国侵略者。越南的武元甲曾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我党领导这场抗战有着重大的贡献。自1950年以来，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军民更有条件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宝贵经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创造性地成功地运用到我国的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中去。”日本的市川宗明在其《毛泽东的世界战略》一书中也指出：“胡志明的军队自始至终都把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作为其战略战术的基础，并以此来发展自己。”英国的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在他所著的《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指出：“在印度支那，毛（泽东）的学说使越盟找到了另外的对策，代替了他们所没有的坦克、飞机、伞兵和凝固汽油弹。”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军民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斗争中，曾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吸取力量，经过七年多的战争，终于战胜法国殖民主义者，争取了民族的独立。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的自由战士，运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结合本国情况，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建立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开展游击战争，最后亦取得了独立。在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也不断发生，毛泽东军事思想在那里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古巴的一位游击队指挥官曾著文说：“我在古巴发现有许多革命军官都在读毛泽东论述中国国内战争的著作。毛泽东对古巴革命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是这种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一位阿根廷友人也说，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根本保证。六十年代，一位名叫冈村昭彦的日本军事记者，在访问中南美洲后曾写下这样一段观感：“最近我到中南美洲跑了一趟，行前访问了五角大楼，他们告诉我，起初，美国国务院

（英）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揭开我们时代军事奥秘的人》，转引自《外国军事学术》增刊第22期。
《莫边府》，人民军队出版社1946年河内越文第3篇第153—154页。

认为，多米尼加革命是卡斯特罗搞的，可是美军到了多米尼加，才知道多米尼加革命的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我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中国是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多米尼加不受古巴影响、而受中国的影响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多米尼加的革命部队。那知道那里的战士一见我这张东方人的面孔，就以为我是中国人，兴奋地把高高举起，欢呼‘毛泽东来了！中国人来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影响。

（2）毛泽东军事思想对西方国家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被称为“军事巨人”的拿破仑，并没有留下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仅仅留下一些片断的军事格言。后来，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经典作家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拿破仑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写下了《战争论》这一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他曾感慨地说：“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钝金属铸块。”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愿望，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没有人能够实现，实际上是由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来完成了这一任务。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从它形成之日起，就受到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注意。1961年2月26日，美国《星条报》登载了合众社的一则消息：肯尼迪“对毛泽东有关游击战的著作很重视，并要求陆军研究毛泽东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基辛格在《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也指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反对以纯军事性考虑为基础来进行速决的战争，而这种观点却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主要基础。”美国的一些军事院校还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课程。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对西方国家军事理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已经超越国界，在世界军事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并将永远载入人类进步事业的史册。

第四章 毛泽东的战争观与方法论

战争观和方法论，一般是指人们对战争的根本看法和认识以及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的基本理论，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及其运用。在战争发展史上，当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在阶级社会中一出现，即产生了各个阶级对战争的不同看法和认识，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战争观和方法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理论，即毛泽东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的战争观理论

毛泽东的战争观是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本质及其它有关问题的根本看法，它主要是通过通过对战争产生、发展、消灭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战争与政治、经济等相互间的必然联系的揭示，从而正确认识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目的、消灭战争的途径等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一）战争及其产生的根源

战争是什么？这是一个极为古老而又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无数次战争，它葬送了数千百万人的生命，毁灭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因此，战争，从它产生那天起，人们就开始对这个“怪物”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探索。然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宰事理论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科学的答案。至今，在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教科书中还这样写道：“战争是敌我意志的冲突和信念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给战争下过明确的定义。毛泽东科学而完整地给战争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指出：“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时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的这一战争定义基本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和私有财产以及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说明战争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永恒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第二，它指明了战争的主体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等群体。第三，它指明了战争是解决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而不是一般的斗争形式。

那么，战争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根源又是什么？对于这样问题的回答，从古至今基本上存在着这样几种看法。一种是神学战争论，认为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神或上帝的意志、报应和安排。第二种是人性战争论。它把战争产生的根源归之于人类好斗的生物本性和欲望。中国古代的《吕氏春秋》中便写道：“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说：“战争、战役和革命都来自人以及人的

《作战理论入门》第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吕氏春秋·荡兵》。

欲望。”第三种是民族战争论。这种理论认为战争根源于民族之间的差别。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瓦尔特·罗斯托夫说：“战争，说到底是因为存在一种我们称之为民族独立的概念的缘故。在独特的传统和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统一国家就会导致不断产生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第四种是人口战争论，这种理论把战争根源归之于人口的增殖。法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加斯頓·博托尔认为，把社会推向战争的“原因是人口数量超过了完成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需要的数量。”第五种是不可知论战争论。这种理论认为战争是一种心灵性的流行病，其原因是未知的和不易发现的，因为有许多不同种类的障碍足以妨碍对此现象的任何客观性的和科学化的研究。第六种是经济利益战争论。这种理论把战争的根源和财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认为财富是引起战争的根源。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朱利安·哈克斯莱说：“战争是与财富积累的现象相联系的。这种财富是冲突的目的物。”上述这些五花八门的战争根源理论，虽然有的在探索战争根源的长途，向真理迈进了一步，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地揭示出战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坚持从战争与私有制和阶级的内在联系上考察战争的根源，认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的必然产物。正如列宁所说：“战争同私有制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根源理论。他不仅指出：“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而且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由此可见，在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的社会中，战争是和私有财产及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而私有财产和阶级又“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所以，战争产生的最终根源不是别的，而在于社会的经济活动之中。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最根本是物质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在人类原始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极为不发达，生产资料是原始的公有制，那时还不可能产生战争。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进入了氏族制的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几个氏族开始组成了不同的部落。这时，生产资料虽然还是原始的公有制，还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但是，每一个氏族部落为了生存而进行了简单的生产活动，开始把土地等自然条件作为生产的前提。虽然，土地等自然条件还是公有的，但是，每一氏族部落都有占有权。因此，当某一氏族部落在它把土地等自然条件当作自己部落的东西来对待时，就会碰到的唯一障碍，这就是业已把这些生产的自然条件当作自己的东西而加以占领的另外一个氏族部落的反对，为了解决这样的冲突，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战争。因此，这种完全不具有任何阶级属性的氏族部落之间的

《理想国》。

[波 JT·皮乌罗《战争的哲学》，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3期。

同上。

同上。

《列宁军事文集》第24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4页。

《反社林论》第160页。

战争，它的产生除了复仇等原因外，主要地是产生于原始民族部落为维护生存的物质生活之中。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力地促进了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时。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出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了，剥削者为了占有更多的私有财产，需要吸收新的劳动力，而战争为剥削者提供了新的大量劳动力。这样，具有阶级属性的战争便产生了。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的最后时期，“铁已在为人类服务”，铁器的使用，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便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随之出现了商品生产，财产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最初的剥削者——奴隶主阶级为了掠夺别人的财富和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建立起了军事组织，战争完全成为了一种正常的营生。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冲破了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伴随着这种私有财产和阶级而来的掠夺奴隶和财产战争便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说明了毛泽东指出的：“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论断是科学的真理。

（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揭示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是说明战争本质的关键所在，也决定了这是毛泽东战争观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军事思想史上，最早较全面而深刻阐述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从抽象的战争概念出发，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的目的就是彻底打垮敌人，为了达到此目的，敌我双方都应把力量的使用推向极限。然而，克劳塞维茨在通过研究大量的战争事件以后，他发现在现实中的战争，并没有按照纯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本性发挥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克劳塞维茨说：“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是不同，……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他进一步研究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最终发现，这不仅因为存在着内部阻力，而且还由于存在着外部原因，即作为战争的政治属性。因此，克劳塞维茨得出结论说：“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为了精确而简练地说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一句至理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从而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不难看出，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本质的揭示，完全是从纯战争概念的逻辑推演中得出结论的。但是，他正确地揭示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4—18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4—186页。

《战争论》第23页。

《战争论》第50页、第894页、第43页。

战争与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否定了长期以来把战争看成是完全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的现象的错误看法。正是由于这一点，引起了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极大兴趣。他不仅详细而认真地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而且写下了大量的批注。列宁认为《战争论》中论述战争和政治关系的第六章是“最重要的一章”，并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诸熟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毛泽东正是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别性。

（1）战争与政治之间的一致性。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与政治之间的一致性时认为，政治是整体，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部分是不能脱离整体而独立存在的。他说：“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又说：“必须把它（战争）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思想表示赞同。他写道：“战争 = 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 = ‘政治’。”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一致性。他认为这种一致性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决定战争，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战争。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他还以中国抗日战争同政治的关系具体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侵略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因此，要取得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就绝不能有轻视战争的政治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另一方面，战争又反作用政治，为政治服务。毛泽东曾经在分析坚持抗战和政治进步的关系时这样说过：“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因此，战争对能否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又有着制约作用。

（2）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差别性。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差别性时说：“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这种手段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毛泽东认为战争与政治之间既有相互一致的一面，又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即战争和政治相比，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4页。

《战争论》第894、895页。

《战争论》第894、895页。

《列宁军事文集》第191页。

《毛泽东选集》2卷，第479页。

《战争论》第44页。

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他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例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认为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侵略者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而帝国主义的压迫，早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中华民族，要完全断送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而是一定阶级用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殊手段。战争不是解决所有政治矛盾的一般手段，而是解决对抗性政治矛盾发展到激化程度的特殊手段。战争并不是解决所有对抗性政治矛盾的唯一手段，而是解决那些用其他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外交的等手段，无法解决的对抗性政治矛盾的一种最残酷，最激烈的暴力手段，这种手段的特殊性最主要地体现在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把“流血”和“不流血”作为战争和政治的根本区别，这一思想应该说来源于克劳塞维茨。这也就表明，战争是武装暴力冲突的一种最高形式，“武装暴力”是战争自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和主要特性，正是这种要素和特性使得战争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其他活动形态有了质的不同，这是战争的质的规定性。离开了这一质的规定性，战争也就无从谈起。也正是基于战争的这种特殊性，毛泽东认为必须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双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正因为如此，战争的经验也是特殊的，人们绝对不能按照一般的政治去对待战争，必须脱出寻常的习惯而习惯于战争，即按照战争自身的特殊规律去对待战争，方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否定战争自身的特殊性，把战争这种流血的政治完全等于一般的政治，就不能对战争有正确的认识。

从毛泽东对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和差别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因此，在存在着阶级对抗和帝国主义的制度下，不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另一方面，又由于战争不是一般的政治，有其特殊性，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战争，把握战争自身的特殊规律，以正确指导战争。

（三）战争依赖于经济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战争与经济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既表现在战争依赖于经济方面，又表现在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和制约方面。

战争依赖于经济是多层次的。从战争根源来看，经济是战争产生的最终根源；从战争追求的目的来看，经济利益是战争追求的最终目的；从战争的物质基础来看，经济则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战争对经济的这种依赖关系。首先，恩格斯阐述了经济是暴力的本原的理论。杜林曾经认为：“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针对杜林的这一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其次，论述了经济是暴力的物质基础的理论。恩格斯说：“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依赖于经济的思想具体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

(1) 毛泽东注意从经济问题出发分析不同战争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正是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毛泽东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存在着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战争，一种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它是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另一种是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它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在分析这两种战争之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时指出，就在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与中国社会经济之间的必然联系。

(2) 提出了“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的思想。毛泽东认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而且也是经济的竞赛。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物质基础。经济的条件不仅可以规定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其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因此，在革命战争中，必须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问题，为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储备充足的粮食，是巩固红色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作为选择和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强调指出：“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在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把进行经济建设，保障战争胜利作为主要方针之一。他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资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因此，必须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使我军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转引自：《反杜林论》第 169 页。

《反杜林论》第 156、171 页。

《反杜林论》第 156、17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3 页。

同上书，第 1 卷，第 119 页。

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解决战争的物质条件问题，提出只有解决好经济问题，“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因此，经济问题将最后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注意经济建设，“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3）正确处理了战争和经济力量建设的矛盾，主张边战争边搞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在战争时期，经济建设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必须为了战争，服从战争，而不能影响战争。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搞好经济建设的具体政策，如要边打仗边生产，劳力和武力相结合，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重要等，有力地保证了经济建设工作的开展，解决了战争和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提高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四）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列宁曾经说过：“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所谓战争的性质，是指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家对战争性质的问题已有初步的认识，他们提出了“义”和“不义”作为区分战争性质的标准。他们认为：“诛暴救弱，谓之义兵。”反之，即是“不义”。这一朴素的思想表明了人类在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上深入了一步。但是，古代军事思想家的“义”和“不义”主要还是一个道德判断标准。因此，他们往往偏重于从道德上谴责不义的战争，而歌颂“义兵”。毛泽东简明而科学地概括了战争性质。他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那么，究竟根据什么来确定战争的性质呢？列宁认为，战争的性质既不是由人的主观“善良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决定的，最基本的问题是看战争是那一个阶级进行的，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他指出：“决定战争性质的是战争是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这就表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并不是单纯的道德标准，而首先是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标准。战争的性质主要决定于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内容。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把战争的进步性和非进步性作为判断战争性质的标准。他指出：“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就是说，一切为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谋求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进行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一切为了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维护反动统治，为了侵略扩张和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正义战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是进步的；非正义战争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因而是反动的。

根据对战争性质的区分，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对战争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0页。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1页。

《诸葛亮明异传》卷3，《兵戒》。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5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正义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这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或拥护一切战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进行的掠夺、镇压、奴役各国人民的反革命的非正义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我们拥护的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的正义战争，拥护的方法是积极赞助和必要时直接参加。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确态度，这同他能够正确认识正义战争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是紧密相联的。对于战争的社会作用。斯大林曾经指出：“战争也和生活中一切事物一样，除了有消极的一方面外，还有积极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说，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种种的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从积极的方面说，战争能够唤醒群众，加速革命发生的进程，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极端有害和反动的社会制度，战争对它起着一种破坏作用。正如列宁所说：“正象木乃伊在接触空气时立即解体一样，战争给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最后的判决。”毛泽东对正义战争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正义战争一是具有教育群众的作用。正义的革命战争，能够净化人们身上的污浊，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激发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敌。二是具有改造作用。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革命战争可以根本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砸碎旧的上层建筑，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正如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三是具有拯救作用。毛泽东认为在民族危急时期，正义的革命战争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他说：“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正因为毛泽东对正义战争的社会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他既不是从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去反对一切战争，咒骂一切战争，也不是象黠武主义者那样盲目地去参加一切战争，挑动战争，而是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这也就是毛泽东多次所指出的：“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

（五）研究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共产党人为什么要研究和从事战争呢？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限。”又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4页。

《列宁全集》第11卷，第585页。

《毛泽东选集》第30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17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

同上。

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研究和从事故争的出发点，区别于其它一切剥削阶级。它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也不是为了掠夺或侵略而战争，而是为了消灭战争，实现人类永久的和平，这是无产阶级研究和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的科学含义。这一目的是同无产阶级最后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毛泽东认为，由于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阶级。因此，要最终消灭战争，必须首先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他说：“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他还指出：“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使战争消亡，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呢？“人口战争论”提出了一种“自我调节论”。他们认为，战争既然是由于人口增殖而引起的。“战争可以吸收这种人口‘过剩’，造成一定的‘人口陷落’。当战争发展到国家不能为前线提供足够数量的人员补充和生产无法满足前线需要时，武装活动就会停止，于是出现了和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提出过“以战去战”的思想。他们认为：“杀人安人，杀之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是一种主张用战争消灭战争的朴素认识。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战争消亡的途径。他指出，消灭战争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又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这是毛泽东把战争和私有制以及阶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得出的必然结论。这是因为，一切革命的阶级要消灭产生战争的根源——私有制和阶级，而私有制则是一切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一切剥削阶级必然要用武装暴力来进行反抗，以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决定了革命阶级只有用战争去消灭战争，舍此便不能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

（六）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无产阶级研究战争和进行战争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实现消灭战争，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一最终目的。那么，战争与和平又是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对矛盾现象，二者互相对立，互相统一，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他指出：“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同上。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5页。

[波]T·皮乌罗：《战争的哲学》，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3期。

《司马法·仁本》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8页。

战争与和平的互相排斥主要表现在：这是两种不同质的社会活动状态。战争是社会活动处于的暴力状态，和平则是对战争的否定，其中主要是对战争的暴力方面的否定。因此，和平是社会活动处于一种非暴力状态。但是，两者又是互相联结的。这种互相联结首先表现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依存性上。这就是说，战争与和平各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没有和平就无所谓战争，没有战争也就无所谓和平。这也就决定了战争与和平只有在各自对方中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其次，表现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渗透性上。这就是说，战争时期存在着和平，和平时期也存在着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总之，战争与和平是社会统一体中的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包含着共同的政治本质，都是一定社会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所以，毛泽东说：“平时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

毛泽东还认为战争与和平同其它事物的矛盾双方一样也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它们互相转化的内在根据不是别的，而是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同—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当然，在这里，转化的条件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战争与和平相互间的同一性只为它们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客观的内在根据，即提供了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我们应该注意把握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条件性，为实现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而奋斗。

二、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

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是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的理论。它同战争观是一致的，并受一定的战争观指导和支配。从根本上说，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具体化为一整套唯物辩证的战争认识方法和指导方法，并把它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and 解决。

毛泽东的战争方法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就在于：如何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

（一）认识和指导战争必须把握战争规律

毛泽东十分强调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他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又说：“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这也就是说，把握战争规律这是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根本前提。

同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9—33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

对于战争规律的问题，毛泽东首先认为战争规律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可知的。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暴力性上，即战争是一种流血的实践活动，而且表现在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实性上。这是因为战争双方都是活动着的人，相互采取敌对对抗行动，而又非常注意保密，这就决定了它较之别的社会实践活动带有较多的流动性和不确实性。对于战争实践活动的这一特点，虽然一些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也是有所认识的。克劳塞维茨就曾说过：“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蔽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然而，他们根据战争实践活动的这一特点，得出了战争是不存在客观规律的，因此也是不可认识的错误结论。十八世纪法国的沙克斯在他的《战争艺术论》中就这样说道：“战争是一种充满了阴影的科学，在这种阴影之下，一个人在行动时是很难于有把握的。它的基础就是惯例和偏见。”又说：“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惟战争独无”。德国的皮希特也说：“战争是最难理解的人生的现象。它是我们生活的充满神秘性的环境中最不捉摸的重要方面。”即使象克劳塞维茨这样杰出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也是不彻底的。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看到了战争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他强调说：“战争就其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为就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但是，克劳塞维茨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承认战争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的呢？他说：“在纯概念的象领域里”，战争“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只是在纯争概念，即“绝对战争”的天地里，承认战争是按照其自身的内在律发展的。而作为现实的战争，“是不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

因此，他说：“战争有它自己的语言，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表现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规律的认识上是不彻底的。

毛泽东则与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不同。一方面，他承认战争有流动性和不确实性的存在，认为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它较之任何其它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但他又认为战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神物，仍是人类社会矛盾发展的一种必然运过程。在客观物质世界中，任何的物质运动过程都不是杂乱无的，而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战争，尽管有它“怪”的地方，即有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但它既然作为一种必然的物质运动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自然要受其内在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因此，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毛泽东不仅认为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承认战争规也是可以认识的。他认为战争规律存在于错综复杂的战争运动程之中，战争运动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虽然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战争规律认识的困难程度。但是，战争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都是可以认识的。这是因为：第一，

《战争论》第 68 页。

转引自约米尼《战争艺术》第 1 页。

[德]皮希特《论战争的本质和德国人的军事》第 27 页。

《战争论》第 902 页、第 28 页、第 894 页。

《战争论》第 902 页、第 28 页、第 894 页。

《战争论》第 902 页、第 28 页、第 894 页。

战争规律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战争这一客观运动过程的必然发展的轨道，是战争运动过程的内在逻辑的表现。从其存在的形态来说，战争规律是战争内部各种因素间的本质联系，不可能象具体事物那样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外在形体。但是，战争规律存在于战争运动过程之中。只要有战争运动过程的存在，就有战争规律。因此，战争规律在战争自身的运动过程中，必然有各种现象提供给人们连贯起来进行思索，人们通过对大量感性经验的积累，用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方法，便能达到对战争规律的认识。第二，战争虽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但也有其相对的固定性。战争的流动性有数的流动和质的流动两种情况，但一般为数的流动。就是说，在一个战略阶段，尽管战役战斗的各种情况会有较多的变化，但是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是不会立即改变的。这种在一定时间内战争的相对固定性，就为人们认识战争规律提供了可能。第三，战争虽具有较多的不确实性，但也有相应的确实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于战争双方来说，每一方对自己的情况还是比较确实的。只是对敌之一方不很确实。不过，也有朕兆可见，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正是由于战争规律存在于战争运动过程之中，战争运动中的绝对流动性同相对固定性、不确实性同确实性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的。因此，战争规律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

毛泽东认为战争规律有一般战争规律和特殊战争规律之分，确切地说，战争规律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战争规律之所以有一般与特殊之分，主要在于战争自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多样性指的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战争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各有其不同的特殊因素；统一性指的是在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战争的差别中，具有共同的一般因素。由于战争的多样性，使得战争存在着多种战争运动过程的具体的特殊战争规律；由于战争的统一性，使得战争又存在着一切战争运动过程的统一的一般战争规律。由此可见，战争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战争规律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所谓一般战争的规律，指的是从各种具体战争的运动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稳定、最一般、最普遍的内在本质联系，它是一切战争在其运动过程中都具有的共同的本质。它所揭示的是战争矛盾的普遍性，是战争的共性。如果没有一般战争规律，那么，整个人类战争的发展过程就会成为没有统一的必然联系的一堆零散的环节，人们也就无法了解人类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和各种战争运动过程的共性。因此，每个战争指导者尽管所面对的是具体的、特殊的战争，但丝毫也不能忽视对一般战争规律的研究和把握。只有把握了一般战争的规律，人们才能够了解战争的共同本质及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而掌握认识和指导战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进一步揭示战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

毛泽东十分强调对战争特殊规律的研究和把握。这是因为，一般战争规律仅仅确定了一切战争在其运动过程中的最一般属性和共同本质，它撇开了存在于各种具体战争在其运动过程中的质的差异性。如果只懂一般战争的规律，不研究和把握战争的特殊规律，便不能对具体的战争进行正确的具体指导。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

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战争的特殊规律是指这样的一些规律，它们不为一切战争运动过程所共有，而只是为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性质的战争运动过程所固有。它们不是所有战争运动过程共同的最一般的内在本质联系，而是各种具体的战争运动过程的内在本质联系。如果说，一般战争规律是一切战争运动过程的共性，并在任何战争中发生作用的话，那么，特殊战争规律只是某一时间、某一地域、某一性质，甚至某一次具体战争过程中的个性，并在其中发生作用。

当然，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并不是相互对立而存在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战争规律总是寓于特殊战争规律之中，始终是在一定的具体战争中发生作用，通过特殊战争规律表现自己的。具体的战争总是异常复杂多样的，而一般战争规律却是一些抽象的、共同本质的规定，总是包括不了具体战争的所有部分、所有方面和所有现象。这就要求我们，要特别注重对战争特殊规律的研究和把握，千万不要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规律，用属于共性的一般战争规律去指导属于个性的具体战争。否则，就会脱离战争实际，犯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认为研究和把握战争规律的目的就在于指导战争，从而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说过：“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为了更好地应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毛泽东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同战争规律对应起来。他认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前者主要是解决如何正确认识战争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问题，即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是为了求真；后者则主要是要解决如何正确应用战争客观规律于自己行动的问题，即解决“怎样做”的问题。因此，虽然战争规律决定着战争指导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只是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两者不可分割。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又是有差别的。认识前者是出于后者的目的，认识后者则是为进一步深化前者。总之，在毛泽东看来，研究和把握战争规律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战争，更重要的是依据这种认识制定出符合战争规律的战争指导规律，能动地指导战争去夺取胜利。这才是研究战争规律的真正目的。

（二）研究和把握战争规律的基本方法

战争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把握战争规律对于战争指导者又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又怎样才能把握战争规律呢？毛泽东提出的基本方法主要有。

（1）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战争。客观性是唯物论的基本特性。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下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地运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用到军事领域，提出了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战争的科学方法，认为只有采用客观的观点，从战争本身固有的特性来考察战争，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毛泽东认为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最主要的就是要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来研究战争。所谓战争的客观实际，就是指战争中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这也就是说，研究战争的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或主观愿望出发，而是坚持从战争客观实际出发，从分析这些客观实际中制定出符合战争客观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是唯物主义方法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

与唯物主义方法相反的是唯心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或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或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克劳塞维茨研究战争时就是从战争的纯概念——“绝对战争”作为出发点的。他说过：“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这种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研究战争的唯心主义方法，是不可能达到对战争规律的把握的。在战争领域中，唯心主义方法还有一种表现，即以主观愿望作为研究战争的出发点。这种不管战争客观实际，相反要求战争客观实际适应人们的思想的唯心主义方法，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战争的客观实际往往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的现象与本质都是对立的统一。现象是表现本质的，本质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但是，现象并不直接等于本质。因此，毛泽东认为，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还必须透过战争客观实际的现象抓住本质，这样才能真正认识战争的本来面目。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怎样才能透过战争的现象抓住战争的本质呢？毛泽东提出：一是要尽可能地收集丰富的和真实的战争实际情况。为此，必须进行“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二是要对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战争本质是隐藏于战争现象背后，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毛泽东指出：“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对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要分析清楚战争的真象和假象。在战争中，许多现象是通过假象而表现出来的。因此，假象在战争中存在的更多、更奇特，也更容易迷惑人。毛泽东说：“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结论，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这就是说，应该把战争中的真象和假象区别开来，不能把假象当成真象，进而对假象进行科学分析，寻找出被假象所掩盖着的本质。其二是要把战争中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揭示战争现象之间内在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82页。

《战争论》第3卷，第85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读本）第941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读本）第941页。

必然联系。总之，只有坚持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才能坚持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战争。

(2) 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全面性是辩证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据此，毛泽东提出采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的科学方法。

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首先就是要对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全部基本要素进行考察。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在战争过程中都发生一定的作用。如果只看到其中的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它因素，便不可能达到对战争规律的正确把握。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从客观存在

的战争诸要素的全面联系中把握战争，全面地了解战争诸要素矛盾关系及其各方面的全部特点。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局部，不知全体。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中日战争的敌我双的各种相互联系着的基本因素进行了客观的全面的分析，指出些基本因素“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基于对抗日战争敌我双方各种基本因素的全面分析，毛泽东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不仅从政治上、军事上批判了“亡国论”、“唯武器论”和“速论”的错误，而且分析了他们的错误思想方法。毛泽东指出：“他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把它夸大起来。”

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还必须注意对战争中每一个要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对抗和较量。

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每一个要素总是存在于敌我双方之中，而构成矛盾关系的。敌我双方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战争中的每一个要素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进一步分析战争中的每一个要素在敌双方中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战争诸要素在总上的内在联系。所谓分析战争中每一个要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点，最根本的就是要研究战争中每一个要素中所包含的相反成分。

毛泽东在分析中日战争敌我双方每一要素的不同特点时正是这做的。他在分析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因素时，既指出敌人在总体是强的，又指出其强中之弱；中国一方在总体上是弱的，但弱中强。在分析作战指挥能力这一因素时，既指出日本在战略战役指上的笨拙，又指出他们在战术运用方面的长处。正是通过对战争中每一要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的分析，从而防止了任何片面性，达到了全面性的要求。

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还必须注意分析战争全部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战争不是全部基本要素的胡乱堆积，而是各种因素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不单纯是要罗列战争中的各种要素，而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满足于罗列一些战争的各种要素，把这些要素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东西，这是达不到全面性的要求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7页。

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的特点，即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这四个主要特点是互相联系的，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可见，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方法，就是指把握全部因素的内在联系，在全部因素的联系中把握每一个因素，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根本规律。

(3) 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同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的方法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在认识和研究战争规律时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的方法。

着眼战争特点的方法是建立在战争特殊规律这一基础之上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分析战争矛盾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认为战争总是具体的，每一具体的战争都有区别于其他战争的特殊情形和特殊规律。毛泽东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上发生的战争，其战争规律亦有不同的特点。从地域的条件来看，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战争，其规律也是不同的。再从战争性质来看，革命战争有着不同于反革命战争的规律。这就说明，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发生的不同性质的战争各有其特殊的战争规律，这是认识和区别不同战争的内在根据。既然不同的战争各有特殊的规律，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着眼其特点，就是具体分析不同条件下战争的矛盾特殊性，从而揭示战争的特殊规律。军事教条主义者却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往往把特殊当作一般，并死搬硬套一般，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机械论思维方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军事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看不到苏联国内战争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成功经验去做就行了。毛泽东对这种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思维方法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苏联内战的成功经验中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我们应该尊重和学习。但是，苏联内战有其特殊性，“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我们不能照搬苏联内战的成功经验，而应该着眼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才是正确的方法。

着眼其发展的方法是建立在战争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确实性这一基础之上的，它是唯物辩证法发展观在战争方法论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所谓着眼于战争的发展，就是要从战争的发展变化中来考察和指导战争。毛泽东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战争规律的这种发展性，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和运用战略战术。特别是要适应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地进行战略转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我军曾有过多次以改变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战略转变，每一次战略转变，都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情况的发展变化而确立和实行的，从而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方法，实质上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其核心便是矛盾分析方法，它是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根本对立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又说：研究不同的战争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三）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

研究和把握战争规律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战争。指导战争就是根据对战争规律的认识，着重解决“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即解决的是如何运用战争规律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的问题。从指导战争的基本方法来说，毛泽东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客观实际。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战争中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战争的主观指导，是指从事战争活动的人，把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运用于战争实践，引导战争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最终夺取战争胜利的过程。战争的客观实际，就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战争实际情况，其中包括敌我双方的情况。毛泽东认为战争指导者要想驾驭整个战争的变化和发展。“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主观指导符合于战争的客观实际，做到主客观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好好地符合起来。”战争实践证明，两军作战，凡胜者，必是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客观实际；凡败者必是主观指导违背战争客观实际。以土地革命战争为例，当时由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深入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战争客观实际的一系列作战原则，使主观指导建立在战争客观实际基础之上，从而引导中国工农红军夺取了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日益壮大。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等，却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因此，毛泽东在分析战争指导者为什么在主观指导上会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时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

使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客观实际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就是说，只有对战争敌我双方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找出战争的规律，并据此确定战略战术原则，作为作战行动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页。

同上书，第178页。

依据，这样才能达到主观指导与战争客观实际的一致。

当然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客观实际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是相当难的，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毛泽东指出，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客观实际，往往需要经过两个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第一个认识过程是指军事计划建立以前的过程。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第二个认识过程是指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即实行的过程。毛泽东认为在这一个过程中，已定的军事计划是否符合于战争客观情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和修正，使之适合于新的实际情况。正是在这两个认识过程的不断反复中，使指挥员的主观指导不断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2) 要关照全局，掌握关节。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又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照顾战争全局，掌握关节在战争指导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战争的全局呢？毛泽东又从空间和时间上作了规定。他说：“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具体体现在作战指导上，主要就是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因此，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要有战略头脑，善于通观全局，“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

既然战争的胜败，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战争全局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因此，这就要求战争的局部必须服从战争的全局。在这里，往往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战争的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处于一致时，战争的局部服从战争的全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另一种情况是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发生了矛盾，就是说，有时候，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但在战争的全局看来却是不可行的；有时候，在战争的局部看来是不可行的，但在全局看来却是必要的；有时需要牺牲局部的利益来利于战争的全局。在这些情况下，要使战争的局部完全服从全局往往是困难的。这就更加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懂得战争的全局对于决定整个战争胜负所起的作用，自觉地从战争的全局出发，放弃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局部来换取战争的全局的胜利，切忌鼠目寸光，计较于战争局部的得失。

毛泽东还指出，作为一个聪明的战争指导者，要真正关照好战争的全局，必须掌握战争中的一些重要关节。所谓重要关节，就是指那些能引起战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同上书，第17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0页。

争全局立即起变化的带有决定性的局部。毛泽东认为：“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例如，在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便是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中，善于抓带有决定性的战争局部，促进战争全局胜利发展的生动战例。

(3) 遵循“之”字路原则。所谓“之”字路原则是指战争指导中的非直线性。毛泽东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无不存在着曲折、起伏和螺旋式上升的变化过程。这种非直线的，非“一”字形的、波浪式的发展规律，即是“之”字路原则，这一原则是普遍存在的，在战争指导中也应遵循这一原则。这就是说，战争指导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战争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持久的发展过程并坚持持久胜敌的战略方针，而不能把战争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帆风顺，没有反复的。对此，毛泽东说得很明白，他认为，我们的革命战争，不是“一”字形的速决战，而是“之”字形的持久战，是持久胜敌。这个过程不但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斗争，推动战争发展的顺利与困难两方面，而且还充分体现出战争是一个敌消我长曲折发展的漫长道路。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往往有这样一些特征：一是战争发展过程是曲折的但又是向上的。无论是在阶级革命战争或民族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面对强大的敌人，始终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适应了战争的这一曲折发展过程。二是敌我力量的较量过程是反复的而又是敌消我长的。战争持久的、曲折的、不平坦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对顺利和成功的战役与战斗，把这些局部的战役和战斗的胜利集合与串连起来，就逐渐地造成了我之战略优势和主动，从而也就构成了敌我力量在战略持久过程中的反复较量和拼搏的缓慢地向前发展的“之”字路形态。三是我方力量的发展过程是艰难的但又是前进的。革命战争往往是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这种条件限制下，我方力量的发展壮大必然出现曲折的“之”字路的发展过程。这就充分说明，战争指导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平坦的发展过程，而应该准备走“之”字形的发展道路，坚持持久胜敌。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在作战方法上也应遵循“之”字路原则。这就是说，作战方法不能只有一手，而必须有两手、三手相配合，并依故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应变。例如战略指导上的争取和，准备打，以打促和；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军政密切配合；战略内线持久的防御战，战役战斗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以战役战斗之速决达到战略上之持久，等等。毛泽东认为在执行这些作战指导原则时，应该看到，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前进和退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是许多事物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战争活动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4) 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战争是物质力量的竞赛，同时又是敌对双方在一定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人的能动性的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双方竞赛的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又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也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由此可见，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对于战争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如何才能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呢？毛泽东认为最根本的应该做到两点：一是遵循战争自身的客观规律。只有遵循战争自身的客观规律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才能是正确的；相反，违背战争自身的客观规律，只能是盲目的蛮干。二是坚持战争的客观条件和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毛泽东说过：“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就明确地说明，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并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一种具体的关系，它表现为人的能动性同战争的客观条件的联系。战争的客观条件是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的物质基础。因此，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既要反对片面夸大人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忽视战争客观条件的作用，同时又要反对片面强调战争客观条件的作用，忽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思想倾向，坚持战争的物质条件和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在客观条件的限度内能动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这一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因为只有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充分发挥我军政治上的优势，以弥补武器装备劣势之不足；才能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逐步改变成我强敌弱，我优敌劣，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这就说明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对于改变敌我双方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仍然将处于劣势地位，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能动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第五章 毛泽东的新型人民军队思想

毛泽东的新型人民军队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原理和原则。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理论在中国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建军问题，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首先碰到的和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党内争论或斗争表现得最尖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初期以及后来长期的建军实践中，毛泽东遵循暴力革命的普遍原理，坚持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出发，不断排除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在总结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创立了正确的建军原理与原则，“系统地解决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根据这样的建军理论建立起来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少有的。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原理的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的建军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暴力革命理论的时候，在分析军队发展的历史和当时欧洲各国军队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军队的起源和本质，论述了军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指明了引起军队变革的基本因素，从一般规律中提出了军队建设的许多重要的原理和原则。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建军理论。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学说，根据俄国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经验 and 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亲自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军队。并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质、职能及建军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建军的理论。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871 年，巴黎公社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及时总结了这次武装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其基本经验就是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强调：“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仅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需要暴力和军队，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稳定也需要革命的暴力和坚强有力的军队。从而在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军队对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作用。其基本理论主要有：（1）军队起源于私有制和阶级。认为军队作为战争的暴力工具与战争在同一时期产生。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它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专政，也必须凭借暴力和创建自己的军队。故军队绝不是“超阶级”的抽象物，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362 页。

是属于和服从于一定国家或阶级的暴力工具。(2)物质和精神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两个重要因素。认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战争中敌对双方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掌握较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方就能战胜落后的一方。然而，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对国家和军队的民心士气和精神因素又有决定性的影响。“勇敢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结束。”此外，军队的组织、编制、军事思想、军队纪律、训练水平等，也对军队战斗力起着重要影响。

(3)认为资产阶级的常备军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工具，是固旧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无产阶级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军队，“用武装的人民来替它。”以建立真正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是“根本不能用来对进行征服的，”也不是“对内残酷镇压人民运动”的。

列宁明确提出：“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残余军事力量所必须的。”他说：现代资产阶级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用武装对付无产阶级，而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我们废除武装。”这等于完全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特别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向新生的苏维埃政进攻的新形势下，列宁在亲自领导创建苏联红军的过程中又提出：

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都必须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他在建军实践中所提出和创造主要理论有：(1)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认为军队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它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也不能置身于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之外。因此，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军队。而这支军队的性质应当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2)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军队的领导。认为只有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才能确保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使军队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以确保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这是无产阶级建军的一条重要原则。(3)无产阶级军队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列宁把纪律视为无产阶级军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这是战争的特性决定的。他说，如果军队稍一松懈或者发生纪律涣散现象，就必然会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但红军的纪律是新型军队的无产阶级化的纪律，其根本特点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用棍棒建立起来的。”(4)必须把军队建设引向正规化和现代化。列宁指出，苏维埃红军如不逐步实现正规化和现代化，是不能担负起和完成战胜强大敌人的。列宁的这些理论，对苏联红军的创立及加强其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是苏联红军正确的建军路线。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2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8页。

《列宁军事文集》第40页、第294页。

《列宁军事文集》第40页、第294页。

《列宁军事文集》第465页、第535页。

《列宁军事文集》第465页、第535页。

意义。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军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理，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建立一支人民的武装。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从而提出并解决了如何建立一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战争需要的，反映中国特色的一系列的建军理论问题。

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协助下，为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开办了第一所军官学校之后，又推动和帮助国民党进行了两次东征，创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些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下，运用列宁领导武装革命和建设红军的经验在中国的重大实践，但却是在当时共产党放弃对军队领导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导致了1927年春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彻底失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认识到掌握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从而作出了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走上独立组织军队和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的决定，开始直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理论进行建军实践。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的教训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全照搬苏联经验，走首先夺取与巩固中心城市的道路，并在城市工人阶级或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起义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1）中国的反动势力特别是其武装力量，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革命力量的组织和发动受到极大限制；（2）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力量弱，在大城市领导和开展革命活动将随时遇到残酷镇压，企图通过组织武装起义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则更加困难；（3）革命的统一战线尚不成熟，即使城市武装起义成功也往往处于孤军作战局面，在此情况下人民军队也难以建立起来；（1）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传播没有深入全国，一城一地的武装起义不能及时得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农民的同时响应与配合。总之，敌之力量强大，革命力量弱小，企图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武装革命并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在这种条件下是难以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在及时总结上述经验的基础上，于1927年秋，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各地方党组织举行了一系列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农民力主要成员的武装起义，并在多数起义成功的地方建立红军，使党的建军工作迈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第一步。但是，怎样才能使幼小的红军得以生存、发展和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怎样才能把红军建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仍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然各地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但在当时共产国际不完全了解中国国情和照搬苏联建军经验的错误指导下，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亦不可能真正解决。代表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之后，率领起义部队，相继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和赣南闽西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把建设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等任务统一了起来，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个总战略的指导下，然后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才正确地解决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原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问题。经过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

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后，使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即在全党全军逐步地建立和建全起来。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及国防现代化建设等伟大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建军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军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原理的中国化。其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充分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1）执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建军路线。即走的是一条先在农村发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武装起义之后建立军队，并随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伟大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与巴黎公社的工人起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工人与革命士兵相结合举行的武装起义并直接夺取政权，有着重大的区别和发展。（2）人民军队是在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农村根据地分散割裂，各地红军边建立、边作战、边成长壮大等特殊环境，使红军在党的领导、作风纪律、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等建设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特点，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必须与一个由游击性到正规性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相适应，完全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武装建设的根本特点与规律。必然使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产生明显区别于苏联红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原理与原则。（3）坚持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为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彻底改造和建设成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有关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理论、方针和原则。诸如：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党的绝对领导原则、政治工作制度、现代化建设目标、严格的组织纪律及优良作风的建立与发扬等。它从根本上规定了这支军队的无产阶级属性，使之永远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可靠工具。上述这些理论完全突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创造性。

二、坚持政治建设的无产阶级化

坚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使之永远成为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国情出发，又各有其不同的具体作法。列宁在创立苏联红军时曾明确提出了在红军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政治工作两条基本原则。这两条基本原则是从苏联的国情和红军成分主要是工人等特点出发的。因而与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特点，所提出的政治建军原则在具体内容上有着很大区别。列宁强调的加强党的领导，主要是指加强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加强党员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和模范带头作用，正确贯彻党的军事政策，坚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军队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他所强调的加强政治工作，主要是强调通过政治工作人员对军事指挥人员的监督作用，以保证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重大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而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则完全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基本上是农民革命战争，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的，反复强调必须从根本性质上实现军队的无产阶级化。这一思想虽然同样集中反映在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两个主要原则上，但在其基本内容上却有了许多重大发展。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当时的条件下，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军队是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列宁则在此理论上又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毛泽东则根据这些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建军之日起就强调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明确提出，人民军队来自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他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来的，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这个宗旨的含义极其深刻，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坚持了这个宗旨，我军就有强大的战斗力，就有一个内部和外部的很好团结，就有一个正确的争取和瓦解敌军及处理俘虏的政策，就有一套人民战争所必须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有一套反映无产阶级特点的坚强的政治工作，就有一个自觉地热爱和积极地从事本职工作的革命热情。总之，坚持这个宗旨，就能做到无私无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战斗和工作。对于这个宗旨的具体贯彻，毛泽东主要强调应落实在我军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即“三队”任务上。其基本理论内容是：（1）战斗队。战斗队是一切军队的根本属性，它是我军的根本职能。“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它的根本任务就是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为无产阶级和全中国人民夺取政权；而在人民夺取政权之后，人民军队的具体任务则转变为保卫政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这说明，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有帝国主义制度存在，我军的战斗队思想一点也不能动摇。为人民打天下与为人民保天下，是人民军队的最根本任务，也是我军宗旨的最根本点。（2）工作队。毛泽东曾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时指出：红军的任务不只是单纯地打仗的，它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价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它必须担负起做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以建立军政军民之间的正确关系，从而阐明了工作队所具有的双重作用。即，第一，通过宣传和组织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使群众不但在政治上彻底得到解放，而且在经济上直接得到利益。第二，通过群众工作，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直接支持革命战争，以保证我军战斗队任务的实现。两种作用，一个目的，都体现了贯彻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根据这一思想，在建国初期的特定条件下，毛泽东又根据我军战斗队任务逐步减少，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等革命任务的需要，及时提出，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变为工作队，把二百余万野战军变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以便使广大新区的任务能够顺利开展。（3）生产队。这是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筹款子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日寇和国民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6页。

党的经济封锁，在军队内部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实践中演变而来的。毛泽东当时对军队执行生产任务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提高了战斗力，而且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同时还带来了许多副产物，如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纪律性，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等。因此，他主张在不妨碍战斗、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一切部队和机关，都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其根本目的是在当地政府保证供给出现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在协同人民克服困难，减轻其负担的同时，又能使部队的的生活得以改善。这实际上是从经济方面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队”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军队通过军事、政治、经济三种形式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一条重要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全国政权的条件下，我军的职能则要求必须以战斗队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兼负工作队或生产队任务。因此，“三队”任务并提，并不等于没有主次。同时，在具体贯彻执行工作队和生产队任务时，又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赋予其新的形式和内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更应重视探讨新的内容和方法。

（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毛泽东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在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党内党外关于武装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后提出来的。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根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了党的军事斗争领导权的教训，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科学论断。同年秋天，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转移的途中，于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时，在部队中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并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领导原则。1929年12月，红4军经过党内在建军问题上发生的大争论结果，产生了正确的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包括“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教育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内容。它强调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进一步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使党对红4军的领导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长征途中，经过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使党对红军的领导达到了高度统一。以后，经过毛泽东对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战争和中国现代自孙中山领导革命以来各党派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的全面、系统总结，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有军则有权”的真理，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不应争个人兵权，但必须争党和人民的兵权。必须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并在后来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抗日战争初期，在国共合作，红军被改为八路军时，毛泽东又坚决拒绝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八路军任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解放战争时，毛泽东根据战争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又及时提出了党必须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重新强调了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加强军队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并辩证地阐明了党委内部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的关系。从而在理论上对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规定了明确的原则。建国后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多次强调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工作，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概括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军队只能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绝不能成为任何野心家个人反对党或凌驾于党之上的军事工具，也不能成为摆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为政治服务的纯军事的武装集团。从而把列宁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理论和原则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并正确地解决了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问题。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反映了人军队建设的必然规律。根据毛泽东领导我军建设的历史经验，要坚持好这一原则就必须：（1）增强党的观念，充分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它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我们党的阶级性质和军队的属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我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党为实现其政治纲领而斗争的工具，这就决定了它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2）在政治思想上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就是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中央的话，听党的话。其集中表现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行使对我军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代表了全党全军的意志和智慧，能够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同时，又因为我们的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而长期的战争与建军经验证明，集中统一，首先就是要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与指挥。（3）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对军队的正确领导，只有军队各级党组织中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才能更好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使我们在作战和工作中少犯错误。但在实践中必须使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很好地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4）努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它主要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实现的。政治领导，就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使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领导，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组织领导，就是加强军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5）同一切有碍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敌对势力和错误倾向做斗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际上是关于军队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

《人民日报》（1970年1月22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

的领导权问题。它历来是我们党同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焦点和原则问题之一。因此，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必须坚持对摆脱党的领导 and 放弃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三）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十分重视在军队中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学习和运用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为我党后来建军提供了宝贵经验。毛泽东曾充分给予肯定。但是，毛泽东为我军创立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并不是照抄苏联红军和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经验，而是根据中国革命的任务、战争目的、建军条件和作战环境等特点及具体条件，有了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重大发展。（1）关于政治工作的地位。毛泽东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达到团结内部、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他强调：“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他们应有的效力。”只搞业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因此，人民军队必须加强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2）关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从总体上说，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其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第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贯彻与执行，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第二，保证党在军队中各项军事任务的顺利完成，一切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毛泽东将它具体化为：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作战、生产、教育等计划的完成，以及在实施这些计划时，保障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任务，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他还根据我军的性质和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3）关于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把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概括成三大原则。即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强调：军民一致，就是要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尊重人民，尊重地方党和政府，保证军政军民团结；官兵一致，就是要尊重士兵，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民主，保证全军团结一致；瓦解敌军，就是要优待俘虏，不毙、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实行感化政策，通过政治攻势将敌军瓦解。三大原则，包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全部内容，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它是保证完成党的军事任务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我军在几十年建军作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4）关于政治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认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即实行彻底的政治、经济 and 军事上的民主化制度。政治民主，就是在军队中废除打骂制度，建立官兵平等的新型关系；经济民主，就是士兵有权协助连队首长管理给养和伙食；军事民主，就是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511页。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教和在作战时发动士兵群众讨论作战计划及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等。

毛泽东为我军所创立的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并因而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各项军事任务的顺利完成。在实践中为我军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政治工作经验。其基本经验是：（1）坚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是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并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但由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我军主要成员大多来自贫苦农民和旧军队的下层官兵，使人民军队的组织基础同先进的无产阶级性质产生了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为了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军队，使之成为一支永远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而奋斗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我军政治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2）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来教育部队，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来教育部队，使广大官兵充分认识党指引的正确方向，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抵制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保证党的纲领路线的贯彻执引。这种坚强的政治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3）重视培育和发扬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作风是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与我军的作风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正确的思想认识还是进步的革命精神，只有在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转化成优良作风，才能形成政治建设的良好环境，使党和军队所培育的优良传统发挥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使部队成为革命的大熔炉，铸造出我军特有的军魂。毛泽东说：“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育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因素。（4）实行依靠群众的政治工作路线，政治工作才有牢固的基础。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建立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之上的。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靠群众去贯彻执行。官兵一致，靠放手发动群众，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军民一致，靠开展热烈的群众性的拥政爱民运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瓦解敌军，靠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及执行正确的俘虏政策，以瓦解敌军的战斗意志。总之，一刻也不能离开群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5）坚持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是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和革命战争及革命斗争的大局下进行的，必然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军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总是从不同的历史环境出发，适时地提出并着力解决军队建设所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使我军广大官兵既经受了严格的考验，又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三、坚持军事建设的逐步现代化

毛泽东一贯认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在保证政治思想建设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必须重视军事建设不断向现代化发展。否则，人民军队就不能完成为人民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光荣使命。因而强调：必须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部队建设的需要，使我军逐步由游击性转变到正规性，由低级阶段转变到高级阶段，即军事现代化。军事建设现代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组织体制、编制装备、战术技术、作风纪律等。概括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提出的基本理论有：

（一）逐步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

现代化，主要是对军队建设所提出的质量要求，但它同时又要求必须有一定的数量发展相适应。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为着反对敌人的“围剿”，为着进行革命战争，苏维埃的第一任务就是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他提出首先应该保障红军数量的继续发展，争取在三个月内扩大五万红军的建军目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决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分散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以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到1944年我军总兵力已发展到47万人时，他还强调，欲“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用的。”“非有一倍至数倍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从而使人民军队的数量由抗战初期的四万人左右发展壮大到1945年4月的91万人。并形成了以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个部分。解放战争爆发时我军总兵力已达127万人。战争过程中随着军事形势的有利发展，毛泽东又提出了建军500万，争取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军方针。并提出了加强和发展诸军兵种的建军方向。根据我军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人民军队武装力量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与战争发展着的客观形势相适应。武装力量的数量是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从革命战争的总战略上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重视不断发展壮大武装力量，才能逐步实现现代化，保证最后夺取政权。然而，武装力量的发展。受着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和人力、经济力的保障条件。因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大力加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建设，是实现“有计划地扩兵，保证主力军经常满员，并大量训练军事干部”的基本条件。（2）实行正确的扩军路线。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批判流寇主义思想时，就提出了必须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后来，他又根据我军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人民军队每到一地，都应立即帮助人民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再产生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指出，由民兵和自卫军到地方部队再上升为主力部队，这是发展人民军队的根本途径和正确道路。（3）重视吸收和溶化俘虏兵。毛泽东根据人民军队的性质，一贯重视对敌军特别是国民党军俘虏兵的改造，并作为我军武装力量扩大的一个重要来源。把“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我军经过对大批俘虏兵的改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5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造和补充部队，保证了我军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仅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就“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二）不断促进和推动编制体制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充分反映了从游击性到正规性的逐步发展过程。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基本上是一种体现在执行分散的游击战或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条件下，与战略的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相适应，全军的编制体制存在着明显的游击性和不统一性。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编制体制的正规性和统一性则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随着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阶段的军事战略转变后，于1947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将全军的编制和番号统一起来，从而结束了我军编制体制长期处于不统一的局面。使正规化建设迈出了一大步，从组织措施上保证了战略决战和夺取整个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军编制体制发展的实践证明，编制体制的正确确定必须遵循以下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与作战形式相适应。作战方式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受编制体制的影响极大。我军的作战形式，既是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依据，又是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表现形式。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等作战形式，既对我军的编制体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同时又强调我军的编制体制必须与之相适应。它要求：游击战以分散、小型、灵活为主要特点；运动战，以便于运动和集中优势兵力作战为主要特点；阵地战，以加强攻坚力和突击力为主要特点。第二，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提了出来。他强调：兵贵精不贵多。兵力的多少须以足够应敌而又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为原则，并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为目的。

（三）改善和发展武器装备

毛泽东认为，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因而强调在敌日益采用新的技术装备面前，必须把我军的武器装备增强起来，否则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抗日战争初期他曾提出，必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中执行阵地攻击任务。强调全民族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于提高军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等之数量与使用人材，为着实行反攻而准备兵力。”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要求，则进一步提出必须发展炮兵、工兵和坦克等待种兵，开始建立空军，以提高军队夺取据点和城市的协同作战能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针对朝鲜战场敌军作战特点提出，必须增加我志愿军的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以征服敌人大量坦克，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一次小组会上提出，我军的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小米加步枪；第二阶段是步枪加飞机大炮；第三阶段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三个发展阶段建军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军几十年建军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具体规划。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指武器装备的发展而言的。

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发展武器装备的重要意义，而且规定了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要的道路。在战争年代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主要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4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67页。

通过以下方式解决：（1）重视在根据地或解放区发展军事工业。毛泽东早就提出：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事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等。并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基础上，对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给以合理补充。（2）适当接受外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需要外援的配合。在武器装备上，我们希望得到外援，但不能依赖它。指出，我们必须就现有的及可能继续增加的制造能力和修改外，还必须“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渐改善军队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3）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以补充自己。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创立的军事原则之一。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并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军在各个时期都懂得要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就必须善于从敌人手里去夺取。到解放战争的中后期，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以缴获敌人的全部武器来补充自己。这在当时，成为我军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和发展的重要来源。

（四）逐步实现正规化

毛泽东认为，没有军队的正规化，也就不可能有军队的现代化。为了适应革命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要求，他明确提出要逐渐克服军队长期以来存在的游击性，增强统一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必须使红军成为铁的正规的武装队伍。当时“正规”二字的含义主要是指由地方性的游击部队上升为主力部队。抗日战争时期，则要求游击队必须“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其含义不但包括了游击队须上升为正规兵团，而且也包括要求作战方法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正规性。这就把部队的正规性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正规性，即战略战术的发展统一了起来。解放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变，则提出“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并指出正规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整训部队和干部，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等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司令部工作，制定和颁发统一的政治工作条例等，其正规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已十分明确。概括毛泽东军队正规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有：（1）统一编制体制。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必须逐步地将全军的组织编制和番号统一起来，这是部队正规化的组织措施。（2）狠抓作风纪律建设。由于我军过去长期处在农村并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下，产生了某些无组织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战争形势的发展，要求我军必须坚决纠正这种长期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以适应“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3）加强军政教育训练。这是军队正规化的重要措施。军队作战不能光靠勇敢，因此必须重视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尤应重视干部组织指挥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强其组织指挥正规性的、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4）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30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16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32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2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46 页。

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毛泽东强调指导战争的人，必须重视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特别要重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及其所产生的战略战术。这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四、红专结合的军事教育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教育思想是其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主要是指毛泽东创办军事院校，为人民军队培养德才兼备的各级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和指挥、技术人才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包括部队军政教育的基本理论。它充分体现了军事教育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服务，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服务和为保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以干部教育为重点和红专结合等根本方针。

（一）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及特点

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及人民军队的建军历史，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形成和发展的大体过程是：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底，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不久，为了提高部队特别是干部的军政素质，即在江西宁冈县砦市亲手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的基层干部。1928年6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为了提高军队和党的干部的军政素质，建议应创办军校及党校。同年11月，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红4军“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五百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

之后，在各地区、各军团也先后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对干部分别进行短期培训。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了与红军发展的形势相适应，1931年又在瑞金创办了中央红军学校。先后共办了六期，仅第一至四期就为部队输送了6千余名连以上军政干部。1933年，又将该校扩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统一领导两所步兵学校和一所特科学学校。军事院校事业和军事教育思想的快速发展，促使红4军干部军政素质的普遍提高。为当时红军建设的大发展和赢得各次反“围剿”作战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条件。（2）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后不久，根据红军即将面临的抗日作战任务的需要，明确地提出：必须努力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36年6月，他亲自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亲任校政治委员和教育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将该校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在毛泽东亲手创建和直接领导下不断成长，不断发展和壮大。从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育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原则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组织编写教材，给教职学员演讲、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具体活动，他都亲自领导进行并抓得很紧。在教学中，毛泽东善于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为了端正办学方向，他在总结红军建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为该校确立和制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从而使无产阶级的军事教育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办校原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5页。

则，为了与我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紧密配合，从 1938 年冬至 1945 年的七年间，抗大又先后在敌后创办了十二所分校和五所陆军学校，一所附属中学，共为党和军队培养了 10 余万名干部。这对加强人民军队建设，保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3）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军事教育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提高党和军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统一抗日战争思想等政治、军事理论方面；那么，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的着眼点则主要侧重于军事理论的战略战术思想、组织指挥水平方面，特别是着眼于炮兵、工兵等特种兵建设和提高各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并认为这是军事建设的中心任务。1945 年 9、10 月，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先后将延安炮兵学校，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迁往东北，分别建立了东北炮兵学校和东北军事政治大学。与此同时，其他各战略区也以原抗大分校为基础，先后建立了军政大学或军政干校，并相继建立了通信、工兵、航空、医务、供给等兵种专业学校。这些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指挥干部和专业干部，在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4）建国前后，毛泽东根据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部队的需要，为了实现诸军兵种的密切协同作战，和为了组织复杂的高度现代化的战役战斗，提出了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等理论。先后又批准成立了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后勤学院和各军兵种、各专业技术院校等 100 余所。从而使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在教学实践中日臻完善。

概括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与人民军队同时诞生，同时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人民军队建设的不断发展。第二，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了教育与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主要方法。第三，必须调配最优秀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指挥员担任办军事教育的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我军高级将领中的不少人如刘伯承、叶剑英、罗荣桓、林彪、罗瑞卿、肖劲光等，都曾担任过各个时期主要军事院校的领导工作。

（二）军事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1939 年 5 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内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它既是通过建军作战实践对我军过去军事教育思想的科学总结，又是后来发展我军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1）坚持“两严”的教育方针。毛泽东认为，军事教育最基本的方针是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指导思想。即针对战争的实际需要，战时仗怎么打，训时兵就怎么练，把“训”和“打”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军事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个“严”字。只有从严训练，从严要求，才能真正做到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落到实处，才能为部队培养出德才兼备、善于带兵打仗的真正的合格人才。（2）坚持多级负责的教育体制。毛泽东在军事教育体制上的基本设想，充分体现了对各级干部实行普遍教育，分级负责的思想。即中央军委及总部创办高级院校，负责对全军中高级干部的教育；各战略区创办中初级院校，负责对所属中、初级干部的教育；各团以上部队建立教导队，负责对所属部队的基层干部和士兵骨干的教育；各特种兵领导机关负责创办军兵种及技术院校，负责对所属专业技术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从而形成了一个宝塔

形的军事教育体制。并把短期集训、轮训和较长期的培训结合起来，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教育制度。同时，还根据各部队执行不同任务的情况，又将部队划分为全训、半训和少训等多种类型，使各部队虽处在不同情况下仍能保证完成提高基本军政素质的军政教育内容。（3）坚持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毛泽东军事教育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就是群众教育亦即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曾多次指出，部队的“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强调院校教育亦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改变旧学校那种“注入式”、“填鸭式”的方法，采用自学、讨论、漫谈和辩论等多种生动活泼的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讨论和争论中探索真理，批判谬误，统一思想。这样，就能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把军事教育搞得更好。（4）坚持贯彻军政文并重的教学内容。毛泽东根据我军的性质、任务和特点，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原则。1939年3月，他在审查抗大一分校的教育计划时就指出：“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也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级地位。”他还针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适当增加文化教育的内容。1936年，他在审查红军大学的教学计划时指出：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有限的。”建国后，毛泽东又根据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要“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建军目标。当然，军政文并重的教育原则，在内容的安排上其地位并不总是等同和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和任务要求，来确定不同的重点，其时间比例和内容分配必须因具体情况和条件而异。但通常仍应体现以军事或专业技术内容为主的原则。（5）坚持以勤俭办教学的保障原则。艰苦奋斗，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创办军事院校、搞好教学保障的基本方针和工作作风。这是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在军事教育思想上的反映。在创办抗大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就号召抗大的教职学员自己挖窑洞，解决住房问题；自己开荒生产，解决丰衣足食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缺少笔墨纸张等教学用具问题。没有教材，他带头与罗瑞卿、郭化若等主要根据我军的作战经验，自己动手编写。这种艰苦办校的作风在长朗的军校发展史中形成一种优良的校风。

（三）正确处理军事教育中的若干关系

军事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军事、政治教育使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具有基本的军事政治素养，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培养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合格人才。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军事教育中的各种关系，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他说，主要是应处理好以下关系：（1）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但理论又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创办军事院校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要求学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5页。

1950年8月1日《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相结合，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特点，认清其基本规律，并正确运用这条规律去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因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相联系，必须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形势相联系，必须和党的政治军事路线相联系，直至和部队的作战实际、军校的教学实际相联系，并以此来规范学生的实际行动。他还多次在抗大对教职学员的讲话中，号召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低下，但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应注重理论学习；号召有文化的但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要勇于军事实践，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使这两种人通过“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途径，把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正确理解这一辩证思想的实质是，即在教学中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2）红与专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是军队教育中经常碰到而又必须正确解决的一对主要矛盾。红，主要是指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政治觉悟、思想品德等精神因素；专，主要是指人的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业务和技术水平及掌握与运用军事科学技术的本领。通俗他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在培养人这个问题上的德才关系。毛泽东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没有红，专就没有统帅，就将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专，红就空洞无物，就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头政治。但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因此，毛泽东一贯强调军事教育必须把培养又红又专的军事人才作为唯一标准。要求全军院校和部队在军事教育中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统筹安排红与专的教育内容，正确处理好政治教育与军事、业务和技术教育的关系。既要反对不闻政治、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要反对不重视技术和业务的空头政治家。（3）院校与部队的关系。军事院校教育的基础在部队。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部队的建设和作战需要服务。所谓院校与部队的关系，即指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作战实践必须保持密切的正确关系。院校教学不但必须面向部队，为部队建设的需要培养合格人才，同时还需要从部队不断吸取新鲜经验和营养，而部队建设又必须通过院校提供的理论去指导训练和作战，以院校教学为标准并通过院校培养出来的干部去带动和促进部队建设。军事教育就是要正确照顾到这两方面的关系，使其在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不断发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对抗大教育的指示中提出：在八个月的学习期内，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会实习的机会，时间约一个月。其基本着眼点，就是强调教育必须和部队的作战实践相结合。要求院校领导和教职人员重视深入部队，深入实际，总结部队建军作战的实践经验，以科学确定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法。（4）教育与科研的关系。毛泽东在抗大讲话时曾经指出，抗大既要学，又要教，还要研究。并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工作。可见，教育与科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都是推动和促进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校发展的重要环节。科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军建军作战等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发展我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主要手段；军事教育则是通过媒介和传播的形式，对军事科研成果加以普及、推广，使来自实践并高于实践的理论在指导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这充分说明，没有科研，教育的质量难以得到提高，教育事业就不能发展；没有教育，科研成果就得不到传播和接受实践的检验，科研亦不能深化。因此，必须在教育中加强科研工作，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通过教学推动科研事业的发展。（5）我军与外军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军事教育中为了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提高教育质量，对于外军一切好的经验，我们必须善于借鉴和学习，

绝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五十年代，我军转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苏军顾问硬把苏联红军建军作战的经验教条式的搬到中国来，要我军不走样的进行学习。毛泽东当时即明确指出：现在有人要我们学习苏德战争中的“十个打击”（即十个重大战役），而我军汉在解放战争中有就几十个“打击”。应该主要学习我们自己的，参考人家的。他还强调，在学习外军经验时有三种态度：一是学习好的；二是不好不坏的，取其好的部分；三是坏的要研究，引以为戒。上述这些宝贵经验，至今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民主化的军队管理思想

毛泽东认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封建压迫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化的管理制度。即在军队内部实行官兵一致。承认官兵人格平等，不允许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在军队外部，实行军民一致，承认军队来自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它执行严格的而又是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的管理方法。

（一）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军队内部之间、上下级之间团结一致，政治上一律平等；生活上互相关心，情同手足，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使每一个官兵认识到大家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而又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团结战斗。它是毛泽东运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为人民军队正确处理官兵之间的关系，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原则。这种新型的官兵关系，也是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具体体现。官主要强调：（1）官兵一致是区别于一切；日式军队的根本标志。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有着共同的革命利益和伟大理想。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从而也就有了实行官兵一致的政治基础。由于它内部是民主的，官兵是一致的，官兵之间只有职务高低不同，没有阶级对立之分，所以能够一扫军阀制度。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旧式军队，因为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对外要压迫人民，对内要压迫士兵，不运用这种制度和欺骗方法，就不能达成维护其军队内部的反动统治，和实现维持其整个反动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它不但要保持军阀制度，而且还要发展和强化这种制度。通过新旧两种军队官兵关系的鲜明对比，就充分反映出两种不同军队内部的根本制度和各自的阶级属性。人民军队内部这种新型的官兵关系，是我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强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官在革命战争和建军实践中诞生，并经受了一切艰难环境和战争条件的检验。这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不可能有的政治优势。

（2）官兵一致必须实行正确的民主制度。人民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主要是指，第一，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其核心是废止肉刑；第二，实行官兵生活同甘共苦。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领导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部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等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充分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任务需要和相容的。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化的正确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一方面必须扩大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建立良好的民主生活与民主关系，以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巩固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民主化又是有一定限

度的。即必须防止极端民主化，使之不至于走到破坏纪律和自由放任主义。因此，正确的民主制度，必须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3）尊干爱兵是官兵一致原则的生动体现。人民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在战斗、工作和生活管理中又互相处于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对立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虽说是非对抗性的，但必须正确加以处理，才能真正达到官兵团结，亲密无间的目的。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方法就是开展尊干爱兵活动，它是我军几十年建军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优良传统。朱德曾在党的“七大”的军事报告中指出：“我们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于爱兵运动的开展。”尊干爱兵，既包括士兵尊重干部、干部爱护士兵，也还包括下级尊重上级，上级关心和爱护下级。只有如此，才能增强部队团结，激发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促进战斗和工作任务的胜利完成。尊干爱兵，官是主要方面。只要干部真诚爱兵，对待战士大公无私，一视同仁，与战士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只要干部身教重于言教，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就能得到广大士兵的衷心拥护、爱戴和尊重。同时又必须提倡和号召战士尊重和爱护干部，把干部当成兄长和老师，相互间无话不说，无情不通，自觉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善于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真正建立互相关心、互相体贴的手足之情。只有这种新型的官兵关系，才是我军取得作战和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4）官兵一致原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人民军队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是军民合作。他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种正确的态度出发，于是就有各种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政策、方针和方法，如果偏离了这种态度，其所定之政策、方针和方法也必然是错误的。因此，官兵一致的原则，决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充分反映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官长爱护士兵、上级关心下级的一个严肃的政治态度问题。

（二）实行自觉的革命的纪律

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支革命化的人民军队，必然有革命化的纪律；如果没有严格的、钢铁般的纪律，是不可能打胜仗的。这是战争的特性决定的。列宁曾经指出：“战争就是战争，它要求铁的纪律。”并说，如果军队没有严格的纪律，就必然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毛泽东历来重视加强我军革命纪律的建设。在井冈山时期就为我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又又在实践发展中加以修改，重新颁布。在解放战争中期，为了克服我军在长期游击战争环境中所形成的自由散漫和纪律涣散状态，他又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并在战略转变的关键时期，狠抓了高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纪律建设，强调坚决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因此，严格的革命纪律，是我军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强大敌人，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概括毛泽东提出的加强我军革命纪律建设的基本理论有：（1）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

《朱德选集》第16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列宁军事文集》第619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5页。

没有纪律，军队就无法完成军事任务。正如毛泽东所说：“严格地执行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同时，革命纪律也是保证我军在政治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多次强调，军队要有统一的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因此，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状态。鉴于党的历史上分裂主义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重申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把这作为党的最高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明确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和军队的统一。（2）钢铁般的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军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类似一盘散沙，就根本不能打仗。这说明，纪律就是军队的一种战斗力，是制胜敌人的重要因素。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面对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能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严格的钢铁一般的革命纪律。有了这种严格的纪律，就会有良好的作风和坚强的战斗力。就能做到令行禁止，成为党指到哪里，便打到哪里，拖不垮，打不烂的铁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纪律，便没有军队。破坏纪律，便是破坏军队。（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性质的重要体现。纪律反映着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军队的不同性质，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它所具有的革命纪律，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与一切反动军队的纪律有着本质区别。毛泽东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军无产阶级性质和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它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正确执行俘虏政策等都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经常强调，要作到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就不能不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据此精神，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必须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指出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4）人民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政治自觉基础之上的。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由于人民军队的纪律同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每个干部战士都能够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种根本利益的革命纪律。这和反动军队由于官兵之间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和战争的非正义性，广大士兵不愿为反动统治阶级卖命而统治者靠实行愚兵政策，靠棍棒来维持的纪律有着本质区别。正如朱德 1943 年在《革命军队的纪律》一文中所说的：革命军队组织力量之巩固，是建立在自觉的革命纪律之上的，而这一纪律的基础在于：一是全体军人对于革命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因而能抛弃一切一己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二是在军内，以对革命事业之热爱，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在军外，军民一心，绝对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无违反政策和人民利益之事发生。三是指挥员指挥正确，关心部属，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因而获得部属之爱戴，虽挥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因而这种自觉纪律就能够巩固，军内外的团结就能够加强。（5）革命纪律要靠经常性的教育和养成。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

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如果这种教育几个月不搞，军队就会松散。不仅是新兵要进行这种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不教育思想也要起变化。朱德在讲到这个问题时也说：“革命军队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主要在于教育，奖厉与惩戒都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军的干部战士，来自城市和农村，成员的资历、知识、生活习惯和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各不相同。要求每个人在作战、训练和日常生活中都能自觉地、模范地遵守党和军队的各项纪律，成为遵守与执行纪律的模范之师，关键在于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的教育，提高干部战士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充分认识我军纪律和我军性质的一致性。做到战时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平时能自觉地维护纪律。作为军队这个特殊组织的纪律，还必须重视在加强教育，提高自觉性的基础上，靠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注意养成。只有一点一滴养成了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克服和纠正妨碍执行纪律的恶习，才能做到在任何情况下自觉地遵守纪律。可见，教育和养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建军实践中都是不可忽视的。

（三）以教育为主管理部队

治军要严，乃古今中外一切军队之特性。这是因为，治军不严，部队松垮稀拉，就没有战斗力，就不可能打胜仗。但一切剥削阶级的“治军要严”，却是建立在靠棍棒纪律压服的基础之上的。我军是人民军队，带兵原则，一方面也强调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但另一个也是主要的方面，则是强调必须实行强有力的思想工作和说服教育。这是因为我军的性质决定必须废除封建式的管理制度，实现说服教育的原则。因此，毛泽东从建军之日起，即为我军制定了以坚持官兵一致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教育为主管理部队的方针和原则。这就是：（1）教育为主，耐心说服。我军的管理教育工作，既是行政工作，又是政治思想工作，其核心就是正确处理好官兵之间的关系，保证部队团结一致，纪律良好，作风过硬。因而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好管理人和教育人的问题。坚持以教育为主管理部队，是我军管理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民军队带兵方法的重要特色。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就是要通过经常性的阶级教育，形势任务教育，干部以身作则的感化教育和思想工作中的耐心说服教育等方式，来达到融洽官兵关系，消除各种矛盾，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使干部以慈母之心，兄长之情，对待和关心每个战士；战士把干部看成是自己的兄长，尊敬和爱护干部，自觉服从干部的领导。然而，经常性的、大量的则是耐心说服教育工作。这种思想教育的形式又是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之上的。它主要是通过党、团、行政等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谈心活动，或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进行耐心的说服和规劝，而不是采取强制和粗暴的手段进行压服。更不能采取打骂体罚的办法，毛泽东曾告诫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否则，是不能收到预期效果的，甚至会激化矛盾，使问题走向反面。（2）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实际上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军队中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工作。要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调节好各种关系，就必须采用正确的态度和运用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于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7页。

《朱德选集》第8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破坏分子，就应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而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只有坚持这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在管理教育工作中坚持严格管理，但却又要严得合理，严得可行；才能做到在自己有了缺点和错误时，不论是干部战士都能敢于诚恳的进行检讨和批评，实现发扬成绩，纠正错误，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为管理教育打下共同的思想基础。（3）严格要求，正确实施奖惩制度。毛泽东说，管理教育工作必须采取辩证方法，而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强调坚持教育为主，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但又绝不能忽视和放松管理教育工作中的另一个方面，即严格管理和严格要求。如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管理教育工作没有权威，也不能收到良好效果。就是说，“没有严密的纪律，兵就带不好。”从带兵的角度上说，要做到严格管理和严格要求，除了各类人员职责分明，各尽其责和连队生活规律化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赏罚要分明。毛泽东强调，应赏必赏，应罚必罚，各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对部属，对同志要一视同仁，赏罚公正，绝不能有亲疏厚薄之分。只有如此，军队的纪律才能巩固，团结才能加强，战斗力才能提高。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8页。

《朱德选集》第107页。

第六章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周恩来曾说：“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朱德在论述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指出：“总的经验何在呢？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的领导，依据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方针，……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广泛发动与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争取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等一切进步力量，开展以军事斗争为主，并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科技等斗争形式紧密配合的全民战争。

一、人民战争的基本概念

历史上的人民战争，一方面由于战争的正义性质代表着不同进步阶级的利益，因而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战争的深度和广度亦不相同；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因而，人民战争的基本概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一）历史上有不同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就是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抵御外来侵略，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正义战争。从广义上说，凡属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并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战争，都是人民战争。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并在其正确纲领指导下的人民战争，才是彻底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这一概念，虽然产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但人民战争的实践却早已伴随着历史上阶级的或民族的正义战争而产生和发展。毛泽东曾把中国殷商时期的周武王伐纣称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古罗马的斯巴达克的奴隶起义，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普鲁士和西班牙等国人民反抗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都称为人民战争。

在战争史上，某些国家或民族的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本阶级或本民族的狭隘利益，推行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也标榜自己所进行的掠夺性战争为“全民战争”或“民众战争”。例如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所进行的非正义性质的日俄战争等，其实质都不是人民战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提出了“民众战争”的概念，并对其特点、地位作用及运用原则等作了系统论述，不乏其为精辟见解。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对待人民群众的一定程度的正确态度。但由于其根本上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其理论缺乏彻底的人民性和正义性，抹杀了战争目的中的阶级性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亦不具有真正的人民战争的实质。

历史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出现以前的人民战争，往往不能使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8 页。

《朱德选集》第 15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6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95 页。

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或虽能取得胜利，但胜利果实最终不能落到人民手里，以至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战争，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人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使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承了下来。在近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君主制。但因为没有一个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比较广泛地发动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革命的政党，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致使这一虽属人民战争性质的胜利果实，却被代表封建势力的袁世凯所篡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才是彻底的人民战争。

（二）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历史上人民战争的宝贵经验，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特点，在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人民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指针，并经受了革命战争的成功检验，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和科学。

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他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顺应了发展着的革命时代，尊重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历史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中国化。从根本原理上说，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正确运用。这就是：（1）人民战争必然是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人类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正义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至高无上的荣誉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即根据革命战争的正义性质，强调战争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能够在战争中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也能够在基本利益取得一致的基础上，把不同的阶级、民族和集团联合起来，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和战胜共同的敌人。因此，当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2）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进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毛泽东认为，在战争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人民，使几万万人民齐心协力，贡献一切给战争，才能赢得革命战争。因此，必须坚定地把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贯彻始终。（3）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同上书，第2卷，第384页。

同上，第50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第469页。

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要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除了客观存在的物质条件之外，还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战争中自觉的能动性。同时，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也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总之，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以政治与军事相结合为本质特点的，彻底的人民战争思想。

（三）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相对于一般革命战争和正义战争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本质特点。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条件下，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侧重于探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1）彻底解放人民的战争路线。战争政治上的进步性质，是人民战争的基本属性。正义战争和革命战争都是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解放战争，也都是符合人民群众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人民战争。但不同战争的进步性质却决定着不同的人民战争的具体含义和特征。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所创立的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人民大众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富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为目的，彻底解放人民的民主革命。其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明确的奋斗纲领所反映的彻底解放人民的战争路线，在人民战争史上是少有的。（2）空前规模的深入发动人民。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这是人民战争的又一基本特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人民战争，在发动人民群众的广度和深度上均为历史上所罕见。毛泽东认为，“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因而主张必须在解放区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在深入动员的基础上，除将一切青壮年男女在自愿和民主的原则下组织在游击队和民兵队伍中以外，还应把一切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与工作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并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革命战争的积极支持。这种对人民群众发动的广度和深度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不可能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也都不会有。（3）多种斗争形式的紧密配合，以军事斗争为主，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广泛组织人民参加各种团体积极从事支援军队作战之外，还必须号召一切革命人民热烈地参加和从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和卫生等多种形式的斗争。这一思想，不但在历史上的一般人民战争不可能产生，即使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领导的保卫新生政权、粉碎外国武装势力进攻的国内战争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领导的反法西斯德国入侵的卫国战争，都没有达到这样明确和全面的高度。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条件下所提出的人民战争的范围和内容。（4）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历史上一些正义性和革命性的人民战争。不少都是由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第46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2页。

于领导集团或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或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而导致内溃，而不能坚强地领导人民将战争进行到底。恩格斯在总结皮蒙特军队失败的教训时指出，皮蒙特王室所领导的抵抗奥地利帝国的战争虽然具备了人民战争的条件，但因他们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因而害怕把人民发动和武装起来，宁可跟敌人讲和，而不愿同人民联合以至放弃领导。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则是相似性质的又一例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人民战争，不但在战争的根本利益上与广大人民群众是一致的，而且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有坚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成为人民战争的领导核心和人民战争必胜的根本保证。正如毛泽东在讲到广大持久的抗日战争时说的；这在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二、人民战争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科学理论，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随着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同时，随着中国革命斗争主要矛盾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制约，因而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又各有其不同的含义和特点。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反对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为目标，执行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以贫雇农为主体，执行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工商业者，坚决打击地主的革命政策。我们党进行的人民战争思想则是在不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小块红色区域长期处于白色政权四面包围的条件下，在战争形式上长期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斗争中，完全依靠根据地党政军民实行一齐军事化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打破其“围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的理论主要有：（1）必须首先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一科学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人民战争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从理论上阐明了革命战争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战争的胜负与人民群众直接相关的基本原理。进而强调必须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认为，只要真正把千百万群众团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3）红军的作战必须取得人民的积极援助与配合。毛泽东根据红军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成功经验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作战是个最重要的条件。“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他们不但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均能够积极参加，而且也是最可靠的。没有这个条件，红军就不可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第20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第207页。

能实行“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4) 革命战争必须取得国际的援助。毛泽东说：“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三省之后，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实行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他说，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革命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这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些理论的提出，虽说在当时还只是初步的，但却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二) 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执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除汉奸、卖国贼外，不分阶级，不分民族，都可以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而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却从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和维护其统治地位，主张依靠外援，凭借军事力量，实行只靠政府和军队的单纯防御，即片面抗战的消极路线。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坚持深入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援抗日民族战争。直接领导敌后人民开辟战场，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在国际上动员一切反对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积极支持和援助我国的反侵略战争。并在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基础上，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基本上坚持了抗日战争。这就是实行彻底的人民战争路线。毛泽东依据战争实践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不断从理论上对人民战争思想进行新的概括，并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加以发展。从而使人民战争思想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有：(1) 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毛泽东曾多次明确地提出，中国要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并根据抗日民族战争的特点，还把人民的范畴扩大到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中国公民。同时，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制定了与此总政策相适应的政治、军事、经济、劳动、税务、锄奸和文化教育等项具体的有利于团结人民的政策。以建立最广泛的包括敌国人民在内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来积极参加或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全面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不可能有彻底的人民战争路线。(2)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中国要制胜日本，实现持久胜敌的根本目的，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军队和人民的进步。即必须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革新军制，使军队实现技术装备现代化；克服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深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把日本侵略者打败于数万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衡阳失守后，毛泽东在批判国民党所采取的消极防御战略时指出：“这是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强调“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3) 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毛泽东针对国内舆论出现的“亡国论”思潮，看不见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强调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2日社论)。

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看到武器，而且还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并说，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其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但这些只是战争胜负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才是决定的因素。（4）乡村能够战胜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战争力量和所构成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在今天半殖民地的、大国的、政治上进步的中国的条件下，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些胜敌的基本力量，利于我们在敌后组织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生长力量，改变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化，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即“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5）阐明了实行人民战争的一整套具体的形式和内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从军队和政府两个方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部内容。他说：人民军队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这个唯一的宗旨下，形成了一系列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与政治工作，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并与人民自卫军和民兵配合作战；同时，在民主政府领导下，把解放区的人民组织在各种职业和工作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这些基本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全面成熟。

（三）解放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的是，推翻美帝国主义扶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内的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紧密地团结起来，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统一战线政策。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样式，即逐步实现由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政权这一战略转变的出现，中国的时局已发展到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又有了以下新的发展。（1）必须在新老解放区实行正确的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政策。在城市，提出“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并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在农村，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使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但必须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以调动解放区人民的最大热忱，直接与间接地支援解放战争。（2）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直接参军参战。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4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

因此，他主张在战争中必须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积极支持战争。在战略进攻时，强调“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本军未到之处，则拿起武器，实行抗了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在战略决战中他提出，将华北、华东、西北和东北、中原等解放区的经济、财政、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与管理工作逐步地统一起来，以利组织人民支援前线。并强调“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通过政治教育，提高觉悟，使其完全站到人民方面来，为人民利益而战，（3）提出了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随着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和新的革命斗争形式与方法的出现，毛泽东根据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与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的人民日益高涨的反蒋政治运动，明确提出这是两个战场和两条战线。这两条战线的互相配合，必然加速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据此，他要求“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即在政治斗争方面，必须加强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在军事斗争方面，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政策。（4）促进国际有利形势的发展。充分利用苏联力量的增长和外交政策的胜利，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日益左倾，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日益陷于孤立，并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以促进国际战略形势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总之，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重大发展。

（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不但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正义战争的性质，而且还充分显示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特点。战争除了动员和组织中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援和精神上给予志愿军以极大鼓舞外，还要团结朝鲜人民与军队共同作战。同时还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从而使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的发展。（1）明确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人民战争指导路线。这个伟大号召，从战争性质上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正义战争的目的。成为动员和组织中国人民支援和支持反侵略战争的根本指导思想。“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的武器、装备、弹药、物资等都完全靠祖国人民的供给和保障。并在全国人民进行的捐献武器的运动中获得了总数可购买三千七百余架飞机的捐款。使志愿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得到了很大加强。中国人民还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自愿地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上前线，三年多共补入志愿军的新战士近百万人，并组织了大批民工支援前线。（2）坚持团结朝鲜人民共同战斗的国际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作出入朝参战的决策时就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第1346页、第120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第1346页、第120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第1346页、第120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页。

提出，必须发扬革命的道义，实行国际主义的援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毛泽东又指示全军必须尊重朝鲜的人民、军队、政府和朝鲜劳动党，尊重朝鲜人民的领袖，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从而赢得了朝鲜人民和政府对战争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3）组成了广泛的国际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获得了伟大胜利，“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致使美帝国主义日陷孤立。战争期间，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还给予朝鲜人民以一定的物资支援，间接地配合与支持我志愿军作战。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条件下所进行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最终战胜了拥有第一流装备现代化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领导是一个因素，“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又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五）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教育全国人民增强国防意识，重视国防事业，防御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与扩张，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明显的新发展。（1）全民皆兵思想的提出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提出过“普遍武装人民”的全民武装思想。毛泽东的全民皆兵思想，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基本观点的继承与发展。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式提出了“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的方针。强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配合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我国的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并反复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抓了三落实。这在当时我国受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下，对制止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犯起到了重要作用。60年代，毛泽东在总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这一理论，为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或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侵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2）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全民国防方针。从50年代开始，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我国经济实力有限等实际情况，在考虑和部署国防和经济建设的整个构想时，就逐渐形成并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实行平战结合与军民结合的全民国防方针。1956年，周恩来在传达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页、第5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页、第5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1页、第10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1页、第103页。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19日。

毛泽东的指示时说，国防工业“在生产上注意军民两用，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根据这一思想，后来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其它领域中又先后提出了“寓战于平，寓军于民”，以及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理论。（3）加强战略后方和战场建设。50年代末和60年代前期，在美苏两霸推行霸权主义，四处进行扩张和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战略形势下，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必须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目标地把战场建设和战略后方建设搞好。强调“全国都要搞大后方，每个大区要搞大后方，每个省也要搞自己的大后方。”根据这一思想，60年代中期即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大小三线的建设。这一理论，是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思想在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4）结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了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创造性地将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国际战略，指出，搞侵略扩张的只是少数国家的统治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制止侵略的决定力量。1960年5月。他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友好人士的几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70年代，毛泽东又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新特点，在经过多年观察、思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团结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和孤立霸权主义有着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国际战略斗争中的正确运用与发展。

三、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理论内容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反复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内容极其丰富的人民战争思想。其基本理论内容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路线，又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路线而实行人民战争的军事指导战线。它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中具有双重的指导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正确道路问题。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及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发动和领导了以城市工人为主的武装起义，成功地领导了俄国人民进行十月革命，实现了先占城市后取乡村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北伐战争和独立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这些教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以及中心城市反革命力量强大而革命力量弱小等特点，正确地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他指出：中国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方法不同。中国不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

路。”毛泽东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的人民革命战争。并按照中国革命各个不同战争时期敌我矛盾等基本特点和战争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人民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力地保证了长期地在农村积聚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包围和孤立占据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的敌人，在军事力量超过敌人时最后夺取城市和革命政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顺利地解决了中国武装革命道路这个根本问题。

（二）广泛动员与组织人民群众

动员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是开展人民战争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要打倒帝国主义又要打倒封建主义的根本任务出发，提出不但要把以工农为骨干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都动员和组织起来，而且还要把国际上包括敌国人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也要争取过来，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夺取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他强调：（1）必须重视动员人民。伟大的革命战争，没有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此，重视战争中的政治动员，首先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方能造成革命热潮，使几万万人民心齐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故经常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是一件绝大的事情。（2）善于组织人民。“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毛泽东组织人民群众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统一战线政策上。他认为，统一战线，就是人民大团结路线。没有这种革命的统一战线，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人民战争。他的这一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孤立和打击敌人。即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组织队伍问题，是分清敌我友以团结一切朋友，孤立与打击敌人的问题。这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基础。并根据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和特点，把统一战线分成阶级革命的、民族革命的和国际反侵略战争的不同层次和按照“人民”这一概念的不同范畴，灵活地制定了有利于对敌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

（3）坚决依靠人民。其含义有二。一是说坚决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树立“依靠民众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的胜利信心。二是说在革命战争中，军队和人民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单纯依靠军队作战。要扩大民众运动，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和参加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坚决依靠全体军民并发动其积极性贡献一切给战争，革命战争才会胜利。（4）正确地处理各阶级、阶层人民群众长远的与暂时的利益，把战争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支持长久的革命战争。

（三）建立一支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革命武装

毛泽东认为，人民战争的主体决不单纯是军队，而是包括以人民军队为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35页。

骨干在内的一个完整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因此，毛泽东根据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特点，在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实行彻底的人民战争路线指导下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中国的问题离开了武装就不能解决。因而主张：（1）必须通过在农村发动武装起义，首先建立和建设一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工农革命军。明确规定，这支军队来自人民，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它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建立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使之成为人民军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坚强堡垒的基本因素。同时，还要不断加强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现代化和编制体制、作风纪律的正规化建设。使之成为实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和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2）建立群众性的人民武装。在革命战争中，只有人民的主力军，而无人民的群众武装，就像一个独臂将军，人民战争仍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反映人民战争重要特点的武装力量体制。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配合作战。没有这种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3）正确划分人民军队的作战任务。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趋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面敌人方面。”这种正确的划分，在革命战争年代，不但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而且在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密切协同和有力配合下，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夺取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制度。它既有利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又有利于协调一致地执行各种作战任务，还有利于保证后方的稳定。（四）建立支持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中心城市反革命力量强大而革命力量弱小的特点，按照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战争，必须首先在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种根据地，是革命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来看，根据地在实行人民战争中有两个显著的作用。一是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努力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二是在作战中充分利用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性和熟悉有利的地形，实行积极防御，将进攻之敌诱入根据地，配合以各种作战形式将敌打败或歼灭。因此，毛泽东提出：（1）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对流寇主义的思想。他在总结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战争屡遭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忽视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他强调说，必须反对黄巢、李闯式的只想进大城市而忽视农村的流寇主义思想，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2）实行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即当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时，就应暂时停止前进，在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党和人民武装，待到新区巩固可作为依托时，再向四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周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根据地边建立边巩固。

（五）以多种斗争形式相配合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人民战争的基本斗争形式，还仅是根据一般革命战争规律，限于在军事领域内发动人民群众在起义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列宁在领导苏联国内战争中，提出了“动员全民参战，有的去直接作战，有的去参加作战的各种辅助工作。”把人民战争的形式分成了直接与间接作战两个方面，在斗争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则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他明确地提出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并从理论上加以全面概括。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它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1945年4月所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人民战争”一节，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人民战争斗争形式的完整思想。他除主张在解放区把一切青壮年男女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人民自卫军和民兵的群众武装组织之外，还提出：（1）把一切革命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的工作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为动员人民参加军队，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替军队运送粮食，优待革命军人家属，以及参加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与保护伤员，开展袭击与爆炸等活动，直接配合主力军作战。（2）组织解放区人民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要重视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物质生产和发动敌国或敌占区人民革命政治运动的兴起。从而把人民战争的斗争形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上广泛而又全面地配合了起来，成为人民战争在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上的最完整、最严密的组织形式。

（六）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即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所进行的指导革命战争的艺术和方法。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重视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遵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在指导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就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承认在武器装备和总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根本目的出发，充分地利用敌之一切弱点，发扬我之一切优点；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充分地依靠和坚信人民和广大官兵的力量、智慧和勇敢的革命精神，高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关照全局，主动协同，灵活机动地进行作战。其基本原则主要有：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坚持战略上内线防御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把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等。这种战略战术，充分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和行动规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斗争中，

《列宁军事文集》第56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

尽管敌人熟知我军这些作战方法并多方寻找对策，如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就曾派军事人员帮助蒋介石研究我军战法，并建议采取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但终究也挽救不了他们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生命力，已被历次革命战争和建国后保卫祖国边防的武装斗争及历次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所证明。依此规律，它必将在我国今后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中继续发挥伟大的指导作用，并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

四、人民战争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类社会已进入到高科技时代。新的技术兵器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着战争的规模和样式，使现代战争出现了具有在核武器威胁和电子、激光等高、精、尖技术广泛应用条件下的许多新特点。这和过去的国内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相比，无论在战争的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了许多显著的发展与变化。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和历史条件，如何在今后反侵略战争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便成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在指导国防建设和保卫国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深入探讨和研究解决现代人民战争的指导问题，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现代人民战争的基本含义

现代人民战争，意即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条件下如何组织、领导与实施人民战争。从广义上说，“现代战争”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就曾提出过“现代军队”、“现代军事体系”，“现代军事学术”和“现代作战方法”等与现代战争紧密相连的军事用语。他基本上把自拿破仑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发生的较大规模战争，都称之为“现代战争”。列宁也曾把日俄战争称为“现代战争”。20世纪初以后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被称为当时条件下的现代战争。据此，对现代人民战争的基本含义可作如下理解：（1）“现代条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引起先进武器装备的出现，才构成了当时条件下的“现代条件”。即是说“现代条件”的具体内容是随着科学技术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今天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和现代条件，是相对历史上的先进技术即“现代条件”而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再过三十年、五十年，由于更高科学技术的出现，必将把今天的高技术和现代条件看成过时的相对的非“现代条件”了。（2）判断“现代条件”的基本标准，是以一定历史时代或历史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在军事上的运用为主要依据的。恩格斯称拿破仑时代的战争为现代战争，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新式步枪、新式火炮和铁路、电报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进而促进军队作战方式方法的重大变革。列宁称日俄战争为现代战争，不但是因为作战双方使用了精锐炮兵，而且还由于舰船业的发展，使日本海军获得了优势，完全夺取了制海权。所以列宁明确提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要有高质量的人材，才能掌握舰船上的复杂技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坦克，战争结束时又出现了原子弹。历史就

是这样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成功地运用于军事，而把“现代战争”的具体标准和内容，逐步地推向一个一个的更高水平，并通过不同的战争样式反映出来。（3）把现代技术标准和条件与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或反侵略战争相结合，就构成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基本概念。着眼于我国我军新的历史条件，可将现代人民战争的基本含义概括为两类：一是指以敌以高、精、尖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其武器装备全面优于我军向我发动入侵战争时，我国人民在武器装备完全处于劣势条件下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二是指由于我国今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我军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后，敌我双方拥有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处于相对均势条件下，我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在这两种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全面的或局部的反侵略战争，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二）现代人民战争的基本特点

尽管由于现代高、精、尖科学技术的影响，使现代战争出现了武器杀伤威力大，活动范围广，紧张剧烈程度高，人力物力消耗大和战争爆发突然，战场形势发展变化快速等特点，但决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人民战争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指导作用。相反，战争的人民性更强，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地位更重要了。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经验，可以预见，未来发生在我国的全面的反侵略战争或局部的武装冲突中的人民战争，将出现以下基本特点：（1）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彻底的人民战争路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打起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如果敌人一旦入侵我国，它必然是失道寡助的。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利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并争取国际上包括敌国人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在强敌全面入侵情况下，战争仍将是持久的。（2）战争是一种反映综合国力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战线在内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全方位战争。无论是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都将强烈地反映出这一特点。因而要求整个国家机构必须在战争爆发时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或建立相应机制，在不同战线上动员、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紧密配合军事战线，有序而协调地开展各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有效地抗击敌之进攻或实施反击，在战略上摆脱被动，夺取战争主动权。（3）战争将在我国国土上的广大空间紧张、剧烈地进行。当全面战争一开始，就可能先后遭到敌人从陆地、空中、海上多方面、多样式的突然猛烈袭击。如此广阔的战场，单纯依靠军队作战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只有广泛开展以野战军为骨干，组织地方部队和广大游击队、民兵与人民群众，在海、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共同参加与配合下的协同作战，正确运用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三种作战形式，在广大的陆海空域内对敌作战，才能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消耗和歼灭敌人。即使是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一特点。只不过是其规模、范围较小而不致牵动全国全军的主要人力物力而已。（4）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军队武器装备的高度现代化，不仅不会降低人的作用，相反更需要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科学

文化知识的人来掌握和操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这决不是否定人的决定因素。在现代战争中，技术与人相较，仍是人的因素第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但被所有的革命战争和近期局部战争中的实践所证明；而且，连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家也正在改变其唯武器论观点，不得不承认人是战争中的头等重要因素。因此，在今后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不仅需要更加重视发挥我国军民政治上坚强、团结和高度觉悟的优势，而且还必须重视加强对人的训练和培养，以提高其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及军事素养与作战能力。（5）广大人民群众是战争物资的直接生产者，并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现代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和破坏巨大。海湾战争中，美军一天的消耗即达 10 亿美元。伊拉克在 42 天的战争中，即损失 42 个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就是人与物质财富的竞赛。因此，一旦战争爆发，必须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民族、各条战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战争潜力大，兵员充足等优势 and 反侵略战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参加生产，大力支援前线，才能保证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现代人民战争指导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根本指导思想。但要把理论变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行动指南，还必须具体解决一系列有关人民战争指导上的方针和政策等问题。根据现代人民战争的基本特点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的伟大成就等实际情况，现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在指导要求上需要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如下探讨。（1）建立和完善由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指挥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历次局部战争及我国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的经验均证明，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精干的、高效能的、拥有绝对权威的战争领导机构和一个富有及时、灵敏、有效、稳定的指挥体系，要夺取战争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党指挥枪”的优良传统，必须建立一个由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的，由党政军主要领导成员组成的最高领导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其与军事系统和地方系统间的战时指挥体系。这个最高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对整个战争的筹划、指导和决定战争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正确分析与估量国际战略形势，科学预测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及其发展趋势，适时制定出符合战争规律的正确决策，决定战争指导方针和政策，进行战争动员，规划战时经济，开展外交斗争等。并对各战略区，各军兵种和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及时正确的指导。它是夺取现代人民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2）发展现代科技，增强综合国力，改善武器装备。现代战争对国家经济的依赖性极大，敌对双方的激烈对抗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军事上，而且也强烈地反映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通信等综合国力上。可以说，离开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战争一天也难以进行。而发展综合国力的关键必须是集中力量首先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发展国防工业，加速改善军队武器装备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强调，我们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论者，在强调坚持人民战争，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同时，也绝不忽视对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世时在提出搞四个现代化的同时，就一直抓住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不放。因此，必须在有计划地逐步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从现代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发展符合我国人民战争特点的武器装备，不断改善我军的武器

装备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军队间的差距，是实行现代人民战争的物质基础。

(3) 普及国防教育，建立快速的战争动员体制。毛泽东曾经说过，为了准备应付帝国主义突然发动的战争，必须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普遍深入地对全国军民进行国防形势教育和国防战备教育，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自觉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地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战，是现代人民战争准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现代战争爆发突然，进程快速、特别是现代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更具有速战速决的特点。因此，必须在加强国防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以常备军为骨干与强大后备力量相结合的、具有快速反映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武装力量体制，是现代人民战争之必须。同时，还须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将有关战时需用的物质生产纳入军民两用轨道协调地发展，并相应地建立快速动员机制，以便在战争一旦爆发时，迅速将战争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4) 加强战略后方建设，提高全民防御能力。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是毛泽东根据地思想在建国后为防御外敌入侵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它是实行现代人民战争的重要依托，也是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提供人力物力资源，坚持长期战争的主要补给基地。因此，必须结合国家四化建设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国家的总后方和各战略区的小后方建设好，仍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还必须根据现代战争所具有的高强度、大纵深，远距离的立体性攻击和合成化空袭等特点，逐步完善人防城防工程体系，提高全民防御能力。这对于在未来战争初期防御敌人战略突袭，保存有生力量，以抵抗和制止敌人入侵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5) 发展军事科学，掌握现代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先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法，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一种强大的战斗力。特别是在我军武器装备尚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更须重视研究、发展和运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即使我军将来拥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仍必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地理条件发展相应的军事学术，才能战胜任何入侵之敌。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军事科学，在继承我军传统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七章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理论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理论，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理。它是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有关战争和战役、战斗的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的知识体系。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所产生的战略战术原则，它既反映了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指导规律，同时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在敌强我弱条件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最后终于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独有的特点和基本规律。它是毛泽东继承前人或今人关于战争经验的总结，并在自己实践的考证中吸收其有益的，拒绝那些用不着的，增加自己所特有的内容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伴随着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游击战到正规战整个发展过程，在“十六字诀”作战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检验，并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战术理论体系。

一、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根本特点

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在讲到积极防御问题时他又说：“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还说，“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的增加。”如此等等，说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形式上和方法上是基本相同而无原则区别的。然而，它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条件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却赋予了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以生动活泼的和与非人民战争根本性质完全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一）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在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时就曾明确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我们战胜蒋介石集团的主要方法。尽管蒋介石集团和美国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并曾多次组织高级军事人员进行研究，企图寻找对付办法，但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其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之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与一切反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根本区别。由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因此，这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因为，第一，军队和人民政治上的坚强团结与高度统一，是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毛泽东认为，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全体参战军民就能在统一指挥下，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地为着实现一个共同的作战目的去积极作战。这是任何反革命战争不可能有的政治优势。第二，军队和人民能自觉地在作战中主动配合，密切协同。朱德在总结毛泽东的新兵法时曾说：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199页、第20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199页、第20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就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这种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军队与人民在作战上的互相结合而规定而实现的，这种战法，它环绕着军队与广大人民互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是以军队的作战去援助各种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等各种斗争中去配合军队作战。这种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

（二）服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地争目的

毛泽东说，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它的根本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

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虽然，这个战争目的乃一切战争所共有。但是，它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正确地运用和贯彻。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具有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要求各级战争指导者必须做到：（1）牢牢把握和贯彻这一原则。他强调战争指导者，不能离开敌我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因为敌对双方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了互相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2）正确理解“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含义。消灭敌人，就是指解除敌人的武装，即“剥夺其战斗力”，而不是完全消灭其肉体，保存自己，绝不是保命主义，绝不是为了消极“保存自己”而不勇敢作战。战争中，有时个人或少数人的牺牲或暂时有计划的放弃某些土地，实是战争根本目的所必须。（3）正确处理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这就是，在战争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地消灭了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在作战手段上，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辅助手段的防御则是第二位的。战争中，有时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就不得不作出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与牺牲。

（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战争实践活动的主要特点。毛泽东曾在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中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该校的三大教育方针之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我军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全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是围绕人民军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官兵之间互相了解团结，并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这和朱德所说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主要强调：（1）灵活性是战争指导的中心任务。它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是变换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这是最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它除了组织和教育人民等工作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准确弄清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找出行动规律，才能真正实现指导上的灵活

《朱德选集》第16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3页。

性。(2)关键是把握住时机、地点和部队三个关节。战争中执行与贯彻正确的作战方针，有各种的地术和方法。任何一个指挥员，懂得这些战术原则是容易的，而要灵活地按照实际情况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把把握住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即依据敌我部队、地形等情况，及时地、恰当地变换战术。否则，就不能取得作战胜利。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都如此。(3)灵活不是妄动。毛泽东曾把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妙”字叫做灵活性。并说，灵活性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但灵活绝不是妄动。它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的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就能实现我对于敌之主动权，就能压到一切敌人并最后夺取战争的胜利。

二、军事战略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所概括出来的全面、系统的理性认识。它主要是指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前人有关战争指导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总结、补充和完善，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基本规律的战略思想体系。并在建国后保卫国防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深化。

(一)毛泽东对战略概念的规定的规定

战略就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它是战争指导者正确运用战争力量 and 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对战略概念作了科学地解释。他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很明显，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凡属带有要照顾战争各方面、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都是战略问题。他还认为：(1)战略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这表明，军事战略根据时间和空间等具体条件的决定，它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例如世界军事战略，国家军事战略，战役性战区战略等。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将处于一种互有制约的从属关系。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而言，它主要是中央和各战略区的关系。(2)战略的任务是要正确解决战争指导上一系列重要的计划与实施问题。毛泽东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然而不仅如此，“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指导中，对于诸如认识战争形势与特点，找出战争规律，制定战略方针和计划，以及实现战略方针与计划中有关战略目标和主要战略方向的选定，战略阶段的划分，战略转变，武装力量的部署与运用，战场选择，战略后方的组织与保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须战争指导者根据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正确地加以判断和解决。(3)战略理论是军事理论的骨干。毛泽东指出：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只有重视对战略理论的研究，才能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4页。

确认识和把握战争的基本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指导战争。因此，必须重视学习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所总结出来的军事理论，同时又必须重视从自己的战争实践中去加以考证，吐故纳新，增加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二）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内外强大敌人的长期作战中，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逐步形成、完善并趋于成熟的。

1927年秋，以毛泽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革命军首先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创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在斗争实践中根据初期作战经验总结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战原则。这一原则，它“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战略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实行了由游击战向游击性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在领导中央红军进行多次的反“围剿”作战中，正确地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正确地规定了有关战略防御中一系列的作战原则。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他又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采用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1936年12月，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经验的基础之上，撰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实行战略防御的方针和原则，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理论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基本形势与特点，于战争初期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提出了在正面战场实行“高度的运动战”和敌后战场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并在战争实践中顺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运动战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我军转入敌后战场之后，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战略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经过八年抗战，逐步地转变了战争形势和发展壮大了自己，终于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时期，毛泽东通过所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重要军事著作，使其军事战略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并趋于成熟。

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得到全面发展和完善的时期。整个战争经过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全过程。在战略防御中，毛泽东及时总结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打运动战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逐步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当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他又根据我军几十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的作战理论更加系统化。1948年秋，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他及时主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作出了战略决战的决策，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的决战胜利。在指挥各野战军实施战略追击，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0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又提出了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尔后回打溃逃之敌的战略方针，迅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

建国后，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在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在理论上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在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及时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在更新、更高阶段上的发展。

（三）基本军事战略思想

基本军事战略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和根本指导意义的，成系统而又互有联系的军事战略理论中的最基本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根据地战略。根据地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发生和形成的。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一总战略的指导之下，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可以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同时，也避免在革命力量还弱小时去和强大的、占领中心城市的敌人作决定性胜负的作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必须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去争取全部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先后在全国主要是南方诸省建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在敌后建立的十余块抗日根据地，并在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发展成解放区。都从实践方面说明了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从理论上亦先后提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一套办法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抗日战争必须争取在敌后创建十个战略支点，即十块大的敌后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他多次强调在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必须驱逐流寇主义思想，确立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实行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依靠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由此可见，根据地作为一种基本战略思想，它具有三方面的战略意义：第一，它是进行革命战争的立足点和战略支点，没有这种立足点和战略支点，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可能站稳脚跟，并得以逐步推进和发展；第二，它是支持长期革命战争，为前方提供人力物力补充的重要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第三，它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必不可少的战略步骤，是这条战略道路的起点和基石。

（2）游击战争战略。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既是一种战略作战形式，又是一种基本战略指导思想。从实践上看，在中国革命战争长达二十二年历程中就进行了十八年的游击战或游击性的运动战；从理论上，毛泽东曾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论述，要求全党全军把游击战争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的武装力量，要能够长期坚持和发展壮大起来，主要地就是要在中

《毛泽东选集》第卷，第98页。

同上书，第2卷，第418页。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以农民为主的人民游击战争。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由于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却处于进步的时代，而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侵略。由于敌人占地甚广而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许多空虚的地方。为使敌在其后方不得安稳坐占，争取相持局面之出现，并为我战略反攻准备力量，就必须及时地发展和坚持广大的敌后人民游击战争，否则，就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从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全体上讲，游击战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但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仍是正规战争。因此，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战争把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

（3）持久胜敌战略。中国的武装革命不能采用速决战，而只能采用持久战。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所决定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从实践上看，土地革命战争进行了十年，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解放战争在经过一年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了四年。从理论上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持久胜敌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解放战争初期即和周恩来、刘少奇一起提出了五年左右或更长一点的时间胜敌的设想。毛泽东持久胜敌的理论，完全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基本规律提出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对中国革命战争四个特点的分析，抗日战中他对敌我双方四个矛盾的分析，都一再强调这些特点和矛盾的存在，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可能发展和战胜其敌人，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战胜其敌人，从而也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革命战争的坚持与发展，从总体上讲，除了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需要时日和需要一个敌消我长的过程之外，还有直接支持和影响革命战争进程的诸多因素，如人民群众的动员与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线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发展与积蓄等。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和发展的持久过程。

（4）积极防御战略。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吸取古今中外积极防御思想的精华，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一种战略防御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弱小的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积极防御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打破敌之“围剿”，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求得胜利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在敌我之间犬牙交错和多种包围的战争形态中，我军经常处在敌数路围攻的情况下，积极防御的主要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各个击破敌之围攻，以不断壮大军事力量和促使根据地的扩大与发展，为战略反攻准备力量。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和敌处战略进攻的情况下，积极防御的主要任务，是避敌锋芒，机动作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在逐步掌握战略主动权和战略力量达到相对平衡之后，则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积极防御战略，虽在不同战争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它的核心思想即攻势防御的原则却是共存的。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理论，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第一，他把积极防御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筹划，并通过战略上的“以一当十”和战术上的“以十当一”即战略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来实现它。第二，在具体内容上，它除了战略防御中的攻势行动这一普遍原理以外，还与战略反攻以至和战略进攻相联系，明确提出：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第三，在夺取政权之后的防御外敌入侵的国防战略中，又提出通过积极防御战略来争取和平环境的实现，明确指出，只有加强国防，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防止战争。使积极防御成为指导和平时期巩固国防的军事战略方针。

(5) 武力威慑战略。在现代，将“威慑”作为一种战略理论，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威慑战略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过“止戈为武”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主张。毛泽东本人并未明确提出过“威慑思想”这个概念，但他的威慑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是存在的。而真正作为一种战略思想，还是在建国后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反映在两个重要的战略措施与指导上。一是实行全民皆兵。五十年代，毛泽东曾针对国际现实发出号召，在全国实行全民皆兵制度。这在当时我国受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下，对制止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犯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二是发展核武器，毛泽东始终认为，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问题，但同时又认为它确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并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因此，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搞一点原子弹，才不致受人家欺负。我国核战略武器的成功发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对制止新的战争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侵略他人。因此，毛泽东的威慑战略又具有鲜明的正义性、防御性和局部性等特点。

三、战役战术思想

毛泽东的战役战术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役战斗实践中，所概括出来的关于战役战斗方面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是伴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过程，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等主要时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在战役战斗范围内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又反映了战争发展过程中我军由游击战到正规战，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在战役战斗理论上的完整体系。

(一) 战役战术的基本含义

战役与战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役，是根据战略所赋予的任务，在局部区域或方向，于一定的时间内按照总的战略企图和计划，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它介于战略和战斗之间，直接服务和受制于战略全局，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战略全局。战术，即战斗。它是指导和进行战斗的方法。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最基础部分。它受制于战役，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也影响着战役的成败。毛泽东的战役战术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中无数个战役战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十六字诀”和“十大军事原则”就主要是这一思想体系在不同战争时期的最高理论概括。毛泽东的战役战术思想，虽属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但其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又基本上是相同的。二者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之间共同存在着明显的、具有相反性质的、局部服从战略全局的一致性和辩证关系。例如：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役战斗上重视敌人；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战略上的“以一当十”与战役战斗上的“以十当一”；战略上的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上的分散指挥，等等，都是这一基本特点的集中反映。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和要求战役战斗指挥员，必须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这是因为，战略是由若干个战役战斗构成的，它不能脱离战役战斗而独立，亦即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

(二) 毛泽东战役战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挥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毛泽东的战役战术思想，从“十六字

诀”到“十大军事原则”，集中的体现和贯彻了这个战争的根本目的和本质，同时反映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发展过程。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和朱德根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进剿”和“会剿”的作战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游击作战原则，充分体现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利用根据地有利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民等条件，趋利避害，避实击虚，以灵活机动的游击行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能动地夺取小规模作战的胜利，成为我军战役战术原则的奠基石。毛泽东说：这种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奈何我们不得的。”1930年至1931年，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所采取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体现了在强敌“围剿”的不利态势下，先退一步，避开不利决战，以保存军力，使至有利情况出现后再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其特点是：每“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而组成。”经过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红军形成了一套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为主要内容的战役战术原则。它在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却带有明显的游击性运动战的性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击战争中，根据“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所实行的战略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通过反“围攻”和反“扫荡”等作战，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中，以伏击战、袭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等为主要手段，在战役战斗原则上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1944年春到1945年夏，各根据地军民先后发动的局部反攻作战，所采取的内外线相结合的方针，逐步实行由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在数十个重大战役中，使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以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主要作战原则，在战役战斗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在战略防御中为大量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挫败敌之战略进攻，正确地采取战略内线作战的方针。各战略区经过一年半时间，先后进行了数十个运动战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实行歼灭战的作战经验“这些经验丰富和完善了关于运动战战役战斗的基本内容，并对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等正规战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使我军在攻打大中城市和特殊条件下的攻防作战，以及诸兵种合同作战的战役战斗理论都有了极大发展。建国后，运用毛泽东的战役战术思想的基本原则作指导，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祖国海边防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发展了对现代化强敌实行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反坦克、反空降和依托坚固坑道的阵地攻防作战等战役战斗理论。

（三）战役战术思想的基本内容

概括毛泽东的战役战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基本作战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等内容上。

（1）歼灭战思想。这是毛泽东战役战术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是我军战役战斗的根本指导方针。毛泽东强调：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只有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10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页。

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强大敌人的进攻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影响。在战争中，当我处在战略劣势和被动的情况下，为了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略主动，为战略反攻或进攻准备条件，必须实行战役战斗的歼灭战，才能达成和实现战略的持久的消耗战。因此，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实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然而，在战争实践中，根据战场上的不同情况，毛泽东对在歼敌规模和歼敌程度等方面又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根据作战形式的不同，他提出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在同一战场的不同时期，他又提出，初期，实行小歼灭战；中期，实行中等规模的歼灭战；后期，打大的或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有时则根据敌情的不同或变化，分别提出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和实行半歼灭半击溃之方针。这些，都是在歼灭战根本思想指导下，依据实际情况的灵活运用。

（2）各个歼敌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实现歼灭战目的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手段。毛泽东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落实到战役战斗上，就是讲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消灭，好比吃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这叫做各个解决，在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或各个歼敌。因此，不论在战役上和战术上都须如此。也不论是高级指挥员还是中下级干部，都必须学会这种方法。为了正确地贯彻这一思想，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他说，战役战斗上的“以十当一”，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实现各个歼敌，达到全歼、速决之目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与敌作战。反对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二）必须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得以实现。（三）必须拣弱的打。即在我取进攻时，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 and 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在敌进行“围剿”或“围攻”时，我以次要兵力箝制敌之数路，而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敌之较弱的一路。一路打破之后，再转移兵力去打破另一路较弱之敌，这样便能最后将敌各个击破。（四）必须采用奇袭手段。毛泽东说，在战役战斗上，我们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对敌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敌人却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何时何地这样做，这一点是保守秘密的。我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3）机动作战思想。毛泽东的机动作战思想，是其战役战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它是由中国革命战争处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一方面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又有广大地盘和人民作为活动的依托和掩护；同时，在战役战斗上又是为了实现歼灭战的根本目的等因素和条件而提出来的。机动作战具有主动、灵活、进攻等特点。即是说，在作战中必须采用机动作战的形式，使自己在情况急剧变化的复杂条件下，始终处于主动、灵活、进攻的地位，掌握着行动的自由权。其含义与运动战基本上是一回事。在作战形式、性质和目的上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毛泽东总是强调我军一切主力兵团（部队）在战役战斗中基本上都是采用以运动战形式为主的机动作战的样式来歼灭敌人。他说，为了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军必

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所谓“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其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毛泽东把这种作战通俗地解释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要打我时叫你打不着，而我要打你时则非打倒你不可。因此，他要求：（一）不要怕丧失土地。机动作战要求歼敌于运动之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地形、敌情和能封锁消息的居民及造成敌之疲劳和不意等条件，这就必须放敌前进，虽暂时丧失部分土地而不错。（二）要善于选择和造成有利战机。有计划地造成敌之错觉，给以不意攻击，使其丧失优势和主动，这是毛泽东在战役战斗中常用的方法。其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三）要忍耐待机。他强调，战役战术指挥员必须善于制造和捕捉战机；如无好打战机，则应忍耐待机，切勿轻视敌人。

（4）速决战思想。这一原则，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提出来的。他说，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因为，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一是我军武器装备和弹药没有来源；二是我军只有一支部队，在敌多路进攻时，我军为了各个歼敌，必须准备迅速的连续作战；三是敌虽多路分进，但多比较密接，打其一路时如不迅速地解决战斗，则其余各敌都来了。因此，为了保持我之主动，就不能不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然而，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这一思想又有了重大发展。毛泽东明确提出，即使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军技术条件增强，我弱敌强的情况完全改变，我仍应集中兵力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因为只有速决，才能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使我军才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并说，在战术上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为了实现速决战的目的，毛泽东认为，在作战的实际活动中还必须具备以下具体条件：（一）准备充足，不失时机；（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三）选择良好阵地，打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敌，（四）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

（5）积极防御思想。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和决战防御。它是贯穿于战略、战役和战斗防御的基本指导思想。这里则主要是从战役与战斗的意义上阐述的。毛泽东指出，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而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因此，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因为消极防御，对于保存自己只起暂时的部分的作用，而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一般说，毛泽东在战役战斗上，基本上是不主张采取防御这种拼消耗的被动作战样式的。然而，就战争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说，有进攻就必然有防御。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把防御这种被动地位变为主动。因而，无论是战略防御和战役战斗防御，毛泽东都强调必须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为我军传统的作战指导思想。尤以战役战斗为甚。其根本着眼点是，把在强敌进攻中我处在被动、消极的防御地位，通过积极主动的进攻行动，转变为主动。其方法，通常在战役上采用

《毛泽东选集》第49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页。

诱敌深入或反突击等方式歼敌于运动之中；在战斗上，则主要是依托坚固阵地实施阵前反击。这是实现战役战斗上积极防御思想的基本手段。

（6）慎战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条件下，毛泽东在战役战斗上特别强调慎战原则。他经常指示各级指挥员不可轻战，不可浪战。这一思想的基本要求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说，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并从理论上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概括成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其主要要求是：第一，作战行动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包括了解情况，确定任务，部署兵力，调整组织，临战训练，筹措给养，补充装备，组织人民群众配合等，都应有尽可能充分的预先准备。第二，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毛泽东要求战役战斗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的情况为根本出发点。他说，在研究部署时，要估计到可能变化的多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并要准备好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以便使自己立于主动。二是慎重初战。即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力争打好第一仗。他说，第一仗的胜败给予全局的影响极大。其意义在于：能打乱敌人的战役布势，破坏敌之作战企图，创造有利战场，鼓舞民心士气，沮丧敌之士气，等等。因而，任何指挥员都必须重视初战，坚决克服轻敌思想。

此外，毛泽东战役战术思想中的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以战养战的补充原则，利用两战间隙休整部队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四、作战指导艺术

毛泽东的作战指导艺术，是毛泽东在作战指导上充分发挥领导集体与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全军积极性于战争实践并赢得胜利的一种超常的艺术反映。它是毛泽东整个战争指导活动中最生动、最精彩的部分。其核心思想是“灵活”，集中表现是一个“妙”字。

（一）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作战指导艺术，具有超常性、灵活性、多变性和非规范性等特点，但它同时又必须遵循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有：（1）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一切反动派和反革命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革命的人民一定会将其打败，从这一点出发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在战略上要藐视它；然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条件下，一切敌人在军事力量上还很强大，从这一点出发建立我们的战术思想，在每一个战役战斗的指导上，又必须重视它。（2）知己知彼，科学地进行战略预测。研究和指导战争，包括敌我两个方面。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因此，必须在充分了解、熟悉和深入研究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及战争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以相互对立着的基本特点为依据，科学地进行战略预测。（3）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指导战争的人，如果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只有从政治着眼，懂得并深刻认识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务的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4）全局照顾局部，局部服从全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战争的胜败的主

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或局部关照得好或不好。因此，要实行正确的作战指导，首先要照顾好战争的全局，并在把握战争全局的同时，重视解决好有决定意义的局部。（5）军事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方式相结合。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因此，作战指导必须坚持以军事斗争为主，与政治斗争等其他斗争方式相结合，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6）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战争中必须依靠决战，才能解决两军间谁胜谁败的问题。然而，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是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战略决战的。因此，无论是在我处劣势或优势的条件下，都应贯彻“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7）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这是毛泽东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则。他历来主张“按照实际情况活用原则”，要求在指导作战时将通过周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经过认真思索，然后加上己方情况，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符合实际的计划。并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依据新的认识、判断和决心，重新加以调整。

（二）作战报导艺术的形式与内容

毛泽东的作战指导艺术的基本形式，是他依据不同情况对作战指导原则灵活巧妙地创造性运用的艺术体现。它反映在战争指导的诸多方面，现主要对其作战指导活动中最常用的战法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作如下概括。

（1）攻敌无备的艺术。这是毛泽东最常用的一种制胜敌人的有效战法。他认为，造成敌人的错觉和给以不意的攻击，就能使其丧失优势和主动。其理论根据，一是对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如“兵不厌诈”和“兵者，诡道也”等理论的继承；二是由中国革命战争在军事力量上敌强我弱这一基本客观事实决定的。这一艺术不但被毛泽东纯熟地运用于战役战术的指挥，而且在战略指导上也连获成功。例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平津战役开始前，毛泽东电令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率主力，必须隐蔽行动，在主力马上入关时，应“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指示林彪、罗荣桓率指挥机构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进均注意隐蔽。”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他要求我军“必须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二十公里地区不走，而走以北路线”。“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称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这些战略指导上的成功，都是毛泽东攻敌无备艺术的范例。

（2）调动敌人的艺术。所谓调动敌人，就是针对不同敌人的特点，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让敌疑真为假，信假为真，造成其判断上和行动上发生严重错误和过失，入我圈套，任我摆布，进而按照我之作战企图行动，使其在所拥有的优势和主动逐渐丧失后利我歼击，以达实现以智取胜之目的。毛泽东调动敌人的艺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概括其主要方法，一是诱敌深入，即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敌诱至我预设战场，依靠人民，在其分散

《毛泽东选集》第 509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586 页，第 587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586 页，第 587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657 页。

疲劳、孤立无援等情况下，集中我之精锐一举将其歼灭。二是声东击西。即示形于东，而实击于西。故意采取与自己企图相反的行动欺骗敌人，造成敌在摸不清或对我之意图作出错误判断并被调动的情况下，再出奇制胜地将其消灭。三是放敌前进。即利用敌骄狂轻敌、自恃强大等弱点，运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艺术，歼敌于不意之中。

(3) 各个歼敌的艺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历来强调我军的战役和战斗必须实行歼灭战的方针。他形象地比喻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而要达此目的，在具体作战方法上则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说，在战术上“以十当一”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落实到战役战斗上，就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的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这叫做各个击破或各个歼敌。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一艺术的集中体现。为了达到各个歼敌之目的，毛泽东强调，在作战手段上，必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力求在运动中快速歼灭敌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他亲自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都是在敌兵力数倍至十倍优我条件下，采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将敌整的撕破，肥的拖瘦后，在战役战斗上逐个实行歼灭战而将敌人整个“围剿”打破的。

(4) 捕创战机的艺术。战机，即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作战时机，亦即最佳歼敌之机。毛泽东历来主张，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条件下，必须实行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不但要善于发现、选择和捕捉战机，而且还善于在没有战机时制造或等待战机。即战机成熟，有好打之敌，则迅速抓住战机坚决进行作战；战机基本成熟，尚有一定不利因素时，应相机进行作战，并尽力促使情况向有利于我之转化；战机不成熟，则创造和忍耐等待战机出现后，再行作战。毛泽东对这一艺术运用得十分灵活巧妙，他善于在稍纵即逝的战机出现时，抓住有利战机，果敢行动；或乘虚而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而当无隙可乘时，他又善于冷静地观察战局变化，等待或创造战机以便为己所用。例如他对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开始时机的选择，则是根据全国战场形势均于我军有利，而东北解放区我人力、物力、财力比较雄厚，军事上我东北野战军兵力已明显超过敌军，敌军又分散龟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点据守，且是守是撤，尚举棋不定，辽沈战役条件已成熟之时。这一招可说是毛泽东捕握战机艺术的得意之笔。

(5) 把握枢纽的艺术。即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把注意力放在战略全局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战略战役重点或关键问题上。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中，总是立足全局，善于抓住关键，解决战争全局中的主要矛盾。他强调，为了夺取战略战役主动权，必须学会“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他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于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点上，抓住有决定意义的枢纽去带动和促进整个战争的发展。例如辽沈战役，他强调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尤其是锦州一点。明确指示东北我军：“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0页。

有了主动权。”淮海战役初期，他强调作战重心是箝制邱、李兵团，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平津战役，他指示我军“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战争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善于紧紧抓住和把握了战略的枢纽，才保证了各战役的胜利，并发展成为整个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6）敌变我变的艺术。战争不但是力量的竞赛，而且是智慧的搏斗，善“变”者往往立于主动而握胜。毛泽东提倡我军的每一个指挥员，“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所谓敌变我变，即在战争指导中，第一，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变化着的敌情、地形等实际情况；第二，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运用高于敌人的战法，能动地去夺取战争的胜利。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战争实践中，敌我双方都懂得及时从经验教训中获得“智慧”，以迫敌于被动地位，把优势和主动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其关键之一，就是敌变我变的指导艺术。正确运用这一艺术的“关节点”是：适时选用符合客观实际并能制敌于被动地位的作战形式、方针和方法，而且要善于依据敌人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依据敌作战方针的变化分别采用的“钻牛角”战术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解放战争后期根据敌快速败退方式，所实行的大迂回大包围追击方针；抗美援朝战争前期，根据运动战中敌之攻防特点，所提出的对美英军实行小歼灭战的思想等，都是敌变我变艺术的成功例证。

（7）打“拉”结合的艺术。即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实施政治争取，以分化瓦解敌军。作为一种作战指导艺术，毛泽东对“打拉结合”这一原则的运用极其成功和精彩。其主要表现：在斗争方式上，从战略战役的不同层次上采用不同的办法解决敌军。如解放战争后解决国民党剩余军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在斗争策略上，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不同作战对象和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军事打击方针和政治争取政策；在斗争手段上，以军事为后盾，采用打谈结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等手段紧密配合。这些，都是毛泽东作战指导上军事打击与政治谈判巧妙结合艺术的集中体现。

（三）作战指导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战争中，不但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正确无误的军事思想，高人一筹的指导艺术，而且还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古今中外历史上无数军事统帅所不完全具有的特点。

（1）忠于实践，把胜利建立在战争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十分重视战争实践。他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在作战指导上，他有着丰富的从战斗到战略的实践经验，这是他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领导红军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和“围剿”作战；长征途中胜利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到达陕北后又亲自先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和山城堡战役，并率军东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再不容许他率军亲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82页、第61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183页。

上前线，但他在统帅的岗位上勇于大胆实践，亲自指导了多次革命战争及几乎全部重大战役。经过战争实践的长期磨炼和经验积累，使他的作战指导艺术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

(2) 长于民主，重视倾听他人意见。在作战指导过程中，毛泽东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吸取同级或下级正确意见方面堪称楷模。凡属战略上的重大决策与战略方针的制定，通常他都要建议党中央或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讨论决定。如洛川会议讨论和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解放战争大体五年左右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计划和战略进攻、战略决战等决策，皆然。他非常重视和尊重各战略区指挥员的意见，并根据实际情况修正既定决心。他还善于调动和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创造性。经常在电报中作出明确部署或指示后，总要鼓励下级指挥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依据实情机断行事。

(3) 精于组织，把作战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在作战指导中，每战都能精心组织，总是把一切作战计划建立在依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可靠基础之上。特别是对那些有战略全局安危的重大战役，更是慎之又慎。一是在一些重大战役的决策上，采取“派下去”或“请上来”的办法共同商定。如解放战争时期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就派周恩来去真武洞与彭德怀“商量作战方针”；淮海战役时又电“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并“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二是重大作战计划须经反复商量，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才作最后决定。如济南战役的攻济打援方案经与前线指挥员近一个月的反复多次协商、修改，在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才最后确定。其他如太原、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均皆如此。三是凡有不同隶属关系的部队在同一战区作战时，必须明确规定指挥关系。如平津战役时的平绥线作战，即明示“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以前。受军委直接指挥”，在其入关后“即交与林罗刘指挥。”并在淮海、平津战役时，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设立中共总前委。以“统筹一切”。

(4) 善于动脑，及时总结作战经验。这是毛泽东作战指导的又一突出特点。他不但善于对我军作战经验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撰写出类似《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理论名著，以及“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等基本作战原则，而且还善于在作战指导过程中，抓住战役战斗中那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个别典型经验，经过及时总结、提炼，加以全面推广。他还善于在总结经验时根据我军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等实际情况，概括出一些通俗易懂，便于记忆的战术名同和作战原则。如“钻牛角战术”、“麻雀战术”、“蘑菇战术”、“零敲牛皮糖战术”和“十六字诀”、“十大军事原则”等。这对于促进全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和战术思想的统一，均起了重大作用。

(5) 勤于动手，亲自起草指挥文电。毛泽东在作战指导中；曾亲自动手起草了大量的作战指挥文电。仅在解放战争时期，以他个人或中央军委名义署名的近三千份电报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均为他的手稿。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都有他起草的电报，最多者如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都在六七十份以上，甚至上百份。他曾在平津战役的一昼夜的二十二小时内亲自起草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566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592 页。

了发给前线的指挥电报共十份。亲自起草作战文电，其意义不仅以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文电享拟、修改及形成的时间，使战场指挥员能及时准确地获得战略意图和赢得充裕、周密的计划与准备战役的时间，直接为夺取各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八章 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思想

有国必有防。我国的国防，担负着捍卫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光荣使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不侵犯他人的政治本质，但又绝不允许任何外敌入侵的，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自卫型国防。国防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技术、精神文明等基础建设和国防武装力量建设等综合内容，是一个具有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综合国力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思想，主要是指建国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近三十年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坚持依靠本国力量，广泛争取国际援助与支持，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理论。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部理论在指导国防问题上的新发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一、国防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思想，虽是在建国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过这方面的理论阐述。他根据当时中国国防力量弱小的实际情况，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巩固国防。1937年2月，他发电报告诉在西安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的周恩来：“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以“参与国防准备。”同年8月，又根据日军全面入侵中国的形势和企图，在给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中，告其向国民党建议：关于国防问题我们的意见是，设三道防线，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防御。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讲到如何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实行阵地战时说：在目前，“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直到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还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但这些关于加强国防的建议和设想，当时未能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和实行。

随着国内解放战争的深入和不断发展，当中国人民将要夺取全国政权的彻底胜利时，毛泽东就及时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国防，防御外敌人侵的问题。建国前夕，他就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即加强人民军队，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的建设。“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他又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并把“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当成全党全国的两件大事。建国后从50年代初期开始，毛泽东即全面领导我国我军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并在实践中将国防现代化理论体系逐步完善起来。

（一）国防现代化思想提出的基本依据

毛泽东的国防现代化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条件为依据。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理论运用与发展，又是为保卫人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0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第3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第30页。

民政权和国家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实际经验的科学总法。其基本依据是：

(1)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它表明了无产阶级不仅夺取政权靠军队，而且要保卫和巩固政权也必须靠军队。列宁曾在讲到无产阶级军队的职能时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它是直接用于夺取政权的；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除了要对付国内敌人之外，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得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必须同它斗争。因此，“当我们已成为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时，我们就要求一切人严肃地对待国防。”毛泽东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他们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都强调，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政权之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就必须加强国防，以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指出，中国还存在两种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这主要是保存和发展人民的武装力量，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2) 帝国主义侵华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时指出，自1840年英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接着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法国入侵中国的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帝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争夺的战争，1931年开始的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战争和1937年开始又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最后是表面上是蒋介石而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把独立的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目的，他们对中国采用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而美帝国主义至今还在做着这样的美梦，想继续维持它在中国的各项侵略政策和既得利益。鉴于这些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坚定地强调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而要使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就必须建立巩固的、现代化的国防。

(3) 客观上存在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威胁的严峻事实。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公然派兵侵占中国领土，甚至直接派部队干涉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美国在青岛、上海、台湾建立了海军基地；其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其陆军先后

《列宁军事文集》第45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在北平安平镇、长春九台山和唐山、胶东半岛等处对人民解放军挑起军事事件。英法海军也侵占了上海的吴淞口。据此，毛泽东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早就指示全党全军要预防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必须预备对策，以期有备无患。提出，对策的主要方面是加速解放战争步伐，彻底消灭敌人，使各帝国主义完全丧失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走狗。其次是在经济上力自给自足，准备海上封锁。再次是加强华东、华北兵力部署，巩固国防。并在同年10月广州解放后的作战部署中指出：“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提出应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发展，完成相应的国防部署。先后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提出要把人民解放军建成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强调全军“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

（二）国防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说，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1949年底至1953年，国家处在外御帝国主义侵略，内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振兴民族的新时期。也是新中国国防经受严重考验的时期。1949年10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第一次军委会议，专门研究了国防问题，并成立了国防研究小组。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国内外处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并赢得了这场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经过三年战争的实践考验，不仅保卫和巩固了我国的国防，而且也加速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尤其明显的是促使我军各军兵种得到了大发展，并通过轮战方式使我军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陆空军部队和部分海军，取得了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经验。为了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我军还先后成立了100余所军事院校。1952年和1953年，他在给军事学院等四所高级军事院校的训词中指出：在全国胜利之后，我们已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必须建设正规化。认真兴办军事院校，培养指挥和专业人才，这是实行现代化国防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把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1954年到1965年，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的重大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促使了和平民主阵营力量的日益强大和全世界人民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重新扩大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为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环境。1954年到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每次在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强调，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在加速发展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并把它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之一。中央军委于1958年以前相继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和多次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讨论并作出了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措施。主要有：一是精简常备军，节省军费开支，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为国防现代化打下物质基础。二是加速我军正规化建设。改革制度，实行薪金、军衔和兵役等三大制度；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950年8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6页。

大办军事院校，培养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指挥机关和指挥干部；调整全国大军区，成立海军舰队；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军事学术等。三是加强国防工程和设施建设。协同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共同筹划战备交通建设，在沿海、边防和纵深要地建设基本防御体系。四是加强动员准备，建立各级动员机构，健全动员制度。这些战略措施，促进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体系。1959年到1965年，中央军委又先后多次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坚决贯彻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以及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方针。并据此对国防建设项目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原则。在国家经济困难情况下，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虽然放慢了步子，但仍有重点，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保证了国防建设中主要指标的实现。国防系统基本完成配套，某些军事工业和科技发展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低潮时期。但国防建设中的一些尖端项目仍有突破性发展。当时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大革命”，放松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国防建设遭致严重挫折。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很少召开全军国防工作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加强国防的重大问题。1969年全军战备工作会议虽然提出了一些加强国防的战略措施，并提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号召，但由于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下，实际上这些措施未能很好落实。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期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针对“文化大革命”导致国防建设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采取重大措施，对国防建设进行整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国防建设上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贯彻。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央军委新的建军方针的指导下，才使我军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的新时期。但是在这期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对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又始终抓得较紧。因而保证了我国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国防现代化建设仍取得明显进步。

二、国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现代化则集中反映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上。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共中央的设想，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5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195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已进入“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后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8年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的决议中，都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了原“四个现代化”中“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的提法，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文化现代化。并通过1964年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四个现代化”理论的完整表述，正确地规定了国防现代化的地位、作用及其与其他三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国防必须有整体观念

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保障。但是，在和平时期，当国家集中主要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下，国防现代化又必须摆正自己的正确位置，从国家整体建设的观念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建设。所谓“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全局观念，就是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亦即国防服从国家总体建设的思想。建国后到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注意了这一问题，并适时地、逐步地采取政策予以调整。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将军费由抗美援朝战争时占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降低到百分之三十。第二个五年计划则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便抽出更多资金首先保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争取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以国防工业为骨干的工业体系，并相应地把各方面的生产和建设带动起来。因此，在和平时期以国家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前提下，国防建设心须从全局着眼与之主动地相配合。

（二）国防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国防现代化虽然与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只有后三化的发展和实现，国防现代化才有坚实的基础。这就是说，国防现代化必须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即“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1）农业是基础。我国有广大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如果农业不能获得发展，必将影响工业发展的规模和建设，国防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亦将受到影响和限制。建国初期，毛泽东就狠抓了农业互助合作化问题。经过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他又从经验中提出，那种片面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不注意发展农业的观点和作法，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全党全国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2）工业是主导。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中，毛泽东始终把发

展基础工业摆在重要位置。建国初期他就强调我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建设的重点。”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定，要求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基本建成一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基本上满足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只有正确地处理好坚持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这一辩证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有力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地促进和保证国防的现代化。

(3) 科学技术是关键。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发达，国防力量是否强大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1958年，他在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提出并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新本领，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强调要建设好国防，亦需要有各种专家。因此，只有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巩固的国防。

（三）国防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同人民利益间的关系

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必须的，但原则是绝不应超过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党和国家在制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时，必须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的暂时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好既要国防，又要照顾好人民利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1) 战时应动员和号召人民承受负担，以巩固国防。国防，担负着反抗外来侵略，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解放战争虽已取得基本胜利，但当时大陆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特别是台湾还在美帝国主义干涉下阻我解放；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国又派出志愿军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国防的实际需要和为了保证夺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国家在财政支出上首先必须考虑军费应占有很大的比重。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怀相等，一半一半”。在当时从整个国家的安全考虑，不能不要求人民承受这种负担。1953年，毛泽东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说：对全国人民来说，抗美援朝战争虽使他们的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但战争的胜利对他们在根本上有利。这就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因而也就需要号召人民必须继续忍受生活上的某些暂时困难和不便，以换取长远的繁荣和幸福。

(2) 和平时期，在重视国防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统筹安排，把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好。毛泽东指出，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论只顾哪一点，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又说，队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把国民经济调整好，放慢重工业的步子，加速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会使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更加巩固。六十年代初，为了扭转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被动局面，毛泽东又要求在制定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大力压缩基建规模，降低国防工业的增长速度。继而又要求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会议必须贯彻，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一个恢复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工业、交通转到农业和市场上来。首先解决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周恩来也强调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和国防现代化、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但是，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力少了，仗又不能打，炮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因而，他完全同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必须把国防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7页。

业的步子放慢。以加快民用工业的发展。

（四）国防现代化必须与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协调发展

国防现代化与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因而，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依据整体建设规划和实际发展的需要，适时地对其相互关系进行合理调整，才能做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是“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条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

（1）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获得良好效益的关键。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重视立于全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有基础的实际水平。通盘规划，科学地适时地对四化建设进行合理调节。正如周恩来所强调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建立“四个现代化”之间合理的发展机制和科学结构，以保证国家现代化建设整体结构趋于优化，获取四化建设的最大功能和效益。

（2）协调发展，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是在总结 50 年代和 60 年代前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提出并加以完善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充分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特点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然规律及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道路。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对这个理论是清楚的。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发展的关系上，他很重视吸收苏联的经验，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没有出现他们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出现农业上不去，市场商品不够，货币不稳定等问题。然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1958 年的“大跃进”片面强调钢铁工业“超英赶美”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大倒退，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都严重地受到客观影响。事实说明，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协调地发展，否则就将受到客观规律的必然惩罚。

（3）协调发展，是加强国防实力和国防潜力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把建立巩固的国防和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全国人民的两件大事。这充分表明二者在实现国家现代化中的辩证关系及其地位与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国防实现了现代化，才有能力随时应付突然事变，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反之，只有国家经济建设搞好了，国防现代化才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并为国防潜力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一旦遇到外敌入侵，才能获得支持战争，战胜敌人的强大的经济力量。说到底，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平衡发展问题。

三、发展核战略武器的基本理论

我国核战略武器的成功发展，是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它起步于 50 年代中期，是处在国际国内形势极端困难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发展起来的。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创业；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68 页。

导我国核战略武器发展的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成为建国后毛泽东国防现代化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

（一）辩证地认识核武器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毛泽东坚持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对待一切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确处理人与物的辩证关系。

（1）核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批判唯武器论时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1945年8月，美国趁苏联红军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远东战役的同时，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起了加速的作用。但这决不是日本侵略者失败的決定因素。然而，美国却过分地夸大宣传原子武器对日本投降所起的作用，在当时的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唯武器论”的思潮。对此，毛泽东及时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原子弹决定战争胜利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辩证地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原子弹确实是一种威力很大，破坏性很强的武器，但是，它解决不了战争胜负这个根本问题。解决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民，是战争的正义性质。“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2）我们不要核战争，但又不怕核战争。1955年1月，毛泽东在接受芬兰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时，明确表明了对原子战争的看法和态度。他说：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的态度有两条，第一不要核战争，第二如果有人侵略我们就坚决予以回击。同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并比喻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便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因此，毛泽东对于原子战争的态度是，既怕又不怕。不怕，是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怕，是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大规模的毁灭性杀伤武器。所以，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同时，毛泽东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上看问题，历来把他们看做纸老虎。强调，必须在战略上藐视依仗新式武器吓唬革命人民的敌人，号召人民要敢于同它们斗争，敢于在核威胁条件下去夺取胜利；与此同时，又教育人民要在战术上，在对待新式武器特别是在防御核武器的具体问题上，又必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同上书，第4卷，第11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7页、第15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7页、第153页。

须重视敌人。这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从而在理论上把人和物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辩证地统一了起来。

（二）把发展核武器摆在国防战略的位置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到处挥舞着原子弹吓人，借势进行侵略扩张。特别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公开鼓吹和准备原子战争。在苏联逐步掌握原子武器之后，它们又各以核武器为后盾，在相互对抗中争霸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扩张政策。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破除核讹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从国际战略斗争的全局出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必须争取主动，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加强和巩固国防的战略决策。

（1）发展核武器是个战略方针问题。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他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的时候了，该抓了。”在中共中央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定后，他又指定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工业的决议。并于 1956 年 1 月，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同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地提出：我们现在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但是还不够，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并说，这是个战略方针问题。建议军委要认真讨论一下。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作出了建立和发展火箭事业的重大决策，并委托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把火箭和喷气技术的发展，列为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 5 月，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组建火箭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专门从事核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事业。经过这一系列的积极工作和不懈努力，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战略地位便牢固地确立了起来。

（2）努力实现我军发展战略的最高目标。1956 年毛泽东提出，我们以后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1958 年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军发展必须经过小米加步枪，步枪加飞机大炮和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三个阶段。要求我军的发展必须依据这一客观规律来制定规划，部署工作，明确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为了保证这一最高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毛泽东始终抓住发展尖端这个问题不放。即使是出现了最困难的局面，仍坚定不移地一抓到底。1960 年正当我国核武器的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背信弃义地断绝了援助，撤走了全部专家，使我国核技术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困难。当时，又值我国国民经济处在最困难时期，在此情况下，国内有人主张放慢核武器发展速度，或停止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毛泽东坚决主张把核武器的发展搞下去，表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1962 年在我国经济处于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必须把核武器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上。提出争取在 1964 年或 1965 年上半年实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强调“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同年 11 月，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

转引自《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 1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1 页。

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和解决尖端武器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又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要求，从而使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了很大损失，但在发展尖端技术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紧紧抓住不放。并和周恩来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尖端工业的继续进行。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使我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保证了“两弹”的相继研制成功，并使卫星很快也上了天。这些巨大成就，不仅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同时对确立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巩固国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制定正确的核战略原则

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以争创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保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必须坚持发展核武器。但是，核武器又确实是一种大规模的毁灭性杀伤武器。因此，对核武器的发展和使用，又是一个十分严肃和慎重的政治问题。毛泽东从这一立场出发，为我国制定了充分反映我国政治本质的军事策略和一整套正确的核战略原则。

（1）正义性原则。我国是无产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核自卫力量。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向中方提供核技术援助的协定。1962年8月，苏联政府妄图将美国提出的限制无核国家发展核技术的建议强加在中国人头上。毛泽东当即通过中国政府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其不要破坏中国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英两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又企图以此来剥夺中国进行一般核试验以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权利。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了这个条约的歧视性，提出了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以实现争取世界和平的战略目的。这些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充分证明了中国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即是说，我们的核战略首先必须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主动，这是正义性原则的体现。

（2）防御性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主张独立自主地发展核武器，进行核试验，但完全是被迫而为的；我们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超级大国的威胁，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措施。1963年，我国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销毁核武器的建议。明确提出在全世界建立无核区和停止一切核试验，召开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1964年10月，当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时，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国政府，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首先指出：“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职责。”表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自己的防御。并明确表示：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未实现以前，“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

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坚决不放弃自己的防御性原则。

（3）遏制性原则。毛泽东认为，核战略武器确是一种威慑力量，对于制止战争有重大意义。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1964年12月，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发展核战略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核讹诈。……如果搞得好，能够制止战争，最后消灭核武器。”

他深刻地论述了发展核武器与防止使用核武器的辩证关系。指出“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这就是说，只有我们掌握了核武器，才能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才有资格提出不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也才有力量主动建议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许多爱好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也赞扬说：“人民中国突破了核垄断俱乐部的大墙，在整个地球上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亚洲和世界和平能得到更有力的保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核战争的爆发，有效地起到了战略遏制的作用。

四、军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

我军的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它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为总方针和总任务。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是构成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毛泽东人民军队思想在国防问题上的集中反映。现代化，主要是指武器装备的先进技术和与之相适应的战术而言的，它具有客观性的世界型标准，是国防实力的主要标志；正规化，主要是针对我军过去长期处在分散条件下作战，必须逐步克服普遍带有一定的游击性而言的，它要求部队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革命化，主要是要求在军队实现现代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官兵的政治素养，使部队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旺盛的革命斗争精神，是国防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证。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经过几十年的建军实践所概括出来的基本建军理论。

（一）现代化是国防建设的中心

实现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建国后不久，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强大敌人，毛泽东把我军现代化建设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其基本理论主要有：

（1）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的诸军兵种。建国初期前后，毛泽东对建立我军现代化的诸军兵种作了一系列指示。明确指出：除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必须建立铁道兵团的组织领导，使之“成为现代国家兵种之一”；要“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对于现代化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等。并先后直接领导组建了海空军领导机关和其它特种兵。

（2）努力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建军思

转引自《战后国际关系手册》第292页、第293页。

转引自《周恩来与航天事业》第11页。

转引自《周恩来与航天事业》第11页。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57页。

想。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曾先后提出：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足够数量的军队，要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必须注意从敌军中缴获飞机、坦克、大炮来装备我军，以发展自己的空军和坦克兵与炮兵。建国初期则明确提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并在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针对敌人在被我军包围后多次在坦克支援下顺利突围逃掉的教训，指示说：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之猖獗和大量歼灭其步兵。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明显改善。国防工业体系也基本建立起来。毛泽东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知道造飞机，汽车、大炮、坦克，现在我们都开始能造了。

（3）发展与武器装备现代化相适应的战术理论。列宁曾说：“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指出：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才“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任务。”充分表明了武器与战术的密切关系。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技术，而无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战术，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为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50年代初，即相继决定成立了培养现代化指挥人才的军事院校。强调：为了保卫国防，“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从而，把由于现代化装备的发展，要求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作战的方式方法的理论也提了出来。

（4）培养具有现代化素质的军事人才。人和武器的互为作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现代化素质的人，即使有现代武器装备也是“死”的，就不可能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先进功能，也不可能充分发挥由于先进武器装备于部队而随之产生的先进作战方法的优势。因此，不但要培养大批具有现代指挥水平的人才，使之成为“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还“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二）正规化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我军的正规化建设是与现代化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基本着眼点即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作战组织指挥复杂的要求。

（1）为了适应现代战争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要求。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由于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军队建设又处于低级阶段，即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和正确的。然而，自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变化，我军已进入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了，即全面现代化的阶段。而“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克服过去那种曾经是正确的游击习气，培养正规性，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61页。

《列宁军事文集》第10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9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6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8页。

(2)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组织指挥要求高的需要。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军事战略上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就多次向各战略区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加强纪律性和正规性。“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建国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则从加强组织指挥的角度，对加强领率机关的正规性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周恩来提出：必须把总部机关建成精干、很灵、及时、准确、效率高的指挥机构，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毛泽东强调：为了组织现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并要求司令机关必须创造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新作风和新气象。

正规化必须适应现代化，而且必须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它既包括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技术工作诸方面，又广泛涉及到组织指挥、编制体制，干部制度、教育训练、行政管理、供给保障诸领域。它具体反映在各种条令、条例和军事工作之中。因此，严格贯彻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增强统一性和纪律性，是实现军队正规化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三) 革命化是国防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所谓革命化就是要在新的建军历史条件下，使人民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不脱离人民的，非单纯军事观点的革命军队。它既是和平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正规化建设的政治保证，又是为军队创造战时的政治优势条件打牢固基础。毛泽东说过：红军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因此，他要求：“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1957年周恩来在《进一步提高军队政治素养》的讲话中针对我军转入和平整军之后，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面已有明显进步，但在革命化方面却有所放松的实际情况，强调军队必须坚持战斗队、党管军队、军政协作、官兵平等、军民互助等原则。上述这些，都是我军革命化的重要标准。它具体要求：

(1) 军队必须保持高度的敌情观念和革命警惕性，随时防止突然事变。“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2)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有力工具。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强调：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并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办法就是一年抓几次。周恩来则解释说：党中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各地驻军要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使军队了解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

(3) 加强军政联系。军队应该关心地方建设，互相学习，加强协作，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建立正确的军政关系。毛泽东历来强调通过拥政爱民活动来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都应关心，应与地方加强协作，并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如此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关心和支援。

（4）改善官兵关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必须保持我军的优良传统，建立军队内部融洽的官兵关系，提倡自觉的纪律，充分发扬民主，不要因为正规化，实行军衔制等，而使官兵之间拘束和疏远起来。除打仗强调按级服从以外，平时交往应建立同志式的友爱，以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

（5）改善军民关系。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一定不要忘本。战争年代我军依靠人民群众夺取了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那时军民关系融洽，军队有缺点人民也能谅解。但和平时期自军队进入营房之后，军民关系就比过去容易疏远。因为是平时，军队又不打仗，“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因此，必须注意改进军民关系。

五、国防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探索，在国防实力与国防潜力的发展上，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打下了较为牢固的物质基础；在国防理论与国防实践的结合上，也取得了较为丰富和有益的经验。进而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国防现代化理论融为一个科学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创造了一条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国防现代化必须以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依据。

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历来是我们党制定战略和作出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研究和处理中国的任何问题，都必须首先弄清国际战略这个大环境，并以这个大环境为依据，才能产生和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毛泽东研究战略，制定政策，历来都是按照：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的基本方针的公式办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对和平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正确预测国际战略环境，并以其作为制定国防战略和确定国防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依据。因而我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历次重大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基本上是向着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的。”出现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和平地区。因而科学地作出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处的恰当位置，实行和平整军的决策。并从最坏的情况着想，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中苏矛盾激化，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分化；美帝国主义在印支半岛发动了侵略战争。美苏两霸都在全球推行核战争战略，并在南北两方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据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65年提出，准备战争来得快，大打，甚至打核战争的国防建设方针。对于所处严重局面，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应从最坏的情况作好思想准备，而在实际工作上，则努力争取向好的局面转化。并经过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积极稳妥的战略调整，促使中美、中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日关系得到了改善，美国从印支半岛和台湾撤军，从而使我国的南部威胁得到了缓解。1974年，毛泽东又根据对国际战略形势的长期观察与分析，从世界战略格局的诸矛盾中，找到了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霸权主义者的新策略，进而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于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改变或影响国际战略形势与战略格局的发展，确定我国国防战略方针和发展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些都足以说明，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是我们认识和平与战争问题，并确定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处地位的根本依据。

（二）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关系

国防，是国家总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家整个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所提出的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是两件大事的论点，深刻地阐明了国防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国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中作了详述。特别是国防现代化依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已讲得十分明确。它从基本原理上阐明了经济力量是暴力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你对于原子弹是真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第一，国防与经济存在着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战争历史的发展规律表明，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国防活动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制约着国防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现代国防，没有强大经济力的支持，必然难以维持；反之，国防又是国家安全，和平建设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保证。这里，国防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国防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反作用。按照一般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国防具有促进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尤其是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起着先锋带头的作用。这一点，已被我国的国防实践所证明。

（三）正确贯彻国防现代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国防现代化除了受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影响与制约外，还将受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因此，可以说国防建设的内容和国防现代化的标准，也是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体现。1956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制定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它决定了我们不去侵略别人，“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因此，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1）积极防御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争创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在指导和处理国防事务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张不但要用积极防御的思想为指导，在战争爆发后去赢得战争，以巩固国防。同时强调必须用这一战略方针为指导，在战争爆发前去制止或推迟战争，以维护和平。这就是采取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永不称霸的军事战略，以广泛团结世界人民，维护和平，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了中美、中日间的国家关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4页。

系，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2）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毛泽东曾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建国后毛泽东始终警惕地注视着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顶住霸权主义压力，强调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敌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侵犯。在保卫国防的实践中，他除亲自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等战争，为东方和亚洲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以外，还在严守边防，寸土不让，决不后退的思想指导下，在对方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蓄意挑起武装冲突、制造边境事端的情况下，指挥了中印、中苏等历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击了扩张主义者的侵略气焰，保卫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

（3）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具有多层次的完整性。由于我国疆土广阔，国防情况复杂，在积极防御总战略方针指导下，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许多具体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必须因具体情况而制宜。因此，在这个总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周边的具体情况和不同敌性国家的军事战略，应该分别制定出统管全国的和不同战区、不同军种的、能够应付不同情况的具有不同层次的战略方针，只有战略方针的逐级具体化，才能使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更富有针对性，作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安排，更好地保证战略总方针落到实处。

（四）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实行全民国防

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国力出发，在勤俭建国的基础上，创造一条突出重点，照顾一般，依靠人民办国防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反对盲目赶超外国和脱离实际的倾向。

（1）坚持优先发展基础工业，保证尖端技术的发展。建国初期，我国国防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尖端技术更是一张白纸。据此，毛泽东强调，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当时主要是保证汽车、坦克、飞机和一般火炮等武器装备的生产，重点解决国防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问题。1956年，党中央又明确提出，国防建设的重点应把“原子弹、导弹、摇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

其它可以少搞。主要是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从而突出了发展尖端技术这个重点。周恩来曾经形象地把基础工业比做“一个屁股”，把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比做“两个拳头”。并说，“拳头”和“屁股”哪一个也不能少，但基础工业归根到底必须保证尖端技术的发展。（2）统一领导，多方协作，坚持“三结合”原则。毛泽东十分强调，国防建设必须坚持统一领导，多方协作，中央、地方一齐动手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认为，国防工业特别是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加强领导和组织多方面的协作才能够完成。为此，1962年11月，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决策下，成立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由国务院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领导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和组织全国大协作。强调我国国防尖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92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6页。

端技术的发展，一是实行专业化，以利于科技水平的提高，二是实行多方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求在实践中必须坚持“领导、专家、职工群众”相结合；“干部、科技人员、工人”相结合；“使用、生产、科研”相结合。以充分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各自的优势，群策群力地把国防现代化搞好。

(3) 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全民办国防的方针。毛泽东认为，既然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密不可分，因而在实践中就必须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在企业、交通、民航、通信等领域和农田水利建设中，实现国防潜力的积蓄。要求有些工业的发展，必须打破军民界限，实行军民两用。并根据国防建设的需要。坚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有计划、有目的地把战略后方和预想战场建设好。

(五) 自力更生为主，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经验

国防现代化的基点应放在哪里？毛泽东历来主张“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因而主张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这是因为：

(1) 只有自力更生为主，才能随时立于主动。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需要很大的国家。无论从国际国内的要求来说，都需要建立强大的国防现代化体系，要有一点独立能力，不然一旦爆发战争，有个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特别是在发展国防尖端工业上更须坚定不移地依靠自己。50年代初，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毛泽东就亲自批准了由兼院长聂荣臻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建院方针。1959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决策。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与逼债，给我国刚刚兴起的核工业造成了很大困难，并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事实告诉我们，完全依赖外援是靠不住的。同时也逼着我们更加坚定地走自力更生为主的路。从而使我们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主要靠自己钻研，突破技术，把核武器的试验搞成功，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

(2) 力争外援，但不能依赖它。毛泽东认为，每一个国家的能力和特长总是有限的。因而强调自力更生，并非是主张自我封闭，完全排斥外援。而是要在坚持自力更生基础上注重开放，实行有益的国际合作。这一点尽管我们曾出现过一些偏差或失误，但从总体上来说，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还是明确的。他认为，人民的国防事业是正义的，一定会获得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援。因而，关起门来搞国防建设的想法是错误的。正如周恩来所说：不用说我们现在刚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和扩大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即使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建国之初争取了苏联156个项目的援助。所以说，正确的方针只能是力争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32页。

转引自《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21页。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6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6页。

外援，但不能依赖它。

（3）学习外国经验，必须取科学的态度。毛泽东说，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因而提倡“一切国家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学习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即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因为一切事物中都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诸如，在和平时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途径问题上，各有不同的模式；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针上，各国也有不同作法和政策。总之，都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必须看到，他们都是从各自的国情和需要出发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国大、经济力弱、依靠人民等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灵活运用，使外国的经验完全和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变成中国的东西。

第九章 邓小平对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新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实践中，根据客观实际对军事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战略决策，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过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198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小平同志既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军队建设和改革的总设计师。……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军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坚定不移地肯定和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

1980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时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的、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这一段论述中可以说明，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贡献应该体现在坚持和发展这两个方面，而且可以这样说，他第一位的重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地肯定和坚持了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这一点并不亚于他在理论上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就是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从根本上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肯定和坚持，也就不可能有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一）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本人的功过，是直接关系到能否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晚年犯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在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的一段时间里，曾有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散布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不灵了”的论调，企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科学的态度，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给予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抵制了那些企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和倾向，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前提。

邓小平认为对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1980年至1981年，他在主持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对决议稿起草和修改意见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6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63页。

的九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指出，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因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说，新中国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伟大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的领导分不开的。所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必须看到这个全局。我们必须在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所产生并经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1）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是：“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3）对毛泽东所犯错误责任的想法是：“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复杂的历史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4）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上的光辉形象，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由于邓小平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坚定不移地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从而使全党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这不但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且对在军事领域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我军建军作战的指针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革命行动。产生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并经过革命战争实践反复检验而被证明是真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还要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十分坚定和明确的。他强调，我军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使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与国家整个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地发展。与此同时，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基本原理，仍是我军建设和作战的指导方针。1978年3月，他在为军事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题词时指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5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43页。

事科学。”多年来，他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求在今后新的条件下必须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在军事领域中，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基本原理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基本原理主要有：（1）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即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邓小平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2）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1975年初，邓小平就根据军队建设存在着的混乱状况，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好好地清理一下，”以恢复我军的光荣传统。后来，他又对这个问题多次进行了强调，充分肯定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些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主要是：一是关于党的领导和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正是根据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因此，必须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二是关于我军的传统作风。邓小平明确指出：“恢复我军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二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根本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四是关于纪律问题。邓小平认为我军的性质和宗旨规定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必须很好坚持。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亲自领导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我们更应该很好坚持。五是关于官兵关系。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我们军队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研究怎样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官兵一致的原则，实行三大民主。他认为搞好三大民主，要从连队和各级党委抓起，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3）人民战争。邓小平说，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靠的是人的因素。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一点。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不讲究技术也是要吃亏的。但是，如果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我军现在搞现代化建设，即使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现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4页。

同上书，第3页。

同上书，第42页。

代化，但同敌人比起来，我们的武器装备仍将处于劣势。到那个时候，如果打起仗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靠的就是人民战争。“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4）军事战略和战略方针。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国际战略斗争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权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并强调说，毛泽东把中国划到第三世界，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永远坚持。1980年，我军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新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对新的战略进行了调整，肯定了毛泽东历来坚持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5）自力更生为主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否就一切依赖外援，邓小平明确指出：“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他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激励下，我们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当然，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自己艰苦奋斗。邓小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这些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肯定，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依据。

（三）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了大肆的歪曲和篡改。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坚持和发展的问題，是继续坚持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把毛泽东说过的话看作“句句是真理”，必须字字照办，句句照办，还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当时，有人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指示，不仅恢复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为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明了方向。

早在1975年，针对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肢解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的做法，邓小平就指出：“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1977年，“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提出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代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7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8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1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3—34页。

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科学论断。7月21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间，这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的话是正确的，在另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不仅从总体上应当如此认识毛泽东思想，而且“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又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邓小平还正确区分了作为完整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个别论断之间的关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就说明，承认毛泽东在个别论断上的失误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着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两个部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完整正确的。

正是由于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理论前提，事实也正是如此，从1978年下半年起，邓小平在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强调了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又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二、对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新发展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它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只有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才能制定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曾有许多论述，为我们研究、指导战争，争取维护和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对当代国际形势新发展的长期观察和深刻分析，对当今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结论，发展了毛泽东战争与和平的思想。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对毛泽东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新发展，是建立在他对当代世界形势正确分析这一基础之上的。当代世界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其最主要的问题又是什么呢？邓小平科学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

名论断。1984年5月29日，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同年10月31日，邓小平又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1985年3月4日他又进一步指出：“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他对毛泽东战争与和平理论新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并不是他主观的臆断，而是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科学分析的必然结果。世界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不同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也具有不同的特点。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作了深刻地分析，他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这就说明，垄断是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实质。垄断代替自由竞争，但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形成更大的竞争，这就使得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不仅没有可能消除，而且不断加剧。这是因为，由于垄断和竞争，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更为严重，造成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急剧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出现政治不平衡，从而出现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剧和战争的爆发，必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就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决定了战争与革命成为当时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

当代世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世界的基本矛盾虽然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其表现形态已不是两阵营的联盟对抗。目前两种社会制度实际上进入了共处与竞争的相持阶段，其斗争方式也由过去的武力对抗为主，转变为和平竞争为主。其次，由于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进一步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上、政治上相互依赖的因素超过了相互矛盾的因素，因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由过去军事对抗为主逐步向经济上又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44页。

同上书，第8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5—96页。

抗又联合的转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这种联合，既是生产进一步社会化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再次，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自我调整，以使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和剥削手段的改换，一方面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和，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的威胁相对减弱；另一方面使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某些协调。最后，由于殖民地国家政治上逐步获得独立，原来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之间那种赤裸裸的侵略与被侵略的矛盾冲突也发生了变化，而突出以经济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矛盾表现出来。邓小平正是通过对这些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变化的深刻分析，从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使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

（二）新的国际战略理论

邓小平根据近十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斗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在总结建国后几十年国际战略方面的经验和继承毛泽东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并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国际战略理论，为维护 and 争取和平作出了贡献，使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始终处于赢得多数、进退主动的有利地位。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处在美苏两霸和周边一些敌对国家或集团的军事威胁和包围之中。毛泽东通过正确的战略筹划和指导，在国际战略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先后改变了中美、中日关系，使我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应有地位，不但改变了我国四周受敌的不利战略态势，并在南面缓和的形势下便于集中力量应付一面。同时，在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中形成了美、苏、中相互制约的大三角关系。但当时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却形成一个一条线或一边倒的方针。这种对外政策虽然对我们有利，但也有为超级大国提供了打中国牌的不利因素，从长远看它并不利于国际形势的和平发展。据此，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中国由“一条线”、“两角争”，变成真正的三角中的一角。1984年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利用这一家那一家搞什么战略关系。过去我们搞了，效果并不好。要总结这个历史经验。1985年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个重要的改变，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路线。我们的政策应该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的一方。使中国变成真正的三角中的一角。这一新的国际战略理论，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在维护和争取世界和平中的地位。

（三）找到了解决世界争端的新方式

世界争端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引起战争的直接原因。用什么方式去解决世界争端，以争取世界和平？这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从历史上看，人们往往主张用战争或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世界争端，以赢得持久的和平。列宁就曾这样说过：“用革命的办法去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消灭资产阶级统治，赢得社会主义和持久和平。”这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先进行革命，然后取得和平”的方式。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要“用革命制止战争”，“用战争消灭战争”。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单靠战争这种方式去解决世界争端，以赢得和平，已经不是唯一的方式了。又该用什么方式

去解决世界争端呢？邓小平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富有创造性的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争取和平的新方式。他说：“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又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他并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具体方法。

（1）实行“一国两制”。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他在《一国两制的构想是能够行得通的》这篇文章中说：“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或者说用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怎样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呢？这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又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构想。我们提出这一方针不仅因为面临香港问题，而且因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维护世界和平。”他认为过去很多世界争端我们没有解决好，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如果“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以赢得世界和平。

（2）“共同开发”。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往往是引起战争的导火索。如何正确解决领土争端？邓小平提出，在没有解决领土主权问题之前，对于某些地区，可以先由双方共同投资建设，尔后再根据人民的意愿解决主权问题。他说：“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出新的路子解决。”又说，如南沙地区，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放。”这种方法，是用经济手段把两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逐步消除对立情绪，增进相互了解，为解决领土主权创造有利条件。

（3）和平对话。邓小平主张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达成裁军或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进而达到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对于国际间经济上的争端问题，不诉诸武力，采取对话的方式加以解决。他指出：“南北问题，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

用和平方式解决世界争端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思路，它符合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要求，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将有力地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

（四）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和避免

对于世界大战能不能避免的问题，建国后，毛泽东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在50年代初期，他认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和避免的。后来，他认为世界大战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两种可能性。到60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思想。邓小平通过对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分析和思考，对当代世界战争与和平发展趋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8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4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9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44页。

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和结论，提出了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如果工作做得好，大战可以避免的新结论。1984年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險始终存在，但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他又指出：“虽然战争的危險仍然存在，如果搞得不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6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过去我们说，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何改变了这个观点，根据国际形势，和平是可以争取到的，当然赢得和平要做一系列工作。”新的世界大战为什么能够避免，邓小平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美苏力量相对均衡，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邓小平指出，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打世界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但他们现在处于力量的相对均衡时期。他说：“所谓战争，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但都不敢先动手，因为，双方都有毁灭世界几次的军事力量，这对世界战争就是一个制约。”（2）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邓小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相当的发展。只要全世界人民一起争取，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赢得。”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觉醒，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大都摆脱了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国家。他们大都经历过被侵略的历史，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强烈要求世界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认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的发展意味着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力量的增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将超过一万亿美元。再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努力，中国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力量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更强大了。再加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更有条件避免战争。”

（五）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关于战争根源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之后，揭示了私有制和战争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说：“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人类社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列宁虽然也认为战争和私有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指出：“战争对私有制基础并不是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和必然的发展。”但他通过深入剖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本性后，得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科学论断。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

《人民日报》1984年11月8日。

《人民日报》1985年9月15日。

《人民日报》1986年4月24日。

《情况通报》1985年458号。

《人民日报》1985年10月10日。

《人民日报》1985年10月30日。

《人民日报》1986年6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49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0页。

战争根源理论，也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60年代以后，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畸变，逐步走上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并不惜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诉诸武力。面对这种复杂情况，毛泽东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理论加以延伸，认为苏联已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美苏争霸成了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通过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明确提出了“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的思想，从而把现代战争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现代战争根源更深刻、更准确、更直接的揭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根源的思想。

(1) 揭示了战争根源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各个国家执行的对外政策之中。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霸权主义则是一种国家行为，一种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体现。把帝国主义看成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这主要是从社会制度中去寻找战争的根源；认为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则直接是从各个国家执行的对外政策中去寻找战争的根源。

(2) 科学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局部战争则是不断。这些局部战争有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那么，如何说明这一现象呢？按照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说法，是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的。提出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就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它就可能成为战争的根源之一。

既然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那么，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因此，我国的对外政策，第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三、对国防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非常重视，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而且领导我国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党和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在国家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作为四个现代化内容之一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到底怎么搞，这实际上是邓小平自1975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及其以后就一直考虑和重视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坚持贯彻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为我国国防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 “我们必须有巩固的国防”

国防，是为了捍卫国家安全生存与发展利益而采取的一切防卫措施的总和。毛泽东早就指出，作为一个国家，“国防不可不有”，并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新形势下，我们还要不要加强国防建设？对此，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24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2页。

明确地回答：“我们必须有巩固的国防”，从而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邓小平首先分析了国防现代化与其他“三化”的关系。他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这就说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只顾其它“三化”，而忽视国防现代化。其次，分析了国防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具体作用。邓小平认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要取得一个飞跃的发展，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需要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环境。让别人在南面、北面天天威胁我们，边界不得安宁，搞四化行不行？不行的，心里不踏实。1987年，他在会见一位外国首相时又说：你们最希望和平，我们也最希望和平。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就转到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上来，说得完全一点，就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要搞建设，就需要国内的稳定和国际的和平环境。那么，国内的稳定和国际的和平环境又是从哪里得来呢？一方面要靠我们国家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指导，但同时也需要国防实力的不断增强以作为有力后盾。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后盾，国家的安全便没有可靠的保障，也就谈不上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环境，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就不能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防现代化建设。

（二）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对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曾有明确的论述。他说：“只有经济建设发展的更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的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能否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否顺利进行的大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一方面，他从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求得一个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这个意义上，强调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不好，反过来又必然会影响到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因此，四个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早在197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就指出：“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80年代后，他又多次在讲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国防要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地位不相称。因此，国家必须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否则，肯定会影响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这就是大局。我们所谓照顾大局，第一个大局就是这个，一切都让路。他号召全国党政军民要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对于军队来说，不但不能妨碍这个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75页。

大局，而且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考虑如何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建设，以促进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这是顾全大局的问题。

（三）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平战结合、寓战于平”式的国防建设道路

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国防现代化建设又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呢？邓小平根据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平战结合、寓战于平”式的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在国防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1）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一方面是指国防工业在和平时期要能够生产民用产品，军转民用，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邓小平指出：“军队各个方面和国家建设有关系，……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另一方面，民用工业企业也必须在平时掌握军品生产的本领，使军民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发展。实践证明，走这样的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而且也有利于国防建设的发展。

（2）平战结合，寓战于平，就是在平时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国防建设。例如，无论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城市发展规划，大中型建设项目定点布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等，都要统筹安排，系统配套，在研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要兼顾国防效益，从而真正把国防建设寓于平时的国家建设之中，以增强国防潜力的积蓄。

四、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指对军队建设的全局性筹划和带根本性问题的认识，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一）提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军队是国家的暴力工具。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军队建设便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这就决定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实行战略性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建国前的 22 年，我军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建军思想，使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88 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88 页。

建国初明，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过去的以发动革命，进行革命战争为主转变成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全面建设为主。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要求党的军事工作也要转入和平时期，百万大军迅速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战场，军队建设开始从基础抓起，向高级阶段发展，组建了新的军兵种，完成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化，创办各种军事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军队建设呈现出了可喜的局面。然而，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置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上，延缓了我军向现代化前进的进程。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以他特有的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在深刻分析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的预测的基础上，对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断，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在1984年11月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初步阐释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问题。他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1985年5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邓小平的思想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

听谓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即把军队建设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对此，在1986年12月25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杨尚昆作了解释。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什么样的转变呢？这就是，要求我军的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的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具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1) 军队建设从临战状态下的应急性建设转变到相对和平时期的根本建设上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世界大战的危险性看得过于严重，使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基础之上，因此，军队的一切工作都把随时准备打仗作为唯一出发点，从而使军队建设只注意眼前的应急建设，忽视了长远根本建设，这样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延误了军队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改变了这种状况，根据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自身规律，从根本上增强军队战斗力为着眼点，符合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

(2) 从片面强调军队的自身建设转到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上来。把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基础之上，必然把军队建设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来抓，一切为了和服务于军队建设。这种片面强调军队的自身建设的做法，一方面并不符合和平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结果，只能是既影响

国家的经济建设，又影响了军队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是强调把军队建设放到整个国家建设这个大局中来考虑，把军队建设看作是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局，而不能妨碍和违背这个大局。这就使我军建设有一个现实的基础。

(3) 突出军队建设以现代化为中心这一根本。建国以后，我军建设一度受林彪极“左”路线的影响较大，割裂和歪曲政治和军事的关系，片面宣扬政治建军，提倡什么靠“精神原子弹”去打仗，从而使军队建设受到影响，军队战斗力受到削弱。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要确立以现代化为中心这一根本观念，并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军队建设。

总之，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不是消极被动的措施，而是积极主动的决策。其实质就是在加强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

(二) 改革是军队建设的动力

邓小平曾多次说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在南巡讲话中，他又进一步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提出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他认为，改革不仅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的共同任务，而且贯穿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对于军队来说，改革是军队建设的动力。

对于军队的改革，邓小平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强调军队的改革要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个总目标，有利于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因此，任何削弱我军战斗力的所谓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第二，军队改革，必须从我军特有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坚持我军好的光荣传统，也要敢于摒弃过时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创造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東西；要借鉴外军成功的经验，又决不能照搬照套，一切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三，军队改革必须破除僵化的、因循守旧的思想，清除“左”的影响。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对于一个军队来说也是如此。在破除僵化的、因循守旧的思想中，必须要清除“左”的影响，正如杨尚昆同志所说：“军队要改革，关键在清‘左’。”第四，军队的改革既要大胆坚决，又要细心谨慎。所谓要大胆坚决，就是说，凡是看准了的，研究透了的，属于非改不可的，就要下决心去改，改到底，不能遇到困难就退下来，要有一股勇气。因为军队改革是一项开拓性的系统工程。所谓细心谨慎，就是说，军队改革一定要慎重从事，科学论证，不能操之过急，不仅不能把军队搞乱，而且要有利于军队的稳定。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第五，军队改革要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认为军队改革同地方改革有其一致之处，但是军队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军队改革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地方。这就要求军队对地方改革的好经验，既应该学习和借鉴，又不能完全生搬硬套，应该适应军队的特点，使改革符合军队的实际。第六军队的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不能一次完成。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艰巨性时说：这“是一

《邓小平文选》第 133 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06 页。

场伟大的事业，有些事情不可能一次完成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差错。”。军队改革也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只有不断地改革，不断地积累经验，把改革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才能把军队改革不断深化下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下，我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精简整编，体制改革，裁减军队 100 万，合并大军区，建立预备役部队等，使我军建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三）走精兵之路，重视质量建军

走精兵之路是我军建设的一个传统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实行过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兵贵精，不贵多。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精兵思想。

1975 年，邓小平针对我军当时的状况曾经指出：“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又指出：如果“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他还深刻地阐明了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指出军队的人数过多必

然要制约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从而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说：“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在 1984 年的军座谈会上，邓小平又一次阐明了精简军队与提高战斗力的关系。说：“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从些论述中可以看到，精兵并不是仅仅精简几个军队人员的问题，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军队数量的减少，是为了军队质量的高。质量建军的思想贯穿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的始终。

五、对军队革命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注重军队的革命化建设，这是我军建设的一个传统思想。以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立人民军队时，就十分注重军的革命化建设，系统地解决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问题。在新的史条件下，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队革命化建设的想。

（一）始终坚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军队革命化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思想政治建设，使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因此，军队革命化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要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对此，邓小平从 70 年代末到 1989 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止，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在粉碎“四帮”后不久，他就指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搞好，祸害极大。这一点对于军队极为重要。他说，我军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1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83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 页。

同上书，第 248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249 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1989年6月9日，他在我军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我们的军队又经过了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同年11月，他在要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的讲话中又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新时期坚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极端重要性，揭示了坚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与我军职能之间的关系，这是加强我军革命化建设的根本所在。

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就只能通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来实现。因此，邓小平十分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75年，他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说明了党和军队的关系。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后来又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还以战争年代我军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作用。他说：“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打仗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一个连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战斗力强，为什么？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所谓“党军分离”，“军队国家化”，“变党军为国军”，妄图否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思潮，邓小平还深刻地论述了党、国家和军队的关系，指出：我们的军队不管怎样，是国家的军队，同时又是党的军队，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二）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必须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以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在我军建军55周年时，邓小平作了“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的题词，所谓军队的光荣传统，主要是指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埋头苦干，谦虚谨慎，老老实实，讲团结，守纪律和不怕牺牲等反映人民军队本质的传统作风。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新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影响，使军队的这些优良传统没有得到很好发扬。因此，邓小平强调必须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些光荣传统。他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丢掉了，那是很危险的。这就说明了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军队革命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坚持军政、军民一致的原则。

邓小平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现在，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新的内容。军队自己要努力，要使军队值得人民和地方尊重，真正为国家的改革开放起到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1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3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2—233页。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要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加强军队的革命化建设。

六、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含义，包括军队进行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全部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提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军队的总方针，以使我军建设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后来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毛泽东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在军队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彻底实行，使我军现代化建设一度遭受了挫折。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思想。

（一）制定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军事战略

新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依据和基本的指导思想。因此，它是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首先必须弄清楚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即使在若干年后爆发战争，我们的武器装备还是劣势，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70年代末期，他在同一位外国朋友谈话时说，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制定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就是积极防御，就是人民战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不会去侵略人家，但敌人要打来，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民战争。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据此，他提出如下战略方针：在陆上我们可以按阿富汗、柬埔寨人民的办法实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用较落后装备对付现代化装备；在海上，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建设海军基本上是为了防御；在尖端技术方面，我们发展核武器是象征性的，是对超级大国的一种制约力量。由于邓小平为我军制定了新时期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这一军事战略，从而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这是我军现代化建设实践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确定军队现代化的编制体制

军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因此，军队的编制体制对于军队整体力量的构成和充分发挥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建立科学的军队编制体制都高度重视，并在50年代，亲自领导我军成功地进行了三次全军性整编，完成了以陆军为主，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建立起合成军队的编制体制，军队编制体制的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是，后来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军的编制体制出现了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以致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根据我军编制体制的现状，提出了确定军队现代化编制体制的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我军的编制体制更加科学化。邓小平认为确定军队现代化的编制体制，不仅能够从自身建设（军队的编制体制）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形成和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还可以带动军队建设其他方面的发展。他说：“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例如，军队的武器装备发展，军事训练等都同军队的编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必须确定现代化的军事编制体制。邓小平说：“编制要严格稿，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为此，邓小平提出，第一，要确立一个精干的，便于统一指挥的编制体制；第二，恢复和建立军官服役与退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0页。

同上。

体制度，使军队保持生气；第三，在部分在职军队干部中实行政工制度，以便较好地解决技术骨干的保留和现役军官需要年轻化之间的矛盾；第四，根据各个战区的不同特点，以及武器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调整大军区，实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新编制，从而较好地解决平战结合和组织指挥问题。这些措施的提出和实行，从编制体制上把我军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发展具有先进性的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核心。加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对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发展武器装备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原则，从而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武器装备发展道路。

邓小平认为发展武器装备是个战略问题。在 1975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就提出，必须把军队的武器装备解决好。不单是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问题，也不是小事，也要研究解决。否则，打起仗来，非战斗减员不知有多少。因此，他说：“我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怎样抓好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呢？邓小平强调：一是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他说：“军队装备的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又说：“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国防现代化。”二是要突出重点。邓小平认为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突出重点。他希望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先搞什么，后搞什么，重点放在哪里？并明确指出，军费平均使用，特别是把钱再花在轻武器上不合算。如果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国力大大加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使我军的武器装备得到新的提高。三是科学研究必须走在前面。邓小平说，不论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也不管是大型装备还是小型装备，首先都必须解决好科研问题，做到科研先行，坚持多研制，少装备。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好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三结合。特别要重视科研人员，帮助和鼓励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创造条件，使其专心致志地开展研究工作。四是把军费中更多的钱用来改进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受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制约的。因此，如何用好有限的军费，能够作到把军费中更多的钱用来改进武器装备，这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的战略问题。1980 年，他在一次防务作战研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军队就是要考虑如何把有限的军费用得更好，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能够作到把军费中更多的钱用来改进我们的装备。这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因此，他提出：“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and 道路。

（四）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教育训练是提高部队军政素质的根本途径。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缺

《邓小平文选》（1915—1982 年）第 200 页。

《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 45、61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49 页。

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情，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毛泽东历来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强调部队要充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建国后，他又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特点，对部队现代条件下的教育训练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1)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主要靠教育训练来提高战斗力。为此，早在1975年，他就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1977年8月23日，在军委座谈会上他又专门作了《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讲话，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还指出：“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邓小平提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不仅强调了教育训练的重要性，而且抓住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中心，揭示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内在规律，符合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

(2) 教育训练要面向现代化、而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年，邓小平在为景山学校的题词中明确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题词不仅为国民教育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是军队教育训练必须遵循的方向。教育训练面向现代化，这就要求教育训练一方面要主动地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教育训练本身必须实现现代化。教育训练面向世界，这就从我军教育训练的实际出发，吸取和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外军教育训练的求经验，不断提高教育训练的质量，使我军的教育训练适应世界军事科技和军事学术的发展。教育训练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教育训练要有超前意识，使教育训练培养的人才不仅能够适应军队当前需要，而且能够适应未来战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3) 教育训练的重点是干部。干部是军队的带头人，是战争的指挥者和骨干力量。邓小平针对我军干部的素质与现代战争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认为教育训练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的重点应该是培养干部。他说：“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还指出：“过去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现在海军就得有海军的专业知识，空军就得有空军的专业知识。参谋业务也同那个时候不同，知识面要宽得多。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而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抓好军队干部的教育训练，使他们“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第263页。

《给总高级步校的训词》1953年1月7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7页、第2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7页、第2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8页。

同上书，第228页。

部也要学，都要懂现代化战争。”为了培养军队干部，邓小平认为必须办好军队院校。他说：“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院校，这总是一个办法。”

（4）教育训练要对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都有利。1977年12月，邓小平针对我军在和平时期，每年都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实际，提出军队的教育训练“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又说：“在教育训练中给干部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这对国家建设有利，对军队建设和战备也有利。”这就对军队的教育训练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要“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

（5）提倡勤学苦练的精神。邓小平历来强调从严治军，体现在教育训练方面，他提倡勤学苦练，认为只有从勤学苦练中才能真正学到本领。他说：“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他主张，无论是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还是政治觉悟的提高，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增长，都是要靠勤学苦练。因此，从战士到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勤学苦练，从而增强自己的军政素质。

《邓小平文选》第59页。

《邓小平文选》第2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71页。

第十章 从实际出发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诞生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国现代军事理论，不仅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将随着新的军事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如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与现实特点相结合，不断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推向新阶段，便成为我们正确对待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弄通基本原理是坚持与发展的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连续的，具有前后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也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它也只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没有这个基础，就失去了发展的必要基础和条件，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应该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搞清楚，打牢理论根底。

（一）弄通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理论依据和重要的理论来源。它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它是我们认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思想方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先进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因素；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基本理论，即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的总方针、总政策与总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等等。把这两方面的有关原理正确地加以结合，就成为指导我们认识、研究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科学理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正是掌握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并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形成和产生了符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无产阶级战争观、方法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战略战术理论。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象一根红线贯穿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使我们在认识和指导战争时，才不致于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或陷入唯心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可见，只要弄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所继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在理论上有了根底，就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阐明战争的性质、类型及战争与其它社会现象或社会因素之间的必然内在联系，揭示不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就能坚持正确的建军方向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就能实行彻底的人民战争路线，科学地认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就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和指导革命战争。所以，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懂弄通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

（二）弄通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基本规律的原理原则

从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方面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上优秀的军事思想；中国

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对这三方面理论的科学结合并在革命战争实践检验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敌强我弱等特点的透彻分析后指出，敌我双方相互矛盾着的根本特点所构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决定了必然产生一整套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基本指导规律。这些规律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和基本原理上，主要是：（1）建立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2）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并实行波浪式的推进政策；（3）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树立持久胜敌思想；（4）实行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紧紧地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5）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执行战役战斗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原则；（6）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把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践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军实践，必须按照这些基本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它。因此，我们就必须从理论上把握这些原理原则，弄清楚它的实质内容及相互关系，这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注重的问题之

（三）弄通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在建国后新发展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于伟大的革命战争年代，但在建国后指导我军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巩固与保卫国防的斗争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军事理论，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和巩固国防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便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保卫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任务，迫切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必须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从国际战略、外交方针、国防体制、国防教育、兵役制度、战备训练、物质条件等各方面做好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准备。二是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的理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在这种条件下，落后的军队是要挨打的。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提出了在照顾国家经济建设和不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建设包括海军、空军和各个技术兵种及指挥官等在内的、与现代化战争相适应的革命军队的理论。三是发展现代化国防科技的理论。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推行核讹诈、核威慑战略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它们的核垄断局面，毛泽东等领导我国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国防尖端技术，保证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等战略武器的制造成功，有效地增强了我军的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这些理论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巩固新生政权、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新的条件下的重大发展，也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但是我军今后进行国防建设，加速我军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掌握的基本理论。

二、把握现实特点是坚持与发展的正确方向

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前提，然而，把握现实的特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一）把握当代外军军事理论发展的特点是促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发

展的重要条件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中国古代伟大军事思想家孙武说的名言，它既是我们今天指导战争的科学真理，也是研究战争和发展军事科学的真理。熟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是毛泽东研究和指导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应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军事理论家无不注重研究他（敌）国的军事思想而产生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理论，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事思想无不伴随着国际上新的军事思想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说，任何国家的军事思想它既是要反映本国的政治制度、经济能力、地理特点、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军事实力与传统的军事思想以及国际战略环境等因素，同时又必须将这些因素与外域主要国家的、或新的军事思想相结合，吸取其有益的东西，发展自己新的理论。不如此，任何军事理论也就会因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而丧失其生命力。美国和原苏联两国的核战争理论，无不以对方的核实力和核战略思想为重要依据，并深刻地影响着各自建军作战的一切方针、原则和指导思想，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富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就不能不注重研究和不能不借鉴当今世界各主要及有关国家的军事思想。

（二）把握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及其对战略战术的重要影响，是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

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实践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如毛泽东在谈到研究战争指导规律时所说：研究各个不同战争的指导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核时代的战争，无论是核大战或常规大战，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对战争的进程、结局和战略战术所产生的影响，已远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能比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否则，它的军事思想就必然是落后的。原苏军的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正是在考虑现代战争特点的基础上，强调各军兵种在进攻战役中，必须协调一致地发挥最大的整体威力，同时打击敌之防御纵深，保证彻底歼灭敌人。美军提出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它反映了现代战争的结构，战斗力的发展变化，以及为适应当代战场要求而对古典原则的运用。现代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相比，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这些战争多是在当代霸权主义的干预、操纵或亲自参加下进行的，它具有除使用核武器以外的先进武器和技术装备试验场的性质，因此，也就具有现代全面战争的某些特点和规律。例如，原苏联至队入侵阿富汗，英阿马岛之战，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海湾战争，等等，这些局部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战争的某些特点。其中的陆上部队快速突击，大纵深立体作战，海上战略集结与展开，登岛与岛屿争夺战，现代人民游击战以及战争的动员与准备措施等，都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反映了现代全面战争的某些特点与基本规律，为我们深入研究如何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三）把握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新特点，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使我们的国家和军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我们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与先进发达的国家相比都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我们仍然取得了以发展核尖端技术

为代表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以及所处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国家战略环境等都发生较大的变化；我军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人员素质、作战能力、指挥水平、后方保障能力等现实情况也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国防建设与对今后作战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且，随着历史和时间的不断延伸，这种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国防潜力和国防实力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将是越来越接近还是越来越拉大？作战方法将有何重大变化？对于这些直接影响建军和作战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在指导实践中不能不首先搞清楚和解决的。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着眼，必须从这些现实情况出发，探索现代战争的必然规律，找出符合新的战争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这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立脚点。

（四）把握现实特点，必须准确抓住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影响最大的本质问题。

对于现实问题，只有准确抓住并认真研究对我军今后建军作战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具有本质特点的现实问题，才能真正正确解决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坚持与发展问题。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我军所面临现实情况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卫新中国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主权和领土的不受侵犯。这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了。军事科学所面临的任务和军事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已再不是建国前甚至也不是建国后前期的那种要求了。因此，坚持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来解决建军作战问题，需要把握的现实情况比过去要复杂得多，需要研究和探讨的新问题无论在内容和范围上也要深广得多。要把握现实特点，首先就必须着眼于今后反侵略战争这个根本立脚点。无论是建军还是作战，我们都应该鲜明而坚定地站在这一基本点上。今后的反侵略战争，虽然从战争性质上讲，与我们过去为夺取政权进行的革命战争同属正义战争，但在实际内容和具体形式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其次，必须把中国放在国际战略格局这个大环境中来全面地加以认识和考察，使把握现实问题的着眼点不再是限于中国的范围之内，也不止是限于亚太地区之内，而是放在更大的全球性范围。再次，必须善于从复杂纷坛的诸多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诸如，在国际战略斗争中处在既谋和平发展，又要反对战争威胁的矛盾统一体中，作为军队，必须始终集中精力把重点放在解决军事战略问题上；在军事斗争的对象上，必须分清直接和间接两类；在把握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上，必须着力把对我国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国家的基本情况搞清楚；在研究我们自己情况时，必须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了解，把反映现代卫国战争基本规律性真正搞清楚。只要作到了这些，即使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可能处于弱军和劣势地位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产生出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新战法。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实践过程是这样，在新形势下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必然如此。

三、将基本原理和现实特点相结合，在“结合”上下功夫

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和科学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紧密地联系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并随着新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弄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并且也把握了现实的基本特点，这仅是

解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等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就能自然地正确坚持并向前发展了。要真正做到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还必须从解决今后中国军事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出发，从未来反侵略战争这个根本目的出发，把“原理”和“现实”科学地结合起来，在“结合”上下功夫。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种结合便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同样道理，没有这种结合也就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了。”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可见，正确解决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与现实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是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关键。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在中国革命没有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前，不是犯脱离客观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就是犯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而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因此，原理与实际相结合，就是坚持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普遍真理与新的建军作战实践紧密地相联系，使理论变成有对象的理论，以避免教条主义错误的发生，使实践变成有理论指导的自觉的实践，以避免经验主义错误的发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结合”包含有这几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就是原理对于实践的正确运用。这主要是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军事领域中所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反对理论与实际相分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理论。第二，就是军事理论活动的一种艰苦创造。学习基本原理和认识新事物的根本目的，在于在实践运用中实现军事理论的新创造，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军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没有前人和今人对于军事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孜孜不倦的艰苦劳动和努力探索，就不会有任何军事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是任何军事理论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飞跃，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应该做到在以下几个方面相结合并努力探索新理论。

（一）用基本原理中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认识现实，努力探索新时期建军作战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研究与指导战争的认识路线与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探索新时期建军与作战问题的强有力思想武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正确地认识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的目的和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等根本问题，以及研究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问题与指导问题。在国内阶级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识和敌我双方强弱优劣等特点的分析，得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反对国内外的强大敌人中均不能速胜，但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必能最后取得彻底胜利的结论。并强调，敌我双方相互矛盾着的这

些根本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规定了一整套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基本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理论和原则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实践检验，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此，无论今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何等重大的变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仍是最根本的原则。而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则是无产阶级战争观的灵魂。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和真理的存在。这一点，是我们绝不能动摇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国内和我军客观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映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确已明显地暴露出它具有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在核战争条件下，关于现代战争与和平问题、战争根源、战争性质、战争基本特点等问题，以及现代世界战争战略集团的联盟性、战争力量的总体性、现代局部战争的起因、进程、样式和要求，等等，都出现了许多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战争观已不再适用了。应该看到的是，对于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从新的高度和视角来加以认识和考察。但这种认识和考察应该是在坚持和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这一基础之上，做到既要继承毛泽东在研究战争问题上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又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思维方式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新形势下，敢于解放思想，大胆融进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以正确认识和研究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周边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国防、军事、文化、地理、民族传统以及未来反侵略战争时主要与次要作战对象和敌我战争实力与潜力等现实情况和基本特点，从中探索新的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正确解决以新的军事理论指导建军与作战问题。

（二）用基本原理中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理论指导现实，努力探索新时期建军作战的新形式与新内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工具，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着我军根本任务、建军方向和战争指导路线。1945年四月，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这一论述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原理。几十年来，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时期，这两条基本原理是没有变的。但随着革命战争和建军实践的深入发展，表现这一基本原理的形式及内容在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例如，关于人民军队的任务与职能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仅仅提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并帮助革命群众建设政权。在这里，工作队的思想有了体现，而生产队的思想还未提出。经过抗日战争，我军为了打破敌顽经济封锁，军队在执行作战任务为主的条件下，同时又兼负工作队和生产队等任务，才使这两队的思想渐趋明朗并逐步达到完整。这在当时对于打败敌人，巩固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经过不断实践和反复认识，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才逐步地明确提出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三队”思想。又比如，关于人民战争思想，土地革命

战争前期，毛泽东只是提出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理论。但经过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不断实践，根据当时战争实践的需要，对反映人民战争根本性质的组织形式、斗争方法以及军事与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等问题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基本原理不但伴随着战争实践自身的发展有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而反映其基本原理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更有因具体条件灵活运用之必变性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在坚持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这些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坚定的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军政军民的团结，搞好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问题；认真研究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在未来反侵略战争或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中，广泛组织国际与国内的统一战线；如何组织、动员与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以何种新的形式和方法进行人民战争。把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基本原理与现实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相结合，不断发展新形式，注入新内容，这既是为了满足建军作战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是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需要。

（三）用基本原理中的战略战术原则研究现实，努力探索未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我军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这是与任何反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根本区别点。我军的战略战术的基本特点，就是善于按照变化着的战争客观情况实行灵活机动的作战。因此，只要我军的性质不变，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不变，我军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就不会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等诸多因素和作战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高、精、尖技术迅猛发展并对现代战争、战役和战斗发生了重大影响，因而我们的战略战术原则也必须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如果完全坚持老一套，也是不能正确指导我军的建军与作战的。例如，“积极防御”是我军战争性质决定了一种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也是我军传统的战略指导思想。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根据我国我军战略地位的重大变化和不同的作战对象、作战任务及敌我双方的特点，制定出不同层次、不同实际内容的指导方针。又如“诱敌深入”是我军传统的作战方针，它作为国家整个战略指导方针现在已不适宜，而作为战役战斗的具体作战方针，在今后的战争中仍是适用的，但也必须依据战争的具体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又如在战役战斗原则上，必须根据不同战略方向总的力量对比上边强我弱，或敌我强弱相当，或我强敌弱以及人民、地形等不同特点，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提出不同的作战原则来。即使是对于我军“十大军事原则”这样的传统作战方法，也必须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逐条加以分析，科学地检验真现实真理性。既不能因为是传统的作战原则，就认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必然是过时的理论，盲目地加以否定；又不能因为是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概括，就肯定是“绝对真理”，僵化地加以坚持。因此，笼统地、不加具体分析地讲某一传统作战原则，在今后战争还适用或不适用都是不科学的。至于说哪些原理原则必须坚持，哪些必须加以修正，哪些已完全过时不能再用，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加以研究后再作出科学结论，并创造和提出新的原则来。就如我军解放战争中、后期的大迂回、大包围战术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时期的运用一样，对美英军作战只能实行小包围、小歼灭战；而对李伪军则仍可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歼灭战，这一实践证明，同

一作战原则和同一战场，由于作战对象的武器装备的优劣不同，军政素质高低不同；战斗力强弱不同，作战原则就有适用与不适用之别。又如经过我军长期战争实践反复检验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在今后的战争中，它对于正规战争来说是不适用了，但对于敌后游击战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只有从实际出发，在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把现实的特点结合起来，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才能产生出符合客观实际要求的战略战术，才能适应现实作战方式方法发展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四、关键是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实践的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并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科学和真理，如果我们在实践中不能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对待它，那就必然会阻碍这一科学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曾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因此，要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改进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一）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到手，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才能应用它来研究、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实际问题，以创造出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理论。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我们很少见他引用或照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军事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和名言警句，但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所制定出来的路线、方针、原则和策略等，却是那样完整、准确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主要是因为他真正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新时期，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增多，敌情观念易于淡薄，特别是在国内已消灭了阶级，我军又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建军的条件下，更须强调在学习、研究和应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时，必须真正掌握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上，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1）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实践的科学，它既指导又服务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根本点。否则，科学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既不灵验，也没有生命力。（2）既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指导和服务于中国革命军事实践的理论，就必须坚持在指导我军今后建军作战实践中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相结合，在研究中国的军事实践问题中抓坚持，求发展。只有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军情相结合，才能引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来。（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三者之中，关键是要把方法论学到手。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说明方法论对于理论创造和对于坚持与发展理论，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从基本概念、形成与发展过程、理论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方面，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实践的理性认识和基本原理原则。要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首先就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此，就必须在打基础上认真下功夫。（1）通读原著，深刻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和军事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科学理论主要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决定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其内容极其丰富和深邃。只有在对这些文献和原著深入细致地通读甚至精读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2）加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军事理论的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都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无论是过去或现在，我们对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中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人的军事思想都还研究的不够。特别是对他们的军事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关系及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都需要深入进行研究。（3）进一步加强对毛泽东本人军事思想的研究。这方面亦还有大量工作需要作开拓性的探索。从军事著作的角度看，对于我军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战争经验，毛泽东都曾通过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和《十大军事原则》等，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但对解放战争中、后期的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等毛泽东都未能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以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却留下了大量的作战指挥文电，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三）拓宽视野，加强开放性研究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具体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回答的结果。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不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孤立的环境中产生和形成的，它与中国革命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存在着同步发展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就有必要跳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范畴，从更高的视角上和更大的范围内，拓宽视野，加强开放性研究。（1）熟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现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成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而毛泽东军事思想仅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其余组成部分，在过去都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和发展的，当然在今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必将互为作用地继续完善和发展。因此，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必不可免的要对毛泽东思想及其他各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考察和研究，以便借鉴外域经验，促进自身发展。（2）注重了解国外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状。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起国外包括军事界、哲学界、史学界、文化界在内的大批学者，特别是西方军界重视对它的研究。应该说，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无论其立场、方法怎样，但大都比较客观，他们关于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方法，理论价值的评估，特别是对于在现代战

争中所具有的借鉴和指导作用的基本看法等，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或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不了解它。（3）走出门外，把研究和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于军事实践，又必须在反作用于军事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必须打开大门，面向部队，深入实际，把理论研究和部队实践、把科研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出现理论研究与军事实践相脱离的偏向。

（四）排除干扰，实事求是，敢于创新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革命的真理和科学。科学的理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才能在实践中得以坚持和发展。因此，在处理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问题上，第一，既要防止强调坚持而否定发展的僵化思想，又要反对借口发展而否定基本原理的“过时论”，坚持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任何把坚持与发展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坚持排斥发展，或用发展排斥坚持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第二，坚持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带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军事科研任务。因此，必须采取历史的、全面的、客观的态度。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才能真正出成果，其成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才能促进和推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坚持与发展；第三，理论创造，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产生是如此，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的创造活动亦是如此。在科学道路上，不付出艰苦的劳动和创造，企图获得新的理论突破，只能是空想。只有不畏艰苦，敢于创新，才是理论家和科学家应具有的真正品格。

附录一：毛泽东军事活动大事简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从此，毛泽东开始参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

7月4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上山”以保存革命武力，应付反革命事变的主张。

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理论。

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时提出：要在湖南形成一师武装，占据五六县，就地开展武装斗争。

3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任秋收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制定起义计划。

9月9日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29日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于江西水新县三湾村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在部队中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

10月下旬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12月底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

1928 年

1 月初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遂川，召开前委和遂川、万安县委会议，总结游击战争经验。

2 月上旬经过反复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了改编。

28 日指挥宁冈、新城战斗，粉碎江西敌人第一次“进剿”。

3 月先后为工农革命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4 月率领部队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井冈山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不久改为红四军），任该军中共军委书记，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5 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特委书记，继任中共红 4 军前委书记。

同月和朱德等总结提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6 月 23 日指挥龙源口战斗，粉碎了江西敌之第四次“进剿”。

7 月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委员。

同月指挥部队粉碎了湘赣敌之第一次“会剿”。

同月率第 31 团在广大人民群众配合下，采用四面游击方式，将赣军 11 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附近 15 公里范围内达 25 天之久。

9 月至 10 月指挥部队相继取得遂川、宁冈、永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湘赣敌之第二次“会剿”。

10 月 5 日在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1 月 25 日向中共中央作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

1929 年

1 月 14 日与朱德率领红 4 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2 月 9 日至 10 日指挥大柏地战斗。

3 月 14 日指挥长汀战斗。

4 月 5 日代前委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总结了三年来红军游击作战的原则。

11 日在零都举行红 4 军前委会议，讨论新的战略计划。

4 月至 5 月指挥红 4 军攻占兴国、宁都作战。

5 月至 6 月指挥红 4 军三次攻占龙岩。

6 月与朱德、陈毅联合发出《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强调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执行的是民权革命的三大任务。

下旬出席红 4 军在龙岩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会后，被迫离开了红 4 军主要领导岗位。

11 月 26 日根据中共中央 9 月 28 日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决定，重返红 4 军前委工作。

12 月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了中共红军第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月底出席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中共红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1930 年

1月5日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给林彪的信”），开始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即“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2月7日在吉安陂头召开赣西、赣南特委和红军第4、第5、第6军军委联席会议。成立共同前委，任前委书记。决定在军事行动上集中兵力攻打吉安。

下旬相继指挥吉水、水南战斗。

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其决定适应了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8月1日在进军南昌途中，派部分兵力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灵活地处理了不赞成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

下旬与朱德率红1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与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会师后，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政治委员。

8月底至9月上旬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未克。

10月4日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占江西吉安城。

月底获悉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红一方面军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总前委召开的罗坊会议上，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1月1日与朱德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命令。

12月中旬率领红一方面军退至宁都地区，隐蔽待机。

12月下旬至1931年1月初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1931 年

1 月 15 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任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1 月至 5 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7 月至 9 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于当夜突然向沈阳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11 月 1 日至 5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并坚持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受到错误批判，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开始受到排挤。

1932 年

1 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强令中央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错误方针。

3 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江口圩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战略方针，被拒绝。

30 日在红一方面军分成东、西路军行动和日本侵略势力已进入闽南沿海的情况下，向苏区中央局建议应以东路军夺取漳州，以争取政治上、军事上之主动。

4 月中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指挥东路军进行漳州战役，攻克漳州。

8 月 8 日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接着指挥乐安、宜黄战役。

9 月上旬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分别电复中共湘鄂西和鄂豫皖分局，指出：反“围剿”作战，应依靠根据地群众，诱敌深入，待敌疲劳分散后，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

10 月上旬参加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在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上，再次遭到错误批评和指责，又一次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专任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

1933 年

1 月 17 日与朱德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2 月至 3 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8 月 20 日在江西南部 17 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

9 月红一方面军开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

1934 年

1 月 24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事业，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

27 日在同一个大会上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结论。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10 月随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进行长征。

12 月初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遭到严重损失和国民党军重兵围堵的紧急关头，力主放弃北出湘西计划。提出改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方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坪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向黔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参加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批判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的支持。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 月至 5 月参与指挥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进行的四渡赤水战役。

3 月与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行动。

6 月上、中旬指挥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会师。

26 日出席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于 28 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

9 月 4 日至 6 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

9 月 12 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界的俄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的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

13 日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越过岷山，于 17 日夺取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10 月 19 日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结束了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22 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的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决定。

11 月 3 日红军陕甘支队与红 15 军团会师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毛泽东任方面军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

同日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

中、下旬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2 月 17 日至 25 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和党的总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全国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并作出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936 年

2 月 20 日与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名义，发起东征战役。

5 月初由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进入山西和向陕甘根据地发动进攻，为避免不利决战，与彭德怀率领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结束东征。

6 月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兼任政治委员。

7 月 14 日在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西征时，向其发出《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的指示。强调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作战。

10 月组织指挥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四、第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26 日与朱德等 46 人联名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望停止进攻红军，实现国共合作抗日。

11 月中、下旬指挥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

25 日向被围困在甘肃中部地区的西路军发出指示。指出：在作战中应集中兵力，实行歼灭战的作战原则。

12 月 7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织，任主席。

同月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与杨虎城，于 12 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使国内和平基本得以实现。

同月撰写并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光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

1937 年

1 月中旬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移驻延安。

5 月 2 日至 14 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着重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抗日战争时期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8 日与朱德、彭德怀等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允许红军参加抗战。

23 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是对付日本进攻的正确方针。

8 月 11 日与张闻天联名发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22 日至 24 日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22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25 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

8 月底至 9 月指挥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由陕西三原、富平等地区先后出发，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

9 月 12 日致电彭德怀等，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指出：应向广大指战员及友党友军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17 日、20 日根据敌人占领山西大同后的形势，先后发出变更八路军原定战略部署的指示。

21 日再电彭德怀指出：今日我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只有一手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能起决定作用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10 月 6 日指示八路军进行保卫忻口、太原战役，配合友军作战。

12 日经过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在南方八个省十三个地区活动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22 日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完全同意恢复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被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

25 日发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指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同日电示各部应接受 717 团七亘村受敌袭击的教训。强调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胜必骄、轻视敌人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11 月 12 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

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要在全中国反对阶级的、民族的投降主义。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938年

1月11日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袭击战的基本作战原则和方法。

2月发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指出根据过去七个月的作战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相配合，必能使敌处于极困难地位。

25日致电项英、陈毅：新四军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

3月5日为抗大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4月11日发表《在边区国防教育成立大会上的讲演词》。指出：“现在正在进行战争，战争规定一切，战争改变一切。”它除规定着打日本的教育方针之外，还能帮助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21日与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党与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5月4日向新四军发出指示，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

同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它围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要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指出了正确道路。

同月发表《论持久战》。全文共写了120段，21个问题。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各自特点，主要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阐明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主张，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为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同月指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当地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8月指示八路军第120师一部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

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报告根据十五个月的战争经验，进一步论证了持久胜敌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提出全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上作《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结论，较系统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党指挥枪”等基本理论。

12月指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

1939年

1月2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发刊词。指出：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

20日发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指出：在伟大的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但同时也需要外援的配合。

5月30日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6月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指出：吸收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已成为目前干部工作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7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指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开赴华北敌后办学，把教学和敌后的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9月1日向记者发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指出，全国人民应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下，动员一切力量，为准备反攻而奋斗。”

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战争的根本原因。

16日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指出：共产党在反对顽固派搞磨擦问题上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坚持严格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9至12月指导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16日在对部队的讲话中说：“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是军民合作。”

2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在1939年春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阐明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4月6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瓦解敌军工作，对争取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5月4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6至8月指示八路军先后成立第4、第5纵队，坚持豫皖苏边区斗争，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

11月7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西北军区（第120师兼），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兼政治委员。

中旬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在军事战略方面强调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941年

1月14日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援救新四军的指示》，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授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20日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

22日对新华社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险谋。

1月至3月领导全党全军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2月2日与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苏鲁地区。

7日批准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颁布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条例》。

5月9日与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发出《粉碎敌之蚕食政策及发展地方武装的指示》。

11月7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其中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和人民武装的巩固与扩大上，主力军应适当采取精兵主义。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总方针，仍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

1942 年

2 月在延安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据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于 6 月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5 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

9 月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应该领导一切组织，各地军事政策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须经各地党委集体讨论，具体行动由军队首长决定，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9 月 7 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出：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 月在《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的指示中指出：各部队除担负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厉行“军民兼顾”的原则。

1943 年

1 月 5 日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你们需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

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表扬和宣传抗战中英雄人物有重大教育意义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各种英雄人物问题的指示》。

3 月 20 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6 月 1 日致电彭德怀指出：抗战还需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策。

7 月 12 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蒋介石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

7 至 9 月领导全党全军采取强硬态度和有力措施，在国际国内舆论压力的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10 月 1 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并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强调军队应加强对敌斗争，实行精兵简政，积极拥政爱民和努力发展生产等。

1944年

4月11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导下，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

12日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从1941年至今三年多以来，敌以百分之六十的在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

6月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争取攻占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以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提到极重要地位。

6、7、8月与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形势、中美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观点和政策。

7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强调必须在现有物质基础上和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技术战术水平和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将来的大发展和大反攻准备条件。

8月22日与刘少奇、陈毅致电新四军，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并应打破常规，实行群众练兵的方法。

9月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讲演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8日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向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的形势，明确指出：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1945年

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其中专题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的军队”两个问题。

27日为《解放日报》写《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6月19日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根据形势发展，我党任务将分两个阶段，目前阶段集中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将来阶段准备应付蒋介石的大举进攻，对付内战。

13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时局的发展作了科学分析，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

26日同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8月至12月先后组织和指挥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共11万人，干部2万人进入东北，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9月2日日本帝国政府签定投降书。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会谈，也是针锋相对。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此原则下可以作一些让步。但却不是交枪，“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10月指导晋冀鲁豫军区举行邯郸（平汉）战役。并指出：这一仗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务必精密组织，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必须审慎忍耐，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至于我有利地区，再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之。

11月5日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谈话。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强调一切工作布置均应作持久打算。

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应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配合野战部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6年

4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四平保卫战。

5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示强调，我党必须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时局和对策的指示》。指出，新的全国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

下旬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鞍（山）、海（城）战役。

6月22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就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扩大内战。

26日蒋介石反动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7月至8月指导晋绥、晋察冀军区举行晋北战役。

7月至8月指导华中野战军举行苏中战役（即“七战七捷”）。并在战役结束后将其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分批歼敌的经验通报全军。

7月至9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举行闻夏、同蒲战役。

7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规定了战胜敌人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强调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

7月指导山东野战军举行朝阳集战役。

7月至9月指导晋察冀、晋绥军区举行大同、集宁战役。

8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出击陇海路战役。

9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定陶战役，并将战役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作为范例，向全军作了介绍。

9月16日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提出了实行这一作战原则的若干方法。强调实行这一作战原则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它“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

同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举行临（汾）、浮（山）战役。

同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张家口保卫战。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三个月总结》。在全面分析战争形势、总结战争初期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以及解放区土地改革、生产与支援战争等任务。

同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郟城战役。

同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新开岭战役。

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易（县）、满（城）战役。

14日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对俘虏工作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尊重俘虏人格，严禁杀害俘虏或搜俘虏腰包。人人做教育俘虏的工作，大胆使用俘虏，瓦解敌军。

15日至22日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滑县战役。21日同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讨论战略形势。指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用三年到五年，最长十五年。明年是关键的一年。

11月至12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绥军区各一部举行吕梁战役。

12月指导山东、华中野战军举行宿北战役。

同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24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强

调为保持与提高我军战斗力，适应长期战争需要，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1947年

1月上、中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巨（野）、金（乡）、鱼（台）战役。

1月指导山东、华中野战军举行鲁南战役。

1月中、下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晋绥军区各一部兵力举行汾（阳）、孝（义）战役。

1月下旬指导晋察冀军区举行保（定）南战役。

1月下旬至2月初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豫皖边战役。

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今后数月内如能再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提出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是今后军事建设的中心任务。

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强调凡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应经各级党委民主讨论决定，再由首长执行。2月下旬指导华东野战军举行莱芜战役。3月中旬与周恩来等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陕甘宁战场的作战。3月下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北战役，转入战略性反攻。3月至5月指导西北野战军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

3月26日在陕西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与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另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4月初至5月中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发动晋南攻势。

4月至5月上旬指导晋察冀军区举行正（定）太（原）（铁路）战役。强调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是完全主动、正确的作战方针。

4月15日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周旋一时期，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这种办法叫“磨菇”战术。

17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加强后方勤务工作的通令。强调解放区的一切战争动员工作都应从长期打算。尤其是节省人力物力，严禁浪费，是支持长期战争的必要条件。

5月中旬至6月底指导东北民主联军全面发动夏季攻势。

5月指导华东野战军举行孟良崮战役。针对战场情况，多次指示：不要性急，不要分兵，不要去扰敌后路，让敌放手前进，必能找到歼敌机会。

6月中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清（县）、沧（县）战役。

6月30日至9月组织指挥刘邓、陈粟野战军和陈谢集团挺进中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西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问题。根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认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解决（从1946年7月算起）是有可能的。

8月中旬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

9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9月至12月指导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举行胶东保卫战。

9月中旬至11月上旬指导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

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黄龙战役与延（长）清（涧）战役。

10月1日起草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申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

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颁发《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多年来实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

中、下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清风店战役。

11月上、中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石家庄战役。

11月至1948年夏领导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先后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12月中、下旬指导晋冀鲁豫军区、西北野战军各一部攻克山西运城。

中旬至1948年3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冬季攻势。

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军事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下旬至1948年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涞水战役。

1948年

1月30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强调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

2月至3月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宜川战役。

3月至5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举行临汾战役。

3月7日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取得如此显著胜利，原因甚多，但最值得注意的是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上、中旬指导中原地区人民解放军举行洛阳战役。

中、下旬指导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举行胶济路西段战役。

下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察南绥东战役。

20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情况的通报》，着重通报了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军事形势的变化情况。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月消灭敌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

21日与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由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向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北坡村转移。

4月至5月指导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举行胶济路中段战役和津浦路中段（兖州）战役。

4月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西府（即泾河、渭河之间地区）、陇东战役，收复延安。

5月9日参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调整和加强华北、中原党政军领导机关。

中、下旬指导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一部举行冀热察战役。

下旬至6月初指导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及桐柏、豫西部队举行宛东战役。

6月中旬至7月下旬指导华北第一兵团举行晋中战役。

中旬至7月指导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举行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

7月2日至16日指导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桐柏、陕南军区配合下，举行襄樊战役。

8月8日至13日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澄（城）、（今合阳）战役。

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整个战争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大约五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估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争取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从各方面作了准备。

9月上旬至10月指导华北第2、第3兵团举行察绥战役，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

12日至11月2日指挥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这是战略决战中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毛泽东为战役制定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各个加以歼灭的作战方针。

16日至24日指挥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举行济南战役，并对战役的方针、部署作了具体指示。

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于当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10月指挥华北第一兵团等部举行太原战役。

同月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大）荔北战役。

同月指导中原野战军举行郑州战役。

11月1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这是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

同月至1949年1月指导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为战役制定了三个阶段作战的指导方针，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建议，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14日发表为新华社所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而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原来预计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15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发出了《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对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

11月中、下旬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冬季战役。

11月中旬至1949年1月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指示东北野战军及华北第2、第3兵团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敌人先实行“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然后再逐一加以歼灭的方针。

1949年

1月1日发表为新华社所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郑重宣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定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日至8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向全党提出在1949年的17项任务。要求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平津、淮海等重大战役结束后，应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5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全军进行整编。

2月至3月指导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

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今后解决一百多万残余的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同时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

25日随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平山县西北坡村移至北平（今北京）。当日同朱德、周恩来等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4月21日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与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同月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举行渡江战役。

同月指导第18、第19、第20兵团等部攻克太原。

25日与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愿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约法共八章。

5月中旬至6月初指导第三野战军举行上海战役。

5月12日同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率机关与中原军区领率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

16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

23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部署的指示。各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迅速展开了向全国的大进军。

6月15日同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式样。

7月至9月指导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和举行福州战役与漳（州）厦（门）金（门）战役。

7月至9月指导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举行扶（风）眉（县）战役、兰州战役和宁夏战役。

7月上旬至8月下旬指导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先后发起宜（昌）沙（市）战役、湘赣战役和赣西南追击作战。

7月16日在对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方针和部署中指出：对白崇禧部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9月初至1950年初指导第一野战军向河西走廊进军及进军新疆。

9月中旬至10月指导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举行衡(阳)宝(庆)战役和广东战役。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20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郑重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和今后建军等问题，并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

11月1日至月底指导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向西南进军，先后解放贵阳、重庆。

6月至14日指导第四野战军在第二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举行广西战役。

11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12月5日同意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强调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

上旬至月底指导第二野战军举行成都战役。

1950年

1月至2月指导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举行滇南战役。1月指示全军先后抽调140多个师的兵力，迅速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

2月指导第四野战军在广西举行平而关战役。

22日同意中央军委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3月中旬至4月初指导第二野战军发起西昌战役。

3月至5月指导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发起海南岛战役。

4月14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构。

5月1日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克服居功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腐化堕落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

16日至30日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的决定。

同月至7月指导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解放舟山群岛。

同月至8月指导第四野战军一部解放万山群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

1950年

6月15日审批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准备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

25日朝鲜内战爆发。

30日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

7月7日同意总参谋部关于保卫国防问题会议的决议，并通过军委于13日作出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

8月1日修改并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必须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同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

5日致电嵩岗，要求东北边防军于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25日电示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及中共华南分局，必须做好防止敌人在粤东方向举行登陆袭击的准备。

27日电告彭德怀，为应付时局，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

9月1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构。

25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并致祝词。

9至10月同意并先后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及中共中央代表陈赓，前往越南，帮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了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边界战役。

10月2日致电斯大林，通报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援助朝鲜。

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参战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同日致电金日成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帮助朝鲜人民反对侵略者。上旬至中旬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国人民武装工作的基本方针与任务。

13日至14日致电周恩来详述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17日电示彭德怀、高岗等，志愿军先头部队准备于19日出动。

同月指导第二野战军及西北军区一部开始向西藏进军，并于10月下旬攻占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22日电示第19兵团待命开赴东北。

23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领导机构。

25日至11月5日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一次战役。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27日电告彭德怀、高岗，决定华东第9兵团北调东北整训，以备战略急需。

11月8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

11月6日至12月24日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二次战役。迫敌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

11月22日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各大军区，应加紧准备防空，特别是沿海大城市，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空袭。

12月1日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

3日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一九五一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规定的指示。指出：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

25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领导机构。

31日至1951年1月8日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三次战役，收复三八线以北地区，并解放了汉城。

1951 年

1 月 4 日同意成立军委兵工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富春、聂荣臻任副主任。

13 日电示华东军区和中南军区，加强战备，防御国民党军队进攻厦门，汕头。

15 日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任命刘伯承为院长兼政治委员，并为该院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2 月 1 日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

7 日致电周恩来详述在朝鲜战场实施轮番作战的兵力计划。

18 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决议要点，其中强调必须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3 月 24 日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编制问题的决定》。

3 月底至 5 月中旬同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作出决定，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

4 月 17 日电告彭德怀应注意防敌以空降兵扰我志愿军后方。

同月同意总政治部召开全军组织工作会议，部署全军整党。

同月同意在全军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同月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五次战役。

5 月 26 日致电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志愿军对美英军作战，目前应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

6 月 1 日至电彭德怀应增强我志愿军的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以征服敌人大量坦克，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步兵。

26 日同意空军拟于 9 月赴朝实行作战的计划。

7 月 2 日至 4 日致电彭德怀、高岗及金日成，指出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领导等问题，以及和谈期间志愿军必须加强战备的部署。谈判于 7 月 10 日在开城举行。

9 月 2 日致电斯大林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9 月至 11 月同意以军委名义在北京集训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苏军先进经验，进行现代化、正规化训练，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12 月 8 日同意并指导在全党全军开展“三反”运动。军队的“三反”运动到 1952 年 10 月结束，

1952年

1月1日同意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精简整编。

18日电复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

2月1日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并于4月15日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决定，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41个整师，11个整团共46万5千余人转为工、农业建设部队。

4月同意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先后派出10万官兵参加荆江分洪工程施工。

5月批准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在北京成立。

7月10日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学员发训词表示祝贺。强调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提高各级指挥员、司令机关的组织指挥水平，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条件。

18日同意聂荣臻、粟裕所拟军事建设五年计划。

同月同意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8月1日与周恩来、朱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军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

24日同意总政关于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报告。“报告”明确提出三五年内使全军排以上干部普遍达到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10月24日致电彭德怀、邓华等，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从9月18日开始的对全线敌军进行的战术性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同月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全军发出《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

11月对关于加强海军建设问题提出：我国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2月4日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决定》。

同月6日和19日同意总参、总政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转换到朝鲜战场锻炼的计划。

9日电示邓华：志愿军必须火急准备粉碎敌人登陆计划。

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向志愿军、东北局和军委各部门发出《中央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

中旬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政务院联合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

中旬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和统一了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思想。

28日发出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起草的《关于加强防敌进攻福建沿海的指示》。

1953 年

1 月 10 日批准在南京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

10 日至 19 日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军第一次国防工程会议。

2 月 19 日至 24 日先后视察了海军的“长江”号、“济阳”号、“南昌”号等五舰，观看了两艘鱼雷快艇的演习。并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5 月指导华东军区陆海军攻占浙东沿海若干岛屿的作战。

7 月批准并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金城反击战役。

同月中旬指导驻福建、广东沿海部队，粉碎国民党军向东山岛的进犯。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8 月 10 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9 月 1 日批准在哈尔滨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并授予训词。训词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以及有大批能够掌握这种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人才。军事工程学院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12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讲话。指出：战争的胜利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

12 月 7 日至 1954 年 1 月 26 日批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我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帝国主义侵略。

1954 年

3 月同意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实施奠边府战役。

4 月同意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15 日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在审批这一条例（草案）时，加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

同月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指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7 月 21 日中国第一架雅克—18 型飞机试制成功。8 月 1 日发贺信表示嘉勉。说“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9 月 15 日至 28 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任主席。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任主席。

10 月 18 日出席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

同月经毛泽东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11 月 9 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领导人。

12 月同意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的政治工作报告和全国各大军区的划分方案。

1955

1月28日在同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谈话中说：“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2月9日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12日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

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

同日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4月7日发布关于结束中国与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

同月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接收苏联军队驻旅顺、大连地区的防务，并于4月15日举行交接仪式。

同月21日批准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

6月22日批准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

7月30日，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9月2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并将各种勋章分别授予有功人员。

10月15日出席全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开幕式。

1956 年

1 月 1 日批准《解放军报》于当日正式出版。

10 日在陈毅陪同下，视察了我国最大的一所造船厂，观看我国第一艘潜水艇的组装情况。

3 月同意中央军委于 6 日至 15 日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确定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4 月 25 日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要生产原子弹。并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同月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

6 月接见海军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并讲了话。

10 月 8 日批准于当日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负我国的导弹研究任务。

11 月 15 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说：“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1957 年

1月7日至27日同意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同加强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

2月15日在彭德怀等陪同下，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时指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说，军队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应有些不同。

8月23日批准当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12月18日在加强我国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上批示：“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1958年

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3月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同月批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月到10月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5月至7月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讲话。在6月23日的讲话中说：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

7月27日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关于炮击金门问题的信中说：“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

8月、9月先后发出“实行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号召。

10月6日发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的文告。

12日任命黄克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3日发表所起草的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11月29日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

12月10日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彻底打败侵略者。

1959 年

2 月 20 日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出席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

3 月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始平息西藏武装叛乱。

6 月同意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北建立核试验基地。

9 月 11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军委主席。

10 月 1 日出席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12 月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贺龙任主任。

1960 年

1 月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民兵工作会议。

同月同意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6 月 14 日在中共上海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全国要搞大后方。

9 至 10 月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1961 年

5 月 1 日同意以中央军委名义，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条令颁发全军。

6 月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精简机关，适当压缩国防费用，大力支援地方建设。

11 月《毛泽东军事文选》出版发行。

同月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

1962 年

1月11日至2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6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粉碎了台湾蒋介石集团进犯东南沿海的军事冒险企图。

10月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地区边防部队，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我国的安全。

12月批准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周恩来任主任。

1963 年

2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各省市的同志和中央的同志都要注意抓军事，抓军队。”

3月5日为因公牺牲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4月12日在听取南京军区领导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指示：“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这种方法。”

12月16日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十年规划时指示：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些防御性武器。

1964 年

2 月 6 日会见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对发展尖端武器和农业、地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谈话。

5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准备打仗。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要做好平战结合。

同月在听取汇报“三五”计划时，对搞远程导弹问题作出指示。还指出，一定要下决心进行后方建设。

6 月上旬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指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

6 月 15 日、16 日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7 月 23 日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击落 U—2 敌机的空军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并一起照了像。

8 月 22 日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的访华外宾，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首先使用。这是我们作为防御的武器。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 年

1 月对战备防空问题作了指示。

6 月指示人民解放军派出地空导弹、高炮、铁道、工兵等部队参加援越抗美战争。

7 月在听取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指示，立足于打，立足于大打。

8 月 17 日指示全军各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

同日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在“八·六”海战中海军参战有功部队的代表。

10 月 12 日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12 月 2 日在一个批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军事、经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

1968 年

5月7日发出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

1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此，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展开。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建设也受极大损害。

7月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构。

9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

1968 年

1 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 月 7 日接见军训会议代表并讲了话。

9 月 26 日接见在京军事干部并讲了话。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2 月 19 日在给越南南方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1968 年

5 月 20 日在同林彪谈话中指出：军队不能搞抵制错误的领导。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

9 月批准人民解放军派出部队帮助老挝修筑公路。

11 月 25 日在国防科委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

1969 年

3 月指导人民解放军取得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4 月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赞扬我边防部队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靠勇敢、近战，靠人民战争，打败了优势装备的苏军侵略者。

28 日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70年

1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强调在正义战争的前提下，“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7月29日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杨·约尼查。在谈话中说：要准备打仗。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来了也不怕，有办法。

11月24日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

12月19日对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报告批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同月根据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全军中高级干部开始采取以自学为主，并举办读书班等形式，比较认真地读一些马列原著。

1971 年

1 月 8 日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据此，全军开展了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运动。

8 月中旬至 9 月 12 日在外地巡视期间指示：“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10 月 4 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指示：“军队要严格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1972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5 月 27 日批准我海军派出扫雷部队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助海上扫雷。

12 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口号。

1973 年

8 月 13 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打仗也要靠民兵，有正规军也要搞好民兵训练。”

9 月 12 日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在谈话中说：“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丧失警惕。”

11 月 12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于 12 月作出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

12 月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74 年

1 月指导人民解放军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2 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在谈话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8 月、12 月经毛泽东批准和中共中央先后两次通知精神，全军对林彪军事上的错误开展批判。

1975 年

1 月 5 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5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海军首长指示：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主持，贯彻执行毛泽东“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

11 月 3 日对海军报告有关领导班子问题的批示：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1976年

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附录二：国外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简介

一、国外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简史

应该说，最早把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介绍到国外并引起最大反响的，是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36年10月访问中国时，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达十几个晚上的谈话，写成了《西行漫记》一书于1937年至1938年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它虽主要是介绍毛泽东本人的经历，但同时也介绍了红军成长的曲折道路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从军界来看，最早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发表著作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塞缪尔·B·格里菲斯。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作为军事代表团成员到过延安。他于1940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杂志上撰文说：毛泽东提出了一套新的游击战理论。后来，他又写成《毛泽东论游击战》一书，该书在美国多次再版，影响很大。

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不断胜利，国外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亦逐渐增多。但真正引起国外学者广泛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才开始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终于打败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夺取了政权。同时，中国人民根据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思想，先后又参加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和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些伟大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一位美国学者评价毛泽东说：“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十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这可以说是国外学者重视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在入侵越南、朝鲜、非洲等战争中相继吃了败仗，使他们不得不重视研究这些革命战争所直接受到影响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人民游击战争的理论，以便从中找出对策。三是从1951年开始，毛泽东著作出版并相继翻译成各种文本在国外发行，为国外学者系统地进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并在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两次高潮。当然，国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不能不受到国内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评价和研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也逐渐走向一个更加重视客观评价的新阶段。

目前世界上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机构和专家、学者很多。在研究组织方面，日本很早就成立了毛泽东研究会和毛泽东思想协会。1967年又在关西地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美国的东亚研究中心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都有专业人员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美、日、英等国军队的研究部门和军事院校。据日本学者苍苍社社长中村公省估计，目前美、日、英和原苏联等国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员不少于三百人。在美、英军的不少军事院校中，还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据1989年8月上海的一家报纸报道，一位美国将军在一次对美海军陆战队视察时，要求军官和军士都要多读点书，他把毛泽东有

关游击战的著作也列为此类读物。

二、国外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研究方法多样

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方法十分灵活。归纳起来主要有：（1）对比式。即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列、克劳塞维茨及中国孙子等的军事理论，进行对比性研究，以探讨其继承与发展的关系。（2）分解式。即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完整内容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分解成若干专题，逐一进行单项分析，尔后再综合研究。（3）讨论式。即两人或数人一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某一两个问题，在预有准备的基础上边讨论边研究，互问互答，交流各自看法。（4）回顾式。即对历史上发生在世界上的若干个以弱胜强的战争经验，进行回顾和剖析，从共同规律中找出毛泽东在战争指导和军事理论上的高明之处。

（二）重点探讨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各国学者着重从创新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在军事理论上的杰出贡献。日本的宍户宽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和军事理论家”。认为“恩格斯、列宁都曾谈过军事，但他们的军事思想不占主导地位。”中山敏雄认为，在马、恩、列时代，“作为革命的任务始终没有把军事问题放在首位”。而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于中国的著作”。日本1962年《防卫年鉴》指出：“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书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则是彻底的现实性的东西；如果说前两种是以学习兵法的人为对象的，那么毛泽东的著作则能使每一个士兵、民兵、群众所理解……”。美国的林恩·赖兰德说：“毛是一位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学者。毛的军事著作体现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许多用途更为广泛的军事原则”，日本的伊藤皓文认为：“毛泽东的战争论具有暴力和政治这样两种不同的特性”。比起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来“是政治性更强的战争论”。

（三）注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研究

国外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不但对那些认为毛泽东只是一位游击战争专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而且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展了全面性的研究。日本的户宽说：“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构成了一种新的军事理论体系”。日本1962年的《防卫年鉴》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体系和基本内容概括成十个方面，分别阐述了革命观、战争观和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建军路线中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尊重士兵和人民及军队的政治教育；战略战术思想；人民战争思想；对中国古代战史和优秀军事思想的继承等。一位日本学者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称作“毛泽东的战争论”，并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1）战争理论；（2）战争的定义—特别是战争的目的论；（3）战争和政治，强调政治领先的原则；（4）战略防御，根本点是积极防御的思想；（5）速决战与持久战；（6）人民战争。

（四）密切联系实际，目的在于用于战争实践各国学者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上有一个相同点，即都是为了用于实践。革命人民借鉴以指导革命；

帝国主义和反动学者则试图从探讨中以寻找军事对策。英国一位军事学者毫不掩饰地说：“对自由世界来说，主要的不仅是要理解毛的军事思想，而且还要将这些军事思想运用于在东亚的西方军队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难题之中”。他认为，过去由于不懂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意义，导致了法国人在印支，美国人在越南，英国人在东方遭受了类似的失败。并有可能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吞下类似的苦果。因而提出根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不但要研究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正规军如何打游击战的问题。

三、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理论的认识

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侧重于探讨军事战略和战争等基本理论。并从不同侧面作了较为深刻、系统的研究，且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一）关于战争观与方法论

在战争观问题上以日本学者研究的为多。大体上是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述的：（1）历史背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战争观。毛泽东则以共产主义者的战争观为基础，吸取《孙子兵法》等古兵法，产生了毛泽东独特的战争观，设计出战略和战术。（2）战争的定义。认为毛泽东对战争概念下的定义把“革命”和“战争”融合在一起，现实地在战争的范畴里注入了革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战争的概念与方式。（3）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认为这是：“以毒攻毒”和从矛盾的同一性理论出发的战争观。（4）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不仅毛泽东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如此地共同抱着这一观点。（5）战争就是政治。毛泽东的名言“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都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战争和政治的统一论。（6）战争与和平。认为毛泽东并不是把和平作为目的来追求的。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终目的。因而，“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有战争也有和平”。战争与和平，都是阶级社会的政治现象。

在方法论问题上，西方学者多把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中国的传统哲学联系起来，从军事辩证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的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以西方和中国传统的辩证法为基础的，但主要是受道家世界观的影响。他把相反相成的分析贯穿于对战争全过程的研究；利用奇正相变的思想，形成了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相互转化的重要思想；重视检查计划与理论是否违背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的认识论；欲擒故纵的观念，导致夺取土地必先放弃土地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兵不厌诈，不战而屈人之兵，刚柔相济等思想。有的认为，毛泽东的战争哲学观念，既打破了儒家的传统，也打破了道家的传统，他不接受那些曾限制过古代战争的道德和社会的限制，有的认为：“毛泽东的战争哲学，来源于对战争的分析，毛泽东的寻根究底，洞察一切的头脑很容易习惯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方法。”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他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他军事思想的基础。它既是人民军队建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又是现代条件下力求打破核垄断的战略思想基础。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非纯军事性。把战争同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等因素联系起来思考。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毛泽东强调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政治上和军事上取胜的首要条件。三是很强的实践性。认为毛泽东的贡献在于承认作战时间、地域和特点，并把他的非正规战的理论适用于客观情况。普遍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关于建军路线

总的看，日本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较为深刻。中山敏雄和户宽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位军事领袖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上井冈山时就明确提出：“必须建立一支与人民融为一体的人民军 347347 队”。其重大贡献主要有三点：（1）湾改编是建军的重要转折点，后又在古田会议上对一系列建军经验做了初步归纳和总结，使之更加完整。（2）提出了转变人的思想的观点。他的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旧军阀队伍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大多数被改造为英勇作战的红军；二是对农民阶级作了具体分析，主张通过党的坚强领导，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转变为执行革命的、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并通过它来领导民众，唤起民众。（3）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因为他亲身体会到，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日本 1962 年《防卫年鉴》对毛泽东的建军路线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正确处理党和军队、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党必须紧紧地掌握住这支军队，它是完成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二是正确处理军队与士兵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三是正确处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肯定人是决定因素。重视政治教育，把政治思想工作当作军队的生命线。

（三）关于人民战争理论

普遍认为，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它是一种政治成分更多的军事理论。首先，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来源于一种可以称作人民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认为人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的思想。”其次，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武器、军事技术，经济力十分发达的现代，它针对往往忽视人的因素扩展了以人为中心的战争理论；二是针对正规军在现代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高度评价了人民这种非正规和潜在兵力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扩大了战争的主体。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同时又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论。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采取了持久战战略、游击战争战略和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些战略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等非军事战略相结合，综合地被加以利用。还有的认为，“人民战争”也是毛泽东对“唯武器论”的一种批判，它对那种潜在的、支配现代化军队的、西洋流派的兵学思想是“划时代的挑战”。日本伊藤皓文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的本质，最主要的是人民革命战争”。因此，即使今后中国实现了核武装，人民战争仍将继续存在，长期发挥作用。

（四）关于游击战争理论

各国学者对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基本理论的看法大体趋于一致。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关于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基础，并由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农村的理论作了修改，以五亿农民为基础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其特点是：第一，依靠广大的乡村和农民群众。有此条件，游击队就能藏身于居民中生存下去。第二，有人民的积极支持。对游击活动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是整个革命运动的基础。第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保证革命政权和武装力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展，最终完成革命运动。第四，游击战争的目的和一般战争一样，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第五，攻势占主要地位，通常采用突袭的形式，并多用外线包围的速决的小规模歼灭战。第六，给下级指挥员有更大的决定

权与行动自由，使他们在作战的方式方法选择上有必要的灵活性，第七，运动方式不同，要有更高的机动性。强调迅速集中与迅速分散，并使用各种欺骗和隐蔽手段。第八，补给形式不一样。武器装备主要取之于敌，无庞大的后方系统。有的还认为，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有六条原则，即：（1）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部队相配合，包括战略、战役、战术上的；（3）建立根据地，这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关键；（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这个过程要创造条件扩大数量，提高质量；（6）游击战的指挥原则是：战略的集中指挥，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前者说的是为了使正规战、游击战密切配合的统一指挥，后者说的是给下级指挥员以充分的独立自由权。

（五）关于军事战略

这是各国学者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点问题。有的认为，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由六项原则组成：（1）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基础。（2）重视敌情，并发动全体军民去完成。（3）研究敌我双方相互对立的特点，指出双方战略的主要方向。（4）主动性。即军队行动的自由权。（5）灵活性。要审慎地使用抄来的原则，防止主观臆断的战略指导。（6）计划性。一切战略、战役计划虽可能改变的，但同时又是必须的。认为这六项原则前三项是毛泽东研究战争的基本思想方法；后三项则规定了他在战争、战役中指挥部队的规则。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军事理论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完全依赖兵力，而是巧妙地运用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陷敌于不利地位。他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特点的认识可概括为：（1）着重从精神上疲惫敌人；（2）坚持持久战；（3）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4）必要时，还可以利用谈判手段，对敌人施加精神压力或使敌人无法获得胜利果实。日本持田真一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提出如下基本看法：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军事结合起来的综合战略；归根到底超不出陆上战略的范畴；本质上是劣势军队的守势战略，且是内陆歼敌思想；只有在整体力量对比有利于共产党，又确有胜利把握时才取战略反攻；面的战略，即广阔战场上的高度运动战，不是确保城市及交通线；奇特的战略，即不采取与敌相同的法则作战，进行“不与敌人纠缠”的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

（六）关于作战原则

普遍认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三个时期中，其基本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大同小异的，但又各有其不同的发展变化。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上看，可以这样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六字诀”，抗日战争时期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作战原则的最精辟的概括。它的中心作战思想是如何以自己的劣势战胜优势之敌。毛泽东的结论是：“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根据各国学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七点：（1）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原则。（2）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这是毛泽东的一条主要原则。（3）诱敌深入的原则，（4）歼灭战的原则。支持这种歼灭战原则的是各个击破的方法。（5）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原则。（6）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在持久作战中将三者巧妙地加以应用。（7）决战的原则。即“完全贯穿着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后记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1991 年 10 月，应朱兰芝、张辉两同志之约，有幸参加《毛泽东思想研究丛书》中《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一书的编写工作。这本小册子，是在原张家裕所编《毛泽东军事思想十一讲》教材的基础上，根据《丛书》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设计与要求，改写而成的。其中第一、三、四、九、十等五章为袁德金改写或修改，最后由张家裕定稿。在成稿过程中，感谢朱兰芝、张辉二同志的具体指导。

册子虽然反映了作者多年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成果与基本观点。但由于稿约时间紧促，不少问题尚来不及深研，加之我们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九二年五月于北京

